

目 錄

-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刘 斐 (1)
- 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記 宋希濂 (13)
- 南京保卫战的回忆 王鐵武 (31)
- 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車部队 杜聿明 (38)
- 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 周振强 (43)
- 广德、泗安的防御战 黄应乾 (54)
- 关于韓复榘統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見聞 王一民 (57)
- 刘湘死后川局波瀾紀略 黄应乾 (79)
- 民生公司概述 吳晉航 (97)
- 关于西山會議派的一鱗半爪 周一志 (111)
- 我所知道的陈誠 杜 偉 (129)
- 抗战胜利后海防痛击法軍紀实 王理襄 (145)
- 补充和訂正
- 关于金圓券的發行和崩潰 翁文灏 (155)
- 关于英斃之日記扉頁上題詩的作者 孫思白 (155)
- 关于警原之死的更正 周一志 (156)

附注

对《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十八辑二三二页

对《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一文的补充

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二三二页

对《广德、泗安的防御战》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三五页

对《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见闻》一文

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二辑二五六页

对《刘湘死后川局波澜纪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二页

对《我所知道的陈诚》一文的补充、订正和质疑

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三七页、四十八辑二

四〇页

附注

对《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十八辑二三二页

对《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一文的补充

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二三二页

对《广德、泗安的防御战》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三五页

对《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见闻》一文

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二辑二五六页

对《刘湘死后川局波澜纪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二页

对《我所知道的陈诚》一文的补充、订正和质疑

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三七页、四十八辑二

四〇页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刘 兼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进一步向华北进攻，爆发了芦沟桥事变。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下举行了庐山会议，召集各界人士会谈，决定抗战。旋即在南京组织对日作战大本营，全国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踊跃参加。这样，神圣的抗日战争就展开了。

当时大本营作战组的某些负责人，根据敌我基本情况，对敌我战略方针，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逐步蚕食政策，和它这种政策相适应，它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所以，当它挑起芦沟桥事变时，一方面引诱宋哲元等谋作地方事件解决，以便达到它不战而略取华北的目的；一方面调集重兵，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针，先解决华北，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

它之所以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帝国主义国家间又有矛盾，若长期战争，它怕引起第三者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决歼灭战略。而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值

土大，資源丰富，国家潜力大；并且我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等有利条件。故我利于采用持久消耗战略。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这些意见，在当时大本营得到许多人的同意，就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中国决心抗战，它的不战而屈和企图事件局部化的阴谋不能实现时，就一面加紧进攻华北；一面到处挑畔，并于八月九日发生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借口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撤退上海保安总队，压服中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我为扩大战场，造成全面抗战的形势，就乘机主动把驻在苏州的张治中部三个师迅速驰援上海，迎击敌人对上海保安总队的进攻，展开了“八、一三”的上海抗战，迫使敌人逐步向上海增援，打乱了它的整个作战计划，使它陷于被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原来声言三个月就可把中国打垮，谁知在上海一战就打了三个月。它先后由一万左右的兵力逐次增加到二十多万人，使用在上海战场的大炮有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不但不能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而且深深地陷入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泥潭之中。

上海一战，对整个抗日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很大的价值。首先，上海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有利于全国总动员；其次，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上海抗战可以扩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第三、上海是国际观瞻所在，在这里进行坚强的作战，可以正国际间对中国的视听；第四、打乱了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了主动；

第五、上海是我国工商业中心，群众觉悟程度高，群众运动的影响可以振奋全国；第六、可掩护沿海各省工业、物资向远后方撤退。因为上面这些原因，对上海一战大本营作战组是主张适当地硬拼的。否则叫别人看我国象豆腐一样，就是有心支持我们的人也将丧气而袖手旁观了。

当时上海作战也确是打得有声有色的。群众热烈支持，所有爱国人民都踊跃支援前线。所有江南各省的兵力，都逐渐集中在上海战场，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各省的部队都参加了作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使用在华北战场作战的以外，如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等部也都在第一线作战。所有爱国官兵，都前仆后继地发挥了最大的牺牲精神，给了敌人以应有的损失。特别在罗店、大场两个地区的争夺战，表现了我国军队顽强的战斗精神，各国军事观察家都对我国军队的牺牲精神和战斗能力有很高的评价。日本侵略者原来满以为只要三个月就能把中国打败，结束战争。在它这种错误估计之下，就不能不逐次增兵，一再被动。起初，它想以战术包围来包围我上海部队的左侧背，结果演成罗店附近的争夺战而不能成功；后来对大场附近举行中央突破，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战事迁延不决的情况下，它又不能不大举增兵，改用战略包围由杭州湾登陆，对上海阵地进行远后方的迂回。

在这种形势下，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组长刘斐曾向蒋建议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及时向吴淞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十月初旬，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对前线各部队向吴淞线转移的命令都已下达，前线已开始执行。但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下午，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九国公约国家正在开会，只

要我們在上海能够繼續頂下去，九国公約国家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在原陣地死守。当时，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认为既然已下达轉移陣地的命令，各部队已經开始行动，在敌人的強大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原陣地，一定会引起混乱，結果将不可收拾。蔣介石坚持不肯，說他可亲自赴前綫說服各部队。于是他当天晚上就赴前綫，并要白崇禧和他一道去了。听说他在前綫某地(地名記不起了)，和一部分的部队长說，九国公約国家會議的結果，一定会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只要再坚决死守一下，战争就可早日結束云云。

这时，第一綫各部队，有的正在准备撤退的，忽然又要停止撤退；有的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已退却在途的，又要返回原陣地；还有的已經撤退在途而沒有接到返回原陣地的命令的，仍照旧后撤；这自然就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加之战斗激烈，脱离敌人已不容易；已脱离敌人又要返回原陣地去，自然更不容易。这还能有不失败的嗎？

这样指揮錯乱的結果，原陣地既站不住脚，逾十一月初敌人由杭州湾登陆，进行側背迂回时，想把部队向原陣地后方稍撤，即把右翼(原中央兵团)撤到青浦、白鶴港之綫，結果也站不穩脚。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連帶一起向吳福綫既設陣地轉进。这时受敌机动性較强的海陆空軍的追击，部队不能不尽量疏散，就使原来已經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設陣地綫上既沒有設留守部队和响导人員，也沒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轉进到来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沒有打开工事的钥匙。以致在敌跟踪追击的情况下，沒有占領陣地的余裕時間。因此，在吳福綫上還沒有站穩脚时，敌人已从吳福綫的兩側(平望、福山、澉浦)进行威胁，只好

繼續向錫(無錫)澄(江陰)綫既設陣地撤退，終于在錫澄綫也站不住脚。这种被动撤退的慘局，完全是蔣介石沒有战略战术常識，一个劲依賴九国公約制裁日本，沒有及时調整战綫，爭取主动来坚决执行持久抗战方針的結果。

这样一来，南京防守問題，就出乎意料之外地提前提到日程上来了。

二

战局的演变，使蔣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吳福綫和錫澄綫国防工事，絲毫沒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問題。蔣为解决这个問題，在十一月中旬連續召开了三次高級幕僚會議。

第一次會議只有何应欽、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几个人参加。当时刘斐的意見是：認為上海会战后期沒有貫徹持久消耗战略精神，沒有适时調整战綫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不應該在敌海陆空軍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且依靠九国公約，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自陷于被动。我軍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則，不應該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爭勝負，而要从全盘战略的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領我国的每个县要出一个連、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就非垮台不可。

刘斐对于南京的防守問題，認為敌人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軍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綫前进，机动性既大，后方聯絡綫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湾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軍封鎖和炮击南

京，从陆上也可由蕪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我軍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軍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敌强迫决战。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针对以上的情况判断，刘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刘主张只用十二个团，顶多十八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利于机动。

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刘斐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说有道理，但他们素来是矜持老成，只说三两成似是而非的模稜两可的话，尽量在揣摩蒋介石的心理上下功夫的。蒋介石也说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没作明确的决定。但对上海作战中损失大的部队，他说应一律调到后方整补。

蒋这次的决定，虽然是模稜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是符合的。因当时估计吴福线站不住脚，已指导在吴福线的部队尽力掩护占领锡澄线之后，即向苏皖边境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转移。只七十八军宋希濂是调到南京整补的。胡宗南的第一军则在镇江附近整补，在掩护南京防守部队占领阵地后，即向长江北岸转移。

过了两天，大约是十一月的十五、六，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

會議。參加的人比上次多一點，除了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劉斐之外，還有唐生智、谷正倫，另外還有一个人，姓名記不清了。談到守南京的問題時，唐生智主張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國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系，又是孫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放棄南京，將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劉斐仍主張只用十二至十八個團的兵力，作象徵性的防守，并把當時敵我形勢談了一通。實際當時主力部隊已下令向廣德、安吉、寧國一帶退却，連陳誠、顧祝同等都已到皖南一帶去部署部隊的整補工作去了。蔣在這次會上又沒有作肯定的決定，也沒有要改變以前的部署，只說“孟澹（唐生智的號）的意見很對，值得考慮，我們再研究研究！”

又過了一天的晚上，接着開第三次幕僚會議。唐生智仍堅持固守南京。蔣介石明確地同意他的意見，並問：“誰負責固守南京為好？”這時沒有一个人作聲。最後唐生智打破了一時的沉寂，堅決地說：“委員長，若沒有別人負責，我願意勉為其難，我一定堅決死守，與南京城共存亡！”蔣說“很好，就由孟澹負責。”蔣并望着何應欽說：“就這麼辦，有甚麼要準備的，馬上辦，可託孟澹先行視事，命令隨即發表。”

蔣在決定固守南京的方針後，一面決定遷都重慶，表示要長期抗戰，但同時並沒有放棄投降活動。那時日本空軍已對南京進行過三次空襲，其中有兩次投彈在中華門外的飛機場。所有中央機關各部門都已紛紛遷往武漢，只有很少數的人還在南京。蔣為避免敵機襲炸，住在中山陵下邊樹林蔭蔽的“四方城”的一幢極小的房屋里，全部只有兩間小房。蔣吃飯、會客、辦公，都在一間小房里。汪精衛却住在中山陵園他自己的房子里，勾結德國大使陶德曼作投降活動。他一方面對蔣介石建議投降，一方面找作戰組探

听军事消息。当他晓得前线部队溃退下来的紊乱，乍(浦)嘉(善)吳福线上站不住，乃至沿太湖南岸西进的敌人将向南潯压迫，迂迴錫澄綫的后方，或直驅蕪湖截断南京后路等情况时，就乘船去汉口了。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在武汉发表过关于迁都的談話。

蔣介石决定了南京防守方針后，唐生智在十一月二十日先行到职(命令二十四才发表)，組織南京卫戍长官司令部。首先把七十八軍宋希濂部由第三战区预备序列調归卫戍部序列，并准备調六十六軍叶肇部也参加防守南京，此外参加防守的还有原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宪兵团等。防守計劃大体分作两綫配备。即一部占领自京蕪路上的大胜关起，至淳化鎮、湯水鎮、龙潭这一弧形綫的前进陣地。主力占领复郭陣地，就原有永久工事增强成为閉鎖式或半閉鎖式陣地。在防御方針上則已改为固守性防御了。大約是二十七、八日左右，敌人已經越过錫澄綫繼續西进一两天的样子，蔣介石以計劃已定，让作战组的人先走，他說他准备坐飞机走，还緩些时沒关系。后来蔣介石在南京又大大增加了防守南京的部队，就地由东战场第三战区序列抓去的不算，連在武汉的第二軍团徐源泉部也正在向南京輸送中(后来这个部队到十二月八日才在南京煤炭港最后登陸完毕，立即投入火綫 到十二日晚又向老家湖北麻城逃跑)。同时傳聞汪精卫还是搞了一幕投降活动，听說由外交部长徐謨陪同陶德曼到南京去同蔣介石談过“和平”条件(詳情不明)。

三

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福为參謀长。从他坚持固守南京的一切姿态来看，象煞是有

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的。唐就职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闻记者谈话,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在唐生智以固守南京为目的的方针指导下,就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把一切可以调得动的兵力,都调去防守南京,以致兵力愈增愈多,共计达到十多万人。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曾召集守军高级将领讲话,要他们死守;并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说,现在云南的部队已经在开拔途中,只要他们死守下去,不久他就会亲自率领强大的军队来解他们的围,歼灭入侵的敌人,光复国土云云。

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还要交通部派俞飞鵬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那时日军对南京分三路进攻:右路敌主力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阳、句容攻南京;左路由太湖南侧西进,先攻广德、宣城趋蕪湖,截断南京守军退路,再向南京合围。十二月四日右中两路敌人攻陷句容、秣陵关,向南京外围阵地猛攻,至十二月八日先后攻陷淳化镇、汤山、龙潭各地。这时,敌左路也攻陷蕪湖,即北向于十一日陷当涂,继续向南京攻击前进。南京外围前进阵地守军已逐次退入复廓阵地固守。

占领南京外围阵地的敌人,从十日起对复廓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对各城门猛轰。当天下午就有一部分敌人窜入光华门外廓,经尽力反击,到黄昏时才把窜入的敌人

打退，搶修好被轟毀的城牆缺口。繼續戰鬥到十二日正午，敵主攻方面的雨花台被敵攻陷。那里的守軍八十八師孫元良部由城牆爬進城內，徑趨挹江門，企圖由下關渡江脫逃。經衛戍司令部指定的戒嚴部隊宋希濂部堵攔，收容約二千人，仍由孫元良率領回中華門附近作戰。到下午四時許，俞濟時部七十四軍又由三汊河向下關搭浮橋，作向下關撤退準備，又經戒嚴部隊請示長官部制止。這時，敵員猛烈攻城，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峯據點被敵占領，但戰鬥並沒有到最後分曉階段，至於說到“圍守南京”或給予敵人應有的損失，自然更是談不上。

可是，據說就在當天下午五時左右，唐生智突以徵求各部隊長意見為名，召集了一次會議。在會上也沒有經過任何討論，就命令參謀長周繼把油印的突圍命令交付各部隊長，只說了聲“照命令規定的辦！”命令指定宋希濂的七十八軍掩護長官部直屬部隊在下關渡江後繼續渡江；其餘部隊由正面突圍。真是說時遲、那時快，自告奮勇要死守南京的唐生智，馬上同幾個重要人員登車駛向下關渡江去了。聽說當他船到江心，却被守在浦口的第一軍擋駕。即根據他自己原來的通知不准任何軍人渡江，嚷着要開槍射擊。經過再三央告，才讓他登上了北岸。

當天夜晚從挹江門到下關一帶就進入了混亂狀態，渡江船只又少，當宋希濂隨直屬部隊第一批渡江後，再把船隻放回南岸繼續渡江時，只見人人爭渡，個個搶先，於是有的船因載重過量沉沒了，有的船渡到中流又被岸上沒擠上船的開槍射沉了，連掩護渡江的部隊也有許多過不了江。同時長官部草率的指示突圍，有的部隊並沒有人到會，也沒有接到突圍命令，如徐源泉的第二軍團，因戰鬥中被敵炮把通信綫打斷了，同長官部失去了連絡，用電報同長官部連系又得不到回電，直到當日（十二）夜半才從避難的船伏口

中知道下关紛紛撤退的情况，就独断由龙潭附近渡江向合肥撤退。本来十二日入夜以后，战况非常沉寂，反是南京守军在下关自相践踏，乱得不可开交，使许多人淹没在江里。因为许多部队并没有由正面突围，一起拥到下关去了。实际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障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自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是比较安全的。如六十六军叶肇部就是抱定与其淹没在江心，何如与敌一拼的决心，就由太平门出城，经紫金山北麓，沿途同敌人虽有几次遭遇战，终于经句容、溧阳安全到达宁国集中。

当时，有些部队没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就一走了事。所以到十三日，敌人既没有进城，下关一带还在纷纷地搭木筏抢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没到江中去了。也有许多失去了官长率领的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象无舵漂船不知往何处去好；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员会交出武器请求收容了事。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象尘土一般一阵风吹散了。至于敌人进入南京后，大肆劫掠、屠杀，牺牲我几十万无辜人民，写下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记录，姑不在这里说了。

在蒋介石的投机性和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使上海会战陷于被迫撤退，敌就跟踪追击，一举直迫南京而占领了南京。国军主力损失惨重，多数已不能成军，给尔后抗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困难，是无法估计的。如果蒋介石在上海会战后期，不对九国公约存有幻想，不改变及时主动撤退的决心和已下的命令，适时保全实力，主动转移到吴福线，就能利用永久工事，更能继续消耗敌人。即使还要从吴福线后退时，也可以利用锡澄线及镇江以西的山地，继续抵抗，而南京附近的作战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到来。就是打到南京来了，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把大部分兵力控置

在南京外圍，利用外綫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亦可以争取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因为上海会战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圍，敌就不能从南京抽調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失守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隴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維持和补充战力，增补第一綫的打击力量，繼續贏得时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南京过早淪陷是蒋介石一手种下来的恶果。为甚么对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会这样儿戏对待呢？据事后所聞，因当时汪精卫主“和”，所以他主张固守南京。他认为日本人是耍逼中国为城下之盟，不会真正进攻南京。如果它攻下南京，则战争非长久打下去不可，“和”的文章就做不成了。这是汪的看法。蒋介石呢，他本来沒有抗战的决心，不过为了他个人的地位不得已才抗战。因此他一味想投机取巧，在上海作战时想依賴九国公約制裁日本来达到和局；到南京作战，又想依賴汪精卫和陶德曼搞“和”，想以固守来达到“和”的目的。总之是沒有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在战争指导上处处被动。唐生智之主张固守南京，并自告奋勇要与南京共存亡，据事后傳聞，也是幻想日本侵略者不会真正攻南京，或对南京采取攻而不下政策，以逼蔣为城下之盟，并揣測蒋介石是会接受的。那么，他死守南京就可以功成名就，坐享其成。到日本侵略軍拿出兵刀真枪进攻时，他就三十六計之中，馬上选择了“走”的上計而溜之大吉。

这样一来，蒋介石想利用唐生智死守南京，以使他依賴陶德曼和利用汪精卫搞“和”服务的目的就完全落了空。蔣这一气，可真是非同小可，所以在以后抗战的全期間再也不使用唐生智了。

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記

宋 希 濂

一 抗战开始蒋介石就无决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于十七日在江西庐山宣布对日抗战。他对芦沟桥事件的解决，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并云“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虽然这样，是不是可以说蒋介石对于抗日确实具有决心了呢？不，蒋介石在战争的开始就是没有决心的。我写这篇亲历記，是要用铁的事实来证明蒋介石在抗战一开头就是动摇的。

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争爆发，一直打到十月底。蒋介石调动了七十三个师参加上海战场的作战，占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部队三分之一强（当时全国约有一百八十个师）。在这个战场上确实做到了寸土必争，给日本帝国主义以相当大的打击，迫使日军从原有的海陆军战队一个混成旅（约八九千人），陆续增加到十二个师团的兵力。据日本陆军省于十一月初宣布，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日军在上海战场死伤四万多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大为缩小了的。当时日军在海空军方面占绝对优势，即使依据死伤四万多人来说，也可想见当时战争的激烈程度。所以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日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历史事实。但当时国民党政府没有建

立后备部队，临时征调兵员，缓不济急。这些新兵又未受过训练，如何能从事这样复杂和激烈的战争呢？参加上海作战的各师，绝大多数到十月中旬已伤亡甚重，每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二、三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以后改称军令部），鉴于已被日军攻占浏河、刘行、江湾、閘北、真如等地，后方又无兵力可以增援，主张迅即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撤守福山、常熟、苏州、吴江至嘉善、乍浦之线，以有力的一部占领江阴、无锡至嘉善、海盐之线，从事整补。这两条线是既设障地，轻重机关枪掩体，星罗棋布，全是钢筋水泥做的，还有许多半永久性的工事。这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约两年半的时期内，派了三十六师、五十七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等四个师和几个工兵团构筑的。如果及时撤守这两条线，一方面可以节约兵力，使许多部队得到补充和整训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迟滞日军的前进，以空间换取时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了若干土地，但我们是个大国，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以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蒋介石如果真有抗日的决心，是没有理由拒绝这样做的，但他却把这个计划搁置不理。他于十一月一日晚由苏州乘火车到了南翔附近，同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开会，除以约半小时的时间听取了几个高级指挥官的战况报告外，蒋介石讲话约四十分钟。他讲话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而尤侧重于后者。前一部分他概括了“八一三”以来敌我双方作战的经过和国际间的一般反应，并对前线官兵的英勇斗争作了一些表扬和鼓励。紧接着他就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

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反复地阐述这番话，语气也很坚定。说完他就走了。

十一月五日晨敌以军舰多艘炮击金山县属金山卫一带，掩护海军陆战队在漕泾镇、平湖县全公亭及金丝娘桥登陆，同时以敌舰数艘，向海盐城及乍浦岸上炮击。敌军登陆后，分两路进犯，一路由全公亭趋新仓，一路由漕泾镇及金丝娘桥登陆者在黄埭会合趋张堰镇。六日抵松隐镇，七日占米市渡，八日敌军窜至石湖荡、张庄市，进陷松江。侵占松江之敌，以一部沿沪杭铁路向上海前进，以主力疾趋青浦、南翔，企图将在沪西北区的国民党军队加以包围歼灭。自“八一三”上海战争一爆发，我就率所部第三十六师（约一万人）投入战斗，在江湾天宝路一带，与敌军周旋了两个多月，无日不战，伤亡逾万。这一期间曾有三个补充团拨给我师补充，有许多士兵姓名尚未登记，便在阵地上牺牲了。当时的战斗确是很激烈而紧张的。十月二十八日，奉令撤到苏州河南岸据守。我的指挥所设在沪西的罗别根路，敌军曾数次施行强渡，均被我击退。至十一月六日，敌又集中优势炮火轰击我阵地，掩护其工兵进行架桥作业。随着敌步兵强渡成功。我军仍在河畔逐点据守，阻其扩大，但战况已益趋严重。因当时所有退守苏州河南岸的部队均伤亡甚大，又无兵力增援。我原归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朱之前任为张治中）指挥，退到苏州河南岸后改归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指挥，他的司令部设在青浦附近。九日下午六时，张发奎和我通电话，说“委员长命令我军务必在沪西再支持几天”。但到八时，张又突来

电话，命本师于当晚立即向昆山方面撤退。九日这一夜的退却，简直是混乱极了。因为自沪西经青浦、南翔至昆山一带地区，全是河汉纵横，没有一处可以徒涉，只有一条公路可走。所有部队全沿这条公路向西去，大家争先恐后，拥挤不堪。各级指挥官对自己的部队完全失了掌握。自青浦至南翔间的苏州河大桥被敌机炸毁了，所有车辆无路可走，拥塞于途。加以深夜过青浦时，西南方向机关枪声很浓密，说明日军已逼近青浦。大家为避免使自己部队陷于敌军包围圈，更是拼命向前赶，形成极度的纷乱。敌军编组了几个小规模的挺进部队，从青浦以西地带挺进到苏州河北岸的南翔至昆山间公路上。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司令部在南翔西南角的苏州河畔，遭受敌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人员及警卫连被打死者甚多，胡宗南只身逃出。薛岳（那时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乘小汽车自南翔前往昆山，被敌军机枪扫射，司机和他的一个卫士被击毙，薛岳从车上跳到一条河沟里，幸免于难。我于十一日在南翔附近将部队收容掌握后，于是晚越过沪宁铁路以北地区绕道前往昆山。到达昆山时，陈诚的总指挥部（陈诚那时担任前敌总指挥）已经撤走，那里只有一些找不到自己单位的小部队和溃散的士兵。我得不到任何指示，便率部退往苏州。大约是十七日黄昏时到达苏州的，这个古城已是死一般的沉寂，街上店门紧闭，阒无一人。我走到电话局去，和在无锡的顾祝同（顾那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负东战场指挥之责）接通了电话，他叫我迅即开到无锡去。当晚继续西行，于十九日正午到达无锡，即往见顾祝同。他告诉我，军委会命令三十六师立即开南京，运输部队的车辆已通知铁路局准备，要我速往接洽。同时他对我说，这次撤退很仓促，许多部队弄得十分凌乱，致不能按照预定计划占领阵地阻止日军的前进，苏州已于

本日晨失陷，情况很紧迫云云。不久无锡、武进、宜兴等地相继陷敌，国民党军队毫无抵抗，敌军长驱直入，很快就进抵南京附近。这次撤退的混乱，在战史上是罕见的。以这样大的兵团，既不能进行有组织的逐次抵抗以迟滞敌军的行动，又无鲜明的退却目标，造成各部队各自为政，拚命地向西奔窜。战场统帅部对许多部队都不明白其位置，遂使敌军如入无人之境。各级指挥人员没有适当的退却部署，不能切实地掌握部队，当然要负丧师失地之责。但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在抗战的开端就没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希望依赖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施加压力后，与日本进行丧权辱国的和谈以谋结束战争。以这样的主导思想来指导战争，所以弄得一败涂地。

二. 唐生智表示死守南京

我率残部三千余人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到达南京，下午四时往见蒋介石。他这时住在中山门外四方城的一栋小平房里，为的是避免敌机的轰炸。我见他时，看出他的脸色憔悴苍白，情绪却很紧张。他向我询问部队的实力情况以及沿途所见情形后，就说：“调你回来，是要你参加守卫南京的任务，归唐司令长官指挥。何部长尚在南京，需要补充的兵员武器器材等，可即向何部长报告。”我在蒋那里出来后，即到三牌楼军政部见何应钦，这时军政部绝大部分人员都已迁往武汉，仅有少数人员随何留京。这位何部长实际上是一位亲日派，他是一贯不赞成对日本采取抗战政策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军的挑衅进行英勇抵抗，我那时任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率部驻南京，曾向何应钦要求开往上海参加作战，何不许；我率干部三十余人于一个深夜闯入何

的公館向他請願，軍官們由於情緒的憤激，言辭間予以相當的難堪，因此他大為不快（此事當另寫短篇敘述）。這次一見面，何就對我說：“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經過五十年的努力，發展成為世界上頭等強國，擁有現代化的陸海空軍。而我國沒有自己的工業，機槍大炮，都要從外國買來；國家內部不統一，民眾又無組織，怎能從事這樣大規模的戰爭呢？”接着他對於在上海戰場犧牲之大，損失之重，以及兵員物資等方面補充的困難，表示搖頭嘆惜。最後他將駐在蕪湖的兩個補充團約有四千多人撥給我師補充，要我迅即派人前往接收，同時撥發了一部分輕重機槍、步槍及通信器材工兵器材。我於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先後會見了唐生智、白崇禧、張羣、王俊（第一師次長）、饒大鈞（蔣之侍從室主任）、蕭自誠（蔣之秘書）等人，大體了解到關於守衛南京的會談經過及計劃。

自敵軍在金山登陸，上海戰局急轉直下之後，“守不守南京”成為當時軍事上的中心問題。蔣介石於十七、十八兩日曾三次邀集何應欽、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劉斐、谷正倫等人開會。大多數認為今後進入持久抗戰的局面，從長遠和全面的觀點著想，應以保存力量為上，均主張在原則上不守南京，只用少數兵力——最多六個團到十二個團——作象徵性的守，並曾擬議以四川劉湘部的兩個師擔任。唐生智獨持異議，堅主死守。其理由認為南京是首都，也是孫中山先生陵墓所在，為國際觀瞻所系；守南京才足以表現我們抗戰的意志和決心，並牽制敵軍的兵力。由於意見分歧，在頭兩次會議上未作出決定。到十八日晚最後的一次會議，蔣介石說：“南京是國家的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系，對全國人心也有重大影響，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應較十二個團的兵力酌量增加。”隨著蔣介石就問：“守南京問題就這樣決定，大家看誰來負責好？”

当时都没有人作声，沉默了一回。唐生智自告奋勇说：“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苟安。如果委员长还没有预定人来担任，我愿负此责任，誓与南京共存亡。”蒋问大家的意见如何？何应钦说：“孟潘兄愿意担任是最适当没有的了。”大家都无异议。蒋介石于十九日以手令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唐生智于二十日视事，并发布告。但国民政府的正式命令至二十四日才发表，唐先视事后奉令，可想见当时南京的仓皇情况。张琴也是不赞成守南京的。他认为没有守南京的条件，不可能长期固守。他另外还有一种见解，曾对我说：“如果我军自动退出南京，日军不是以武力攻占的。万一将来和谈时，它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对我进行要胁。”这一位亲日派在那样举国一致，全面抗战的重要关头，仍念念不忘和谈。何应钦、张琴是蒋介石的知心朋友，也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极为重要的助手。他们对抗战的态度是这样，也就可以想见蒋介石的所谓“全面抗战”、“抗战到底”的话，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了。

唐生智于二十日就职后，立即组织司令部，设置于铁道部内。在十八日的会议上，大体决定了守卫南京的部队为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七十八军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宋兼师长），七十一军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七十二军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孙兼师长），第十军徐源泉所部丁治磐的四十一师、徐继武的四十八师，以及宪兵两个团，炮兵第八团的一个营和战防炮、高射炮、通信营等，共约七万人左右。长官部策定的守备计划，概要如左：

（一）以第十军在栖霞山、乌龙山地区占领阵地，联系乌龙山要塞炮台严密封锁长江，并竭力阻击沿铁道西进之敌。

（二）以三十六师在红山、幕府山、下关、挹江门附近占领阵

地，联系獅子山要塞，阻击来攻之敌。

(三) 以教导总队在紫金山、麒麟門、中山門一带占领陣地，拒击由京杭公路来犯之敌。

(四) 以八十七师守备光华門、紅毛山及通濟門营房一带。

(五) 以八十八师守备雨花台、中华門一带。

(六) 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城内，担任治安的维护及防空等任务。

唐生智于二十七日对新聞記者发表談話，略謂：“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我依据长官部颁发的守备计划，于二十五日率部到达指定地区，給予各部队的命令要旨如下：

师以协同友軍固守南京之目的，决心于紅山、猪头山、幕府山、下关、和平門、挹江門附近地区占领陣地，利用工事，联系要塞，主要以火力歼灭来犯之敌。

重点：东正面指向紅山，西正面指向下关附近。左右依托玄武湖与幕府山要塞。

陣地工事——就原有之永久工事为基础构筑。视情况予以加强，构成坚固閉鎖式或半閉鎖堡垒。利用前进陣地，警戒陣地顽强抵抗，消耗敌人，并掩护主陣地。

师之騎兵連主力位于大水关，一部位于燕子磯，搜索敌情。受敌压迫时，由和平門退回预备队位置。

一〇八旅担任东正面紅山、北固山的守备，右与教导总队联系，左与一〇六旅联系

一〇六旅担任挹江門、和平門至晓庄师范学校一带的守备，右与一〇八旅联系，左与宪兵团联系。

同时划定了各部队的作战地域。师司令部位于挹江門附近。

在九月下旬，軍事委员会发表我为第七十八軍軍长，但所指挥的部队实仅为三十六师。自率殘部三千余人到南京后，接收了补充兵約四千人。虽然有了七千多人的一个师，但大多数新兵都是才入伍的，有的还没有摸过枪，射击要領一点也不懂。部队开到陣地后，一面做工事，一面教射击，并做了一些石灰堆，要新兵进行实弹射击。

现在就守卫南京的兵力繼續增加的情形加以說明：

上文我已說过，自上海战局形势逆轉后，退却紊乱不堪。第七十四軍軍长俞济时率所部五十一师王耀武部，五十八师冯圣法部，与战区长官司令部完全脱离联系，自苏州一直退到南京附近的句容、湯山一带。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曾充当蒋之侍从人員及警卫旅长多年。他到湯山后便来南京見蒋介石，蒋也沒有責备他，就叫他率部参加守卫南京，經唐生智賦予这个軍以守备淳化鎮、牛首山一带的任务。这大約是十一月廿七日前后的事情。約再过了两三天，又有第六十六軍軍长叶肇率所部一五九师譚遵部及一六〇师（叶肇自兼），第八十三軍軍长邓龙光率所部一五四师巫剑雄部、一五六师李江部（这两个軍都是广东部队）自鎮江退到句容、湯水鎮一带，經唐生智报告蒋介石核准命叶、邓两軍均参加保卫南京的任务。卫戍长官部令这两个軍在湯水鎮东西之綫占領陣地，阻击沿京杭公路向北进犯之敌。这样就形成了以第十軍、第六十六軍、第八十三軍、第七十四軍守卫南京外圍陣地，以三十六师、教导总

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守卫南京复廓阵地的两线配备的态势。增加了六十六、七十四、八十三三个军，由于部队的残缺，这三个军合计实有兵力约为四万人左右。加上原有的，保卫南京的总兵力约为十一万多人。

三 德国大使陶德曼到南京的内幕

截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止，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都已迁移到武汉或重庆去了。在“八一三”上海战争未爆发以前，南京人口约为一百万人，至此所存者仅三十余万人。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亲自带着唐生智、罗卓英、周翔（长官部参谋长）、王敬久、孙元良、宋希濂、桂永清、邵百昌（江宁要塞司令）等人到紫金山、雨花台、狮子山炮台等处视察了南京的复廓阵地。政府的重心移至武汉去了，蒋介石在南京已经无事可做，为什么还不走呢？这是一个谜。在视察城区阵地完毕的那天，我问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委员长和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南京？”钱悄悄地对我说：“还要几天，德国大使陶德曼日内就要来京见委员长。”我觉得突然，就追问：“陶德曼这个时候到南京来干什么？”钱说：“还不大清楚，可能是德国想来斡旋和平。”过了几天，我向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自诚了解陶德曼来京的内幕。他告诉我说：“陶德曼这次来京见委员长，是想由德国调停中日战争，他转达了日本所提停战条件六项：（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三）扩大“淞沪协定”非武装区；（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委员长曾征询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的意见，他们均表示可以接受。电商阎锡山，也表示赞同。委员长向陶德曼表示，可以将以上条件做谈判基础，但对日本不敢

信任，日本說話可以不算數，德國是好朋友，要求德國須始終担任調人到底。”同时又對我說：“德國希望中國參加反共反蘇陣綫，自不願中日間的戰爭演變為長期性的。日本對中國的政策亦不希望進行長期戰爭，它是採取逐次吞併的策略；因而和平談判的可能性頗大。如果談判，總需要一些時間，日軍在這期間大約不會進攻南京。這樣，我們可利用這個機會把部隊整頓充實一下。”這虽是蕭自誠的話，實際上就是蔣介石的想法。

十二月四日晚八時蔣介石到鐵道部南京衛戍長官部所在地，召集師長以上的高級幹部講話，內容要點為：（一）抗戰五個月來，雖然軍事上是暫時的失敗了，喪失了許多地方，但也給了日軍以相當大的打擊，使日軍不能達到它速戰速決的目的。（二）由於我國的英勇抗戰，獲得了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援。（三）為什麼要守南京呢？因為南京是我國的首都，又是總理陵墓所在，為國際觀瞻所系，同時對國內人心的影響也很大，所以必須固守。（四）守南京可以牽制敵人兵力，而使其他部隊得有喘息和整補的機會。（五）希望大家抱定決心，努力固守。現雲南部隊三個師裝備齊全，兵力充實，又有作戰經驗，不久就可到達武漢。我將親自率領這個部隊從皖南方面來解南京之圍。（六）守衛南京是一個偉大而光榮的任務，大家要在唐司令長官指揮之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決心，克盡軍人守土衛國的神聖職責。”蔣介石講話一個多鐘頭後，唐生智以悲壯的語調表示誓與南京共存亡。最後蔣囑大家要效法唐長官的決心和精神，服從唐長官的指揮，努力達成任務。從上述蔣介石的講話，可以看出他的內心是多麼空虛，身為全國軍隊的最高統帥，由於在平漢路和上海戰場的大潰退，部隊完全失去了掌握，腦筋里所有的就是从雲南開出來的三個師，他將親自率領來解南京之圍。如果說

他当时的动机不是虚伪欺騙的話,至少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于十二月五日(或六日)晨乘飞机离开了南京。

四 敵軍三路进攻势如破竹

自敵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占領无錫后,即策定分三路进攻南京的計劃。东路沿沪宁路进袭鎮江后即向南京进犯;中路沿宜兴、溧阳、句容,直犯南京;西路則先趋广德經宣城攻蕪湖,截断我南京守軍的退路。东路之敌陷鎮江后以一部沿铁路西进,于十二月七日与我栖霞山守軍第四十八师接触。东路敵軍主力沿沪宁公路西犯句容,于十二月四日攻陷;至六日,句容之敌北犯湯山(即湯水鎮),与我第六十六軍发生激战。中路之敌自陷宜兴后,即沿京杭国道繼續北犯,先后进陷溧阳、溧水,于十二月六日进抵淳化鎮。与我第五十一师发生激战。西路之敌自陷广德后,即繼續前进,向郎溪进犯,在七里店、陆家鋪、长乐鋪等处,利用水道,以小汽艇前进,占領郎溪;于十二月六日渡丹阳湖南岸,威胁我蕪湖后方。同时,一部敵軍,由十里岡越南漪湖之西陈村、双塘店进犯宣城;七日,敵軍用战車冲入城内,遂陷宣城,旋犯湾沚鎮。八日,敵軍之第十八师团及伪滿軍于芷山旅猛犯蕪湖,国民党守軍及行政專員、县长等均弃城逃去;敵軍进城后,屠杀我市民二千余人于江边。至十一日,南京与蕪湖間之当涂,亦被敵軍占領。至十二月八日我第六十六軍、八十三軍部队在湯水鎮东西之綫遭受敵軍重大压力,放弃該地,轉移至城郊紫金山东北地区;同日,我七十四軍退出淳化鎮大胜关一带,并在大胜关东北地区繼續与敌激战;我四十八师仍在栖霞山附近与敵軍对峙。自六日以来,敌經常以大批飞机轰炸城内及城郭附近各要点。

十二月九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要旨如下：（一）敌军已迫近南京，我軍目下占領的复廓陣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綫。各部队官兵应抱与陣地共存亡的决心，尽力固守，不許輕弃寸土，动摇全軍。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员长命令按連坐法从严惩办。（二）各部队所有船只，一律交本部运输司令部負責保管，不准擅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軍軍长宋希濂負責指揮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

十二月九日敌围攻南京城更为逼近。我七十四軍在大胜关、牛首山一綫被敌军攻破，节节后退，被迫轉移至水西門附近担任守备；旋敌军追至，即在水西門外之上河鎮一带与敌发生激战。栖霞山被敌军攻占，我四十八師退至和尚桥附近与第四十一師协力在該地一带占領陣地。淳化鎮之敌军主力，陷高桥門七壘桥，遂沿大路向光华門进攻；另一部占領通济門外的营房，并向通济門进攻。沿京杭国道由湯山向南京进攻之敌，于九日向我教导总队守备的老虎洞、体育场、馬羣、孝陵街西南一带高地（这是前进陣地）展开攻击；我守軍受敌軍的攻势压迫，于是晚放弃了这条前进陣地，退守紫金山第二峯麟閣寺西山之主陣地。十日，敌围攻南京复廓陣地甚为猛烈，午后敌军一部突入光华門外廓，經教导总队与八十七師协力反攻，至黄昏始恢复。十一日，全綫都在激战，我守軍增援城防，并作巷战准备。十二日，敌军第九師因主力猛攻中华門外重要据点雨花台，守軍八十八師伤亡惨重，至正午雨花台陷落。敌军占領雨花台后，迅即以重炮向中华門裹击，同时敌以一部分炮火向城内新街口、中山东路等处射击，有許多建筑物被毁，震裂声震动全城；有三处起大火，黑烟冲霄汉。自雨花台陷落后，八十八師全部

守各中华門，受敵軍重炮的襲擊，敵步工兵逼近城垣。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於十二日下午二時左右率所部二千餘人向下關方面逃竄，企圖過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負責堵阻。我當力勸孫元良萬不可這樣擅自行動，孫為情勢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華門附近。敵軍第六師團主力於十二日拂曉猛攻教導總隊在中山門外的主陣地帶，中山陵園、遺族學校、關王墳一帶激戰甚烈；至午後陣地多處被突破，敵軍逼近中山門，但紫金山主峯尚在我軍固守中。敵軍另一旅團本日上午突破我四十一師、四十八師在和尙橋附近的陣地，占領揚場山、銀孔山一帶，繼續向烏龍山要塞進攻，並有一部向西竄犯。另有敵軍一部占領江心洲等處，其主力與我七十四軍在上河鎮及水西門附近發生激戰。圍攻南京之敵為第六、第九、第十二師團及第五師團之第九旅團。十二日敵軍對南京城的攻擊達最高潮。敵重炮猛襲中華門，有數處倒塌，敵步兵在其炮火掩護下蜂擁而上。守軍八十八師抵擋不住，撤離中華門。至此，南京城被打開了一個缺口。

當戰爭將逼近南京時，曾有些人士及外國傳教師等，倡議組織難民區，經衛戍司令長官部核准劃中山北路以北地區，即自新街口為起點至山西路止，這區內約可容二十五萬人。中華門至花牌樓一帶，原為居民聚居的地區，尤以世代生長在南京的人及無力他徙的貧民，多半是住在這個地區里。十二日敵軍猛攻中華門，這一地區落的炮彈頗多，許多房屋被毀，遂使這一帶的居民發生恐慌，紛紛趕往安全區。當其奔走逃難之時，更高呼親友，告以日軍已沖入城內。而潰退的八十八師及一些高射炮隊等亦加入退却。至是，自中山东路起通往下關江邊之公路上，擁擠不堪，紛紛爭先，梗塞于途。亦有益於奔逃，而將各物拋棄途中者。逃難中的居民及一部

分散兵，亦有迁入难民区者。总之，十二日下午形成了极端混乱的状态。

五 惨死同胞三十多万人

十二日下午二时卫戍司令长官部指示本师：（一）下关通浦口为我军后方唯一交通路，应竭力维持秩序，严禁部队官兵及散兵游勇聚集，以确保要点。（二）第七十四军在上河镇与敌激战：其后方交通应由汉西门与城内連絡，禁止该军部队通过三汊河退入下关。（三）着该师在挹江门至下关一带，立即施行戒严，禁止一切活动。至四时左右，七十四军在三汊河搭浮桥，企图退入下关，经唐生智命本师予以制止。

自十二日下午二时敌军攻占中华门，中山门外的战斗亦异常激烈。敌军猛攻乌龙山要塞，情况十分紧张。敌海军舰队正在乌龙山附近江面清扫鱼雷，排除航行障碍物；同时得知侵略当涂之敌，已在该处渡过长江，向浦镇前进中。卫戍司令长官部认为情况异常严重，战局难以挽救，遂于下午五时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首由唐生智简要地说明战况，并提出分路突围的计划，征求各主官的意见，大家均无异议。于是长官部参谋长周焯以印刷好了的命令发给每人一分，会议只历时二十分钟就散了。命令规定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得继续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广德、宣城、蕪湖間地区——突围。但除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率所部绕过栖霞山附近之敌军間隙突围成功外，其余多拥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这就造成了十二日晚間在挹江门下关一带的极度混乱，也造成了战史上的极大悲剧。

下关浦口間原有兩艘渡輪，每次可載七、八百人，往返一次約需時四五十分鐘；那時下午五時就天黑了，早晨要到七時才天亮，即夜間有整整十四個小時可以航行（因白天敵機活動頻繁，不敢開行）。如果衛戍司令官部的運輸機關能確實掌握這兩艘渡輪，則至少可以運送三萬人過江，但是他們却让這兩艘渡輪開往漢口去了。留存在下關江邊的，只是幾艘小火輪（最大的只有一百多匹馬力和約二、三百只民船，這樣多的人要過江去，而船隻却這樣的少，因而就發生了許多悲慘事件。長官部召集的會議散了後，唐生智等立即開始渡江，但各部隊均不遵令突圍。教導總隊、八十七師、八十八師、七十四軍、六十六軍及南京警察等，均沿中山路擁向下關，爭先搶過挹江門，互不相讓，并曾一度與守挹江門之三十六師二一二團部隊發生衝突，秩序混亂達于極點。隨之下關亦亂，船隻既少，人人爭渡，任意鳴槍。因載重過多，船至江中沉沒者有之；因爭奪船隻，互相開槍斃傷者有之，將船擊毀沉沒者亦有之。許多官兵拆取店戶門板，製造木筏，行至江中，因水勢洶湧，不善駕御，慘遭天頂者數以千百計。哀號呼救之聲，南北兩岸聞之者，莫不嘆傷感泣，真可謂極人世之至慘。

十二日下午五時半我在長官部開會回師部後，即以電話令各部隊嚴密戒備，掩護唐長官等渡江，至八時左右長官部人員已渡江完畢。我於八時三十分集合各部長面授要旨：（一）軍掩護長官部渡江後陸續渡江；（二）一〇六旅之二一二團擔任挹江門至下關一帶的警戒，待命渡江；（三）一〇八旅留一部擔任和平門、堯化門等地的警戒，待命渡江；（四）無任務之部隊，本（十二）日晚十一時開始移動，至和記公司附近集合，歸一〇八旅劉旅長英指揮；（五）各部隊概由金川門出城，不准經過挹江門。我率師司令部人員及直

属队于是晚十二时到达和記公司附近，当觉得小汽艇两艘，民船十五只，即开始渡江。第一次渡江后，派人将船押回江南續运。但應集下关之其他部队均向和記公司附近拥挤，三十六师的部队多被冲乱，有些船亦被他們搶渡去了。至十三日晨八时止，本师渡江到了浦口的約为三千人，未能渡江者占半数以上。有二一二团营长謝淑周因部队被冲散，又无船可渡，他和两个传达兵扎了一个木筏，三人坐其上，放之江中，随波逐流，順江而下。行至烏龙山附近江面上，被敌艦发现，用机枪扫射。有一传达兵中弹殞命，他們将之推入江中，繼續漂流。一直流至揚州附近十二圩，才被船戶发现救起，在一个乡村里換了衣服，步行至津浦鐵路之张八岭車站始获归队。

十二月十三日敌軍入城后，纵兵放火，奸淫屠杀。将我无辜民众及失去抵抗力之徒手士兵，用繩索捆绑，每一百人或数百人連結一团，用机关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据后来远东国际法庭对敌酋谷寿夫判决书調查証明：我軍民被敌射杀火焚活埋者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的尸体經收埋者十五万余具，总计我惨死同胞三十多万人。日軍在城内以“杀人竞赛”取乐。被奸淫妇女少者才九岁，老者到七十六岁，有的奸后又被剖腹。实为現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殘暴记录。

南京的失陷和同胞死难的惨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悲剧。除日軍那种极端殘暴的行为外，在我国方面，参加保卫南京战役的高级干部，都是有責任的。尤以象孙元良那种卑鄙可恥的行为（孙元良于十二日下午五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沒有回部队，脫去軍服，換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鴿母做干媽，迁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月，后以日軍疏散难民，才混出来），更是罪不容誅。但主要的責

任應該誰負？我的結論是：蔣介石。由於蔣介石從一開始就沒有打到底的決心，總想依靠什麼“國際聯盟”，什麼“九國公約”，以及希特勒等人出來斡旋調停，早日結束戰爭，借以維持他的反動統治。這始終是他的主導思想。以這樣的主導思想來指導戰爭，其戰略戰術的着眼，就必定是被動的、投機的。正因為在他這種患得患失的心理的作戰指揮下，喪失了廣大的國土，犧牲了無數的士兵，并使同胞死難者數以百萬千萬計，又豈止南京一役而已！

中華書局編輯部征集 林則徐、朱執信、廖仲愷的資料

我們計劃在今年出版林則徐、朱執信、廖仲愷等人的集子。目前這一工作正在着手進行，為了使這几本集子內容更加充實，更加完備，特征集林、朱、廖等人的作品，包括論著、詩文以及公牘、書札、日記和未經刊印的遺稿。希望保存有這些資料的同志大力協助，惠予借用；無論原件、抄本或照片，均所歡迎。對於提供的資料，凡經採用，當酌致報酬。如系原件，並當負責妥善歸還。此外，還希望了解這方面情況的同志，能提供蒐集資料的線索。來件或通信請寄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組。

1961年2月20日

南京保卫战的回忆

王 耀 武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驻军奋起抵抗，战事甚为激烈。在上海一带地区的争夺经三个月之久，日寇看到由正面攻击，牺牲大而进展慢，就在十一月上旬，派舰队掩护陆军在金山卫登陆，企图包围我国在上海一带的军队而歼灭之。我军被迫撤退，接着就是保卫南京的战役，我当时任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参加了这个战役。兹将回忆到的几点事实写述如下，以供参考。

这年十一月十一日，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率领军部直属部队及五十一师王耀武部、五十八师冯圣发部，由罗店附近向后撤退，行至望亭时，军奉命占领望亭一带掩护各军撤退；任务完成后，经苏州、武进、句容，向南京撤退。到达南京时，军住通济门淳化镇中间地区。该军在上海一带作战牺牲甚众，缺额很多，军长俞济时及一般军官都希望撤至一个较安全的地点，整训一个时期再行作战。俞济时听说蒋介石在南京，就去见蒋报告部队已打残破、需要整训；蒋介石不但未准，而且决定该军加入南京保卫战的序列。（七十四军辖二个师，每师两旅四团，这时全军约有官兵一万七千多人，轻重机枪、迫射炮齐全。该军是国民党军队中装备较好的一个军）。俞济时无可奈何地破留在南京了。俞回到军里对王耀武说：“固守南

京的部队最初并没有把七四军计划在内，第一军胡宗南部都过了长江，现住浦口一带，没有把他们留在南京，反尔把七四军留下了，看情况南京是守不住的。何应欵、白崇禧、以及所见到的其他将领都不赞成守南京，只有委员长和唐生智主张守。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保卫南京的最高指挥官，目的是在做官发财。你看南京能守得住吗？”王耀武回答说：“我看没有守住南京的有利条件：（一）各部队将从上海撤退，士气不振，一般官长身在江南而心已过江北。（二）唐生智的长官部是临时凑合而成的，所指挥的部队是临时调拨的，这些部队他过去都没有指挥过，他不了解各部队的情况，也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三）要守南京城，必须守住城郊的要点，地区大、兵力单、难以形成纵深，易被突破。因此我也认为南京不易守住。”这时不但俞济时、王耀武对守南京没有信心，留在南京的各部队长，也多认为固守南京没有把握，徒遭牺牲。

蒋介石为了鼓励各将领，振奋士气，在南京铁道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保卫南京的军事会议。到会的计有唐生智、罗卓英、钱大钧、王敬久、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孙元良、叶肇、邓龙光、王耀武、冯圣发等人。会场气氛沉闷，悲观情绪笼罩全会议室。蒋介石在会上的讲话要点如下：（一）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为了国际声誉，不能弃之而不守。（二）南京是总理坟墓所在地，我们如不守住南京，总理不能瞑目于九泉之下。（三）大家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四）南京郊区有预先作好的国防工事可利用，兵力部署要纵深有重点，紫金山、雨花台等要点不能放弃，必须坚守。（五）我已调云南卢汉等部生力军集中武汉，以备解南京之围。（六）唐长官见危受命，你们应服从他的指挥。在蒋介石讲完话以后，唐生智接着说：“守南京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这种情形

下，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蒋、唐两人讲话后，到会的将领彼此看看，没有人讲话，关于南京能否守住的问题，在会前议论纷纷，内心明知南京不能守，但没有什么人敢在会上作具体的提出。是见在独裁者蒋介石的面前，人们是不敢畅所欲言的。因此，就不能集思广益与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出适当的作战方案。

日寇一天天接近南京，南京的情况也一天比一天紧张。七四军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命令，占领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既设阵地，加强工事，严密警戒，防敌来犯。军令五一师占领淳化镇，五八师占领牛首山，军部在通济门外的一个村庄里。部队进入阵地后发现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预先作好的钢筋水泥的国防工事：有的用土埋着，有些机关枪掩护的门还锁着，不开门；机关枪掩体的枪眼一般做的太大，不适用，极易被敌人发现目标，集中火力向我射击。因此官兵对既设阵地的国防工事甚为不满。十二月七日上午正在抢修工事之际，据报告敌人经句容向我前进，离淳化镇只有三十华里；至午后四时敌人的小部队已与我警戒部队发生接触。八日拂晓，敌步兵在其炮火及飞机掩护之下，猛烈向我淳化镇的阵地攻击。此时在牛首山的五八师也在与敌激战中。我空军及苏联空军志愿大队的轰炸机及战斗机，奋勇向来犯的敌机反击，空战甚烈，敌机被我机射落两架，我机也被敌击落一架。在南京保卫战中，苏联的空军志愿大队表现得异常英勇，对保卫南京尽了极大的努力。官兵对苏联空军志愿大队为维护正义而奋斗的精神，甚为钦佩。五一师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在电话里对王耀武说：“苏联的空军真勇敢，使我万分钦佩。”三〇一团的团长程智也在电话里说：“只见苏联的飞机来帮助我们抵抗侵略，没有看到其他国家的飞机来帮助我们。我看到苏联空军人员这样的英勇，感到兴奋和愉快，

巴不得把日寇的飞机多打下几架来解解我的恨。”但这时日寇的飞机仍占优势，常有敌机向我轰炸及扫射，据三〇五团团长张灵甫报告，日机投下的炸弹，查有美国制造的字样，这充分证明美国唯利是图，把炸弹卖给日本，来屠杀我们中国人，莫不是东西。他们能卖炸弹给日本，那么飞机汽油也会卖给日本使用的。

八日，五一师五八师与敌激战至黄昏，主阵地仍未被突破，夜间继续战斗。九日上午八时，敌以步炮空联合向我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阵地攻击，尤以淳化镇的战斗为激烈。战至十时，敌战车六辆也投入淳化镇的战斗，平射炮也续有增加，以平射炮集中火力，向我开着大口的钢筋水泥的机关枪掩体中射击，我重机关枪被打坏了很多。炮火冲天，血肉横飞，我官兵有的被打断腿、臂，有的被炸出脑浆，伤亡很众，张灵甫也受重伤。淳化镇、牛首山阵地均于九日先后被突破。俞济时将战况报告了唐生智，唐即决定七四军撤至水西门附近，以一个师担任守备、一个师为预备队。

七四军战至九日黄昏，即由淳化镇、牛首山一带地区向水西门集结。十日到达后，俞济时令五一师担任水西门一带的城墙及水西门外的防务，迅速构筑纵深工事而固守之。五八师在城内集结于水西门以东地区为预备队。左与八八师的战斗地域连接，以中华门水西门中间的城墙角及该城角以左一百公尺处归五一师，左归八八师。非有命令不准溃散官兵进入防线以内，以免敌人乘机混入。五一师师长王懋武即以该师一五一旅周志道部担任水西门外的防务，以一五三旅李天霞部担任沿城墙的防务，占领水西门中华门间的城角及其以左一百公尺处之城墙阵地，左与八八师密切联系，加强工事固守之。十一日，在水西门外湖沼地带，发现敌人的侦察部队，当予击退。十二日上午七时许，敌步兵由雨花台以右地

区，在其炮兵及战车掩护之下，向水西门外一五一旅的阵地猛烈攻击。正值战斗激烈之际，敌战车三辆掩护其步兵向我阵地冲击，企图一举突破一五一旅的防线。我军也集中炮火向其射击，敌战车慌张乱闯，其中有一辆一头栽到河沟里，人车都被消灭了。其余两辆仓惶后退。这时雨花台的战事甚为激烈，八八师的受伤官兵下来很多。敌攻占雨花台以后，继续在其重炮掩护之下攻击中华门，并增一部兵力，向水西门外一五一旅的阵地攻击，我第一道阵地被突破。战至午后四时许，三〇一团的团长程智阵亡，官兵伤亡甚众。在这一天由雨花台溃退下来的八八师工兵营等官兵约一千人，跑到一五一旅阵地的右翼（靠江边），要进入防线以内，守军不肯，溃散的官兵要进，互相开枪攻打起来，各有伤亡。情况之乱可见一斑。

十二日晨据一五三旅旅长李天霞报称：“八八师的城壕阵地因没有部队防守，日寇约有百余名由一五三旅阵地以左的地区乘隙爬上城壕，占领了我既设阵地；在其步炮协同下，向我一五三旅守城部队的左侧攻击；并说城壕阵地是固守城的一道重要防线，长官部为什么不督令各部确实占领，这样南京还能守吗？”王耀武答敌人既已偷爬上城壕来，应集中力量迅速消灭它。李天霞得到王的指示后，曾督率部队与敌反复争夺，均未得手。而敌继续增加，战事愈加激烈，战至午后五时许，因官兵伤亡过大，该旅所守的阵地已岌岌可危，水西门内外房屋被日寇炮火打毁很多，数处起火，烟火弥漫，死尸纵横，状甚惨烈。

十二日午后五时，俞济时用电话对王耀武说：“唐长官召集军师长开会，城里情况已很混乱，开会可能有重大的变动。”王耀武说：“战事正在进行，我不能立即离开。开会如研究到放弃南京的问题时，不论突围或渡江，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及准备的时间。应立将江

北岸所有的船只調到下关至八卦洲的江边，分配給各部，并区分上船的碼頭；否則是不堪設想的。”俞又說：“我也考慮到這些問題，一定向上建議。”俞濟時等參加開會的人到了長官部，唐生智就將已印好了突圍命令的重要內容告訴大家，到會的人垂頭喪氣地同意了唐的主張。唐將命令立即分發各軍師長，很快就散了會。這時天已黑，俞見情況緊急，異常驚慌，倉忙派軍部李參謀把命令送給王耀武，并囑一師立即設法過江，過江後到滁州車站附近集結。王耀武即令一五一旅在八卦洲附近綁扎木排過江，一五三旅及師直屬部隊至下關設法渡江，過江後在滁洲車站附近集結。王耀武下達命令後，即率師部人員經城內中山路向挹江門前進，途中遇到三六師的部隊阻止各部隊向下關撤退，並不斷地開槍射擊，子彈由頭的上空唧唧飛過，向挹江門行進的官兵看到這種情形，有的主張與三六師對打，有的說，沒有叫敵人打死，而被自己的部隊打死了，那才冤枉。王看無法由馬路通過，又怕耽擱時間多了過不了江，就繞道向挹江門走去，在行進中不斷聽到爆破政府各部建築物的聲音。馬嘶人嚷，傷兵喊叫，亂騰到極點。各部隊遺棄的傷兵很多，其中勉強能行者，也拄着棍子向下關前進，一面走一面罵。曾聽傷兵罵着說：“你們都逃了，把我們甩到這里，叫日軍殺害，真令人傷心！他媽的，早知如此，誰肯打仗。”王到了挹江門，看到城門只開了一扇，人多門窄，極為擁擠，甚至有被擠倒踩死的，過此門如過鬼門關。有的馱馬通過這個門被擠倒踩死於地下，有一人力車擠翻在地下；人們光顧逃命，寧肯踩着馬及越車而過，也沒有人將倒在城門地下的妨碍行走的馬及車拉死，真是混亂驚慌、狼狽到了極點。

王耀武出了挹江門，走到下關江邊，看到各碼頭上的人很多

都巴不得立即渡过江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看到江里有极少数的船只，这船是预有打算的部队派兵占用的。无船的部队见船就抢，也有互相争船或木排而开枪的。有的利用一块门板或一根圆木而横渡长江的，有的看到过江无望化装隐藏在老百姓家里的。王耀武无船过江，正在着急的时候，遇到了军部的张副官，他急忙对王说：“军长和冯圣发等都已过江了，军长见到战事失利，早派人在浦口预备好了一只小火轮，这只火轮每次可以装三百多人，叫我来接你和部队。”王即带着一部分人上船过了江。王看到有这只船可利用多抢救一部分人，又怕这只船被别部抢去了，立即加派师部副官主任赵汝汉带着一部分武装兵，协同军部张副官接运七四军的官兵。经一夜接运的及自行设法过来的约五千人，武器损失殆尽。至十三日天亮，敌人的兵舰已在下关八卦洲的江面上横冲直闯，来往逡巡，并用炮向我利用船只、木排、门板、圆木等渡江的官兵射击。被敌炮火打死及敌舰撞翻淹死的很多。十三日南京全部被日寇占领，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

杜聿明

为什么单留德国战车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上海抗日阵地全线崩溃后，南京政府官员均异口同声认为不能再战，党政军各机关慌乱成一团，各部门争先恐后地向武汉撤退。这时蒋政权仅有的机械化部队——陆军装甲兵团，共有战车、搜索兵、战车防御炮三个营，也奉令向湖南湘潭撤退。同时这三个营在上海参战的一部，已经撤回南京。当经决定搜索营、战防炮营沿京（南京）贛（南昌）公路撤退，战车营搭上火车向长沙输送。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于这一战略撤退事先毫无计划，沿公路走的车辆没有油料，沿铁路走的战车没有平车装载，这些部队一直就在南京方山营房待命。等到敌人迫近南京时，才弄一点油料，将汽车开走；战车则是将客车蓬车拆毁后才装上车的。

在待命的期间，有一天（大概是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晚上十点钟前后，何应钦忽然找我去说：“现在决定唐生智守南京，委员长（指蒋介石）要将德国战车全部留在南京抗战。”我说：“德国战车虽然是我們现在最好的战车，可是有枪无炮，威力不大；而且为数只有十五辆，在南京河流错综的江湖地带作战，性能也不适宜。不如留下英国的水陆两用战车和炮战车，有枪有炮，又可以水陆两用，适宜于南京附近作战。必要时还可以横渡长江，开往江北。”何说·

“你不要想撤退江北，委員長說要死守南京，應照命令將德國戰車留下。”我見這種情況，不敢再說，但心中總是百思莫解：“為什麼蔣介石、何應欽都不根據戰車的性能使用，而一定要留德國戰車在南京抗戰呢？”

原來這是擺打的架子

這個問題到了以後特別是解放以後，我才漸漸知道：蔣介石所以臨時決定守南京，並不是為了堅持抗戰予日寇以決定性的打擊；也不是為保全抗戰力量，準備進一步消滅日寇；更不了解抗日戰爭的性質，作全面抗戰的打算。只是擺出個打的架子，將德國戰車以及有關德國顧問的訓練和部分德國武器裝備的部隊，如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第三十六師、教導教總隊等部隊都留在南京，希望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向日本帝國主義屈辱投降。所幸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就已揭穿了國民黨統治集團中的投降主義^①；十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又指出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右翼集團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我們的任務是堅決地反對民族投降主義^②”。在中國人民一致的譴責下，蔣介石才未敢投降。可是保衛南京的十餘萬將士，已因蔣介石的投降主義，作了不應有的無代價的犧牲。

一連戰車的斷送

陸軍裝甲兵團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開出最後一批車輛撤

^①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三四二頁。

^②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三五七頁。

离南京后，即与留在南京抗战的第一连失却联系。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淪陷，我想这一连战車一定全被消灭。但是战車是如何使用又如何被消灭的，一点情况也不了解。直到二十日以后，才有該连自南京陸續逃回来的官兵报告經過。原来自战車連向南京卫戍司令部长官部报到后，对于如何配合步兵作战没有得到明确指示；等到十二月五日，忽然奉到长官部的命令开往湯山附近协同某軍（我記不清是那一軍）作战。該连当日到达湯山附近即遭到敌机的俯冲轰炸，次日清晨参加战斗，以后数日繼續在京湯公路及光（光華門）方（方山）公路一带先后配合好几个部队与日寇作战。在方山附近战斗中，战車三輛被日寇击毁，遺弃在公路上。十二月十二日拂晓，光華門陣地被日寇突破，守軍八十八师步兵潰退。战車无人指挥，找卫戍司令长官部也无人負責。战車連长見上自卫成长官部下至各軍师情况均极混乱，即自动撤到下关，准备找船泊渡江。到下关后，見仅有几艘小火輪被第三十六师控制（据宋希濂讲实际上是卫戍司令长官部控制），只找到四只木拖船将战車装上，又向第三十六师的一个营长借到一只小火輪；正在拖着木船过江之际，突然又有一只小火輪追来，不准这只小火輪运送战車渡江。双方經過激烈爭执，因小火輪上三十六师的官兵較多，強迫將繩索砍断。載运战車的木船既无舵又无桨，不能掌握方向，只有听任江水冲击，順流而下。有的木船在沙滩上擱浅，有的一直冲到江阴附近，官兵才只身脱險逃回。这一连战車就是这样毫无意义地断送了。

两个真正的英雄

在保卫南京战役中，虽然由于蒋介石的投降主义，战前既无准

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以致全军复没,丧失了抗日部队的元气。可是其间也有一些中国人民的忠勇儿子、激于爱国义愤,作出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如上述被击毁的三辆战車中,一辆战車上的两个战士中的一个(記不起姓名)逃回后,很气愤地对我说:当他的战車被日寇打坏时,排长怕死不支援救护他的战車就往后跑。他倆看到日寇的輕快部队已跟踪追来,想到繼續在坏車上打必被敌人活捉,下車逃命又感到恥辱,就“决心与战車共存亡,埋伏在战車内,相机打击敌人”。果然日寇第一綫部队未清扫战場,搜查战車,冒然长驅直入,向南京前进。这两个战士一直隐蔽到下午四时前后,看見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两人計議这是狙击日寇的最好机会。“他媽的,老子一个换你几十个!”他倆輕輕地将机关枪从战車轉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打得日寇落花流水,滾滾倒地的有几十人。可是日本鬼子也非常頑強,立刻散开,前仆后继地向战車攻击。但好几次皆未得逞,因这一大队日寇仅有步兵武器,沒有平射炮和山野炮,无法击毁战車。就这样地战斗到黄昏以后,日寇仍无办法。这时两个战士商定,丢掉战車乘夜撤退。他倆离开战車不远,日寇突然以机枪迫击炮轰击,他的战友不幸牺牲了,他自己脱离敌人逃回。

当这个战士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湘潭向我报告以上的情况时,我虽然口头上称赞他的英勇杀敌,可是心中怀着极大的狐疑,认为他說的好象神話,甚至怀疑他撒謊。我竟未研究分析这个軍士歼灭敌人的成就(反动派就是这样的)。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寇为截断我西南通海防的交通綫,由欽州防城登陸,深入南宁;十二月三十日我軍在昆仑关歼灭敌人中村正雄所部将近一个旅团之后,在函获的文件“暴風万里”这本小册子内,发现日寇叙述

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这时我才知道这两个战士才是真正的勇士，回来的那个战士并未骗我，是我太不信任他了。急忙再找这个战士时，才发现他已在昆仑关战役中为祖国人民英勇牺牲了。这两个英勇的战士，实在是祖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顽强地与日寇单独作战，创造出当时料想不到的奇迹。而我这个官僚军阀的作风，当时还怀疑他们的英勇战绩，后来又忘了他们的姓名。回想起来，真是愧对这两个无名的英雄，愧对他们的父母，愧对祖国的人民！

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

周振强

一 教导总队扩编的经过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采纳了德国总顾问法根豪森的建议，按照德国步兵团的编制，将原有的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加以扩编，作为德式的团营连战术的示范部队；并派曾在德国步兵专校毕业的桂永清任总队长，指派了步、骑、炮、工、辐等方面十五个德国顾问担任学术科的指导，完全按德国典范令进行训练。以后几年中，蒋介石常令陆军大学学员和中央军校学员到教导总队学习参观。该队开始扩编时，有步兵二团，总队直属的有特务连、军士连、军官队、骑兵连、工兵连、炮兵连、自动车队、通信连等，共约官兵九千人，驻在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营房。一九三五年，该队增加了一个团，总队部直属的连队除军官队外，都扩编成营。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开始时，该队奉令扩编成九个步兵团，合为三个旅；总队部直属的营，除了特务营、军士营、通信营没有扩编外，其余的营都扩编成团，约有官兵四万三千人。当时该队主要干部为参谋长邱清泉、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第二旅旅长胡启儒、第三旅旅长冯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焯、炮兵团团长楼迪善、骑兵团团长王翰卿、辐重团团长郭旭泉、军士营营长吴露青、通信营营长杨秉成、特务营营长何祖震。

二 复兴社的对内对外活动

教导总队在名义上是作为德式的团营速战术的示范部队，而实质上是蒋介石的铁卫队。该队扩编之初，总队长桂永清就召集他的亲信干部周振强、胡启儒、杨厚灿、萧劲、楼迪善、田鄂云等秘密指示说：“现在校长准备将军队完全按照德国陆军的方式来组织训练。我们教导总队是校长的铁卫队，要仿照德国希特勒的铁卫队进行组织和训练、要切实注意部下的思想行为，要训练他们忠于党、忠于领袖，要使他们成为拥护‘领袖’最忠实的铁卫队队员。”接着就在教导总队成立了复兴社支部，介绍周振强、胡启儒、杨厚灿、楼迪善、田鄂云加入“力行社”，在总队部成立“力行社”小组，组长由他自己担任，副组长由周振强担任，其余为组员。这个“力行社”小组就是领导总队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在各团营内分别成立“复兴社”小组，要周振强等考察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介绍他们加入“复兴社”；规定每周开小组会一次，将官兵言行汇报给他，作为对部下考核升降的依据。桂永清利用“复兴社”特务组织，对部下官兵控制很严，稍有对他不满的，就被撤职。例如第一团少校团附袁昆如因为说了“桂永清经济不公开”一句话，就得到撤职的处分。

桂永清为了讨好蒋介石，扩张他的政治野心，又以南京励志社的名义，利用教导总队的枪、弹和马匹，派了教导总队复兴社的社员在南京中山门内“明故宫”成立了“骑射会”。该会以不要会费引诱青年加入，宣传什么“我们中国只有仿照希特勒‘国社党’治理德国的办法，中国才能强盛；只有拥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才能救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并勾引青年加入复兴社。一九三六年，桂永清兼任南京大中学校学生暑期军事集训总队队长时，派教导总队复兴社骨干分子楼迪善、杨厚灿、萧劲等任大、中队长，向青年学生灌

輸拥护蒋介石为全国“領袖”的法西斯主义，勾引了当时受訓的青年学生三百余人加入了复兴社。教导总队的特务組織对内对外的活动，是当时蒋介石将所轄军队进一步法西斯化的縮影。

三 协同宪警禁止南京学生运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議冀东成立防共自治区的伪組織，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举行了游行示威，当时遭到了宋哲元的压制和逮捕，打伤了許多人。这一运动引起了全国各大都市学生奋起响应，形成了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潮。上海、苏州的大学生决定乘火車到南京請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就下令上海、南京戒严，企图阻止学生前往南京。这时上海、苏州的大学生迫于爱国义憤，不顾軍警的阻止，由上海交通大学学生領头，自行开火車到了南京，决定同南京各大学学生一起举行游行示威和請愿。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奉蒋介石命令，調动南京軍警力量，企图禁止这次学生的行动。当时桂永清曾对周振強說：“上海、苏州学生到南京来，是共产党暗中策划的，这种捣乱行动，会引起中日外交糾紛”；命令周振強率領第一团步兵第一、二营开往城内，归南京警备司令部指揮。周振強率部到南京城内后，奉到南京警备司令部命令，要教导总队的部队担任成賢街、石板桥、中央大学四周的警戒，协助宪警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十二月中旬某日，上海、苏州和南京各大学学生集結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开会的时候，周振強令第一营第一連将中央大学的前門、側門、后門都派兵守住，企图不让学生出門。不料守卫在中央大学前門的士兵，感于学生的爱国正义行为，沒有認真执行命令；学生游行队伍冲出中央大学前門，經石板桥、成賢街到国府路，

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請愿，沿途散发了“反对冀东成立防共自治的伪組織”、“停止內战、團結抗日”等传单和標語。当时蔣介石很怕駐南京日本領事的抗議，下令南京警察厅派了大批警察將传单抹去，標語撕掉。学生游行完毕，教导总队才回营去。

四 西安事变星夜調兵

一九三六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南京国民党高級人員大为震惊。黄埔軍人中，如桂永清、賀衷寒、邓文儀等暗中議論，都認为这次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指使张学良、楊虎城干的，他們的校长落在共产党手中，只有死路一条，不会有生还的希望。于是他們秘密主张拥护軍政部长何应欽为蔣介石的繼承人，而在公开宣传中痛斥张、楊扣留“領袖”，“大逆不道”，主张大张討伐。并由师长級的黄埔系軍人胡宗南、王耀武、桂永清、宋希濂、賀衷寒等三十四人联名通电，要求张、楊立刻將“領袖”送回南京，否則就是不共戴天之仇，必当誓死以报。

当时何应欽想乘机取蔣而代之的企图，在国民党中已是公开的秘密。当他听到蔣介石被张、楊逮捕后，認为有机可乘，事前沒有同宋美齡、宋子文商量，即以营救蔣介石为名，下令討伐张、楊，动员各路軍队圍攻西安。駐在南京孝陵卫的教导总队也奉到何应欽的命令，由周振強率領步兵第一团、第二团、工兵营、炮兵营、騎兵大队、战車大队、特务連官兵約九千余人，于十二月十二日星夜由南京下关渡江，十三日由浦口乘火車直开潼关，十四日到潼关时，奉令接替董釗的二十八师潼关防务。其后陸續到达潼关的，有六十一师、三十六师、五十七师、四十六軍。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担任纵队指揮，指揮教导总队和六十一师；四十六軍軍长樊崧甫

担任总指挥，指挥此路军队，围攻西安。

樊崧甫到达潼关以后，即召集各师长开会。他指示说：“为了迅速营救‘领袖’出险，何部长已命令各师围攻西安，并已准备空军集中轰炸西安。”当时指定教导总队为攻城部队，并密令教导总队准备大量催泪性的毒气弹，俟空军集中轰炸西安时，在西安城东北角施放毒气攻城。他将所属各师分成二个纵队，命令迅速攻击前进。教导总队于十六日由潼关推进到华阴，十八日奉令协助二十八师董钊部攻击华县。当日华县攻克后，教导总队即沿铁路两侧前进，攻击东北军刘多荃部队的赤水障地，攻击了一天，牺牲官兵百余人，没有成功。二十日奉到桂永清的命令指示说：“现在蒋夫人（宋美龄）和宋子文已乘机飞往西安，同张、杨会谈，命令暂时停止攻击，在原地迅速构筑工事，防止东北军和红军在利用会谈期间的突然袭击。二十五日听到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乘机飞回洛阳的时候，樊崧甫以下的将领都一致认为这是“领袖”的“感召”。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教导总队奉令开回南京。

五 参加上海抗日战争

当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后，桂永清于十月间由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回国。他拟要求蒋介石派教导总队一部开往上海参战。周振强不同意，对他說：“抗日战争时间还长，而教导总队现已扩编了这样大，老兵都成了干部，其余都是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很差，不如加紧训练三个月后，再请求整个参战，比较有把握打一胜仗。如果现在派一部队到上海参战，对上海整个战局起不了多大作用，而是白白地消耗力量。现在最好是做到不请求也不抗命，校长命令我们去就去，没有命令就加紧训练。”

当时桂永清听了沒有作声，当天晚上派了总队部上校服务員彭克定到周振強家里來說：“我們校长在上海戰場投入了这样大的兵力，其目的是在贏得在政治上同日本講和的条件。上海的战局，將同‘一二八’一样，結果会同日本講和的。如果教导总队現在不到上海參战，將來就沒有參战的机会。而且宋希濂、王敬久、孙元良在上海打了仗，現在都升了軍长。我們教导总队到上海打一仗，总队长可以升軍长，你也可以升师长了。”周振強听了自己可以升官，也就同意了他們的意見。

桂永清要求派队到上海參战的請求得到蔣介石准許后，他命令周振強于十一月五日率領特务营、工兵营、通信連、步兵第一团、第三团共約官兵七千五百人，由南京尧化門乘車經苏州轉苏嘉路，在沪杭路新橋車站下車，奉令接替六十七师八字橋的防地。桂永清奉令任縱队指揮，指揮教导总队和俞济时的五十八师。周振強亲到第一綫，同六十七师师长黃維协商，了解敌人已渡过苏州河，攻占了八字橋鎮的一半，并且集中了陆海空的炮火，企图从八字橋突破我軍防綫。我軍正面防綫虽只有一千二百公尺寬，但无工事可以依据，因而能否阻止敌人深入突破我軍防綫，决定于能否守住八字橋鎮。周振強当即决定以营为单位作縱深配备，以八字橋为重点构筑防御工事。当日施行夜袭，夺回了已失去的八字橋一半。因教导总队团級以下的官兵对日本帝国主义都有同仇敌愾之心，作战都很勇敢，在同敌人爭夺八字橋的四天拉鋸战中，在敌人陆海空集中炮火的轰击下，官兵牺牲不少。后因敌人在上海金山卫登陸，教导总队奉令撤退。在撤退中，第一团第三营第九連中士班长张忠率領八个弟兄，用輕机枪打下了低空飞行的敌机一架。部队撤退到苏州时清点損失，只余三千余人，伤亡营級干部以下官兵四千多人。

六 守卫南京牺牲惨重

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后，高级将领都对守卫南京没有信心，不愿担任守卫的任务。桂永清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后，对他的亲信部下周振强、胡启宇、邱清泉说：“在会上，校长问大家谁愿担任守卫首都的总指挥时，连问三四次，都无人作声。后来由校长亲自到唐生智家里劝说，唐生智才勉强答应担任守卫南京总指挥的任务。”并说他得到秘密消息，已由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同日本讲和，日本不一定会来打南京；即使来打，只要守一个短时间，也可以换得讲和的条件。

守卫南京的原计划是守南京外圈汤山之线，因兵力不足，才改为防守乌龙山炮台、紫金山、雨花台之线。当时防守乌龙山炮台的是徐源泉的第十军。守卫牛首山的是俞济时的七十四军所部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和冯圣法的五十八师，牛首山失守后，这两师退守南京水西门。守卫雨花台的是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守卫南京下关一带。原计划守卫通济、光华门外红毛山之线是王敬久的八十七师担任，因他的部队没有到达，由教导总队派兵一营暂时防守，等八十七师到后移交。另有粤军邓龙光部也集结南京城内。教导总队奉令守卫叉路口、紫金山、孝陵卫到工兵学校之线。

当时我们判断敌人主力部队是由京杭国道向南京前进，而敌人攻击重点是紫金山、雨花台；因此教导总队兵力部署的重点是保卫紫金山。兵力部署大概如下：

副总队长兼步兵第一旅旅长周振强率本旅步兵第一、二、三、团，军士营，附工兵一营为右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到工兵学校之线的防守。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威龙率本旅七、八两团为左

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左侧到叉路口之线的防守。骑兵团在湯山、青龙山之間占领警戒阵地，阻碍敌人前进。炮兵团在富贵山一带占领阵地。步兵第二旅旅长胡启儒率领本旅四、五两团和工兵团(缺一营)为总预备队，集结在太平門、中山門附近(步兵第六、第九两团开往江西补充新兵未回)。

十二月七日晚上，据骑兵团团长王翰卿报告，敌人便衣队穿了八十七师士兵的军衣，混入在八十七师撤退的队伍中，袭击了该团驻湯山担任警戒的第一营，该营伤亡很大，湯山已被敌人占领。总队部一面命令骑兵团在青龙山之线极力阻敌前进，于九日拂晓前逐次经麒麟鋪、叉路口撤退到徐坟附集，担任左侧的警戒，并与守卫烏龙山炮台的第十軍联络；一面下令各队禁止八十七师的士兵通过阵地，以防敌人的袭击。

八日拂晓，大批敌机已向紫金山阵地轰炸，敌人炮兵集中火力向我麒麟門前进阵地射击，步兵也开始向我阵地攻击，敌人的先遣装甲部队已达通济、光华門外紅毛山附近。因八十七师沒有到达，驻守在紅毛山之第一旅第二团周石泉营兵力单薄，伤亡很大。敌人的坦克車已炮击光华門。周振强见到这样情况，除即派軍士营营长吳曙青率本营附战車防御炮連增援外，并报告总指揮部，由总指揮部調粵軍邓龙光部接替紅毛山的防务。八日一天战斗結果，我麒麟門一帶的前进阵地被敌人占领。

九日拂晓，敌人集中兵力，攻击我紫金山老虎洞阵地。因老虎洞阵地比較突出，在敌人集中陆空火力攻击下，我軍伤亡很重，增援不易，周振强决定放弃老虎洞阵地，退守紫金山第二峯的主阵地。

十日拂晓，敌人占领我老虎洞阵地后，即开始集中力量向我紫金山第二峯、孝陵卫之西山主阵地攻击。因为教导总队在孝陵卫

駐紮四年之久，地形很熟，構築的障地也比較堅固，官兵作戰又都很勇敢，由十日至十一日晚止，在第二峯和西山同敵人反復的爭奪戰中，我隊傷亡雖然很大，同時也殺傷敵人很多，障地始終在我隊手中。

十一日晚十時左右，周振強在紫金山第一峯指揮所看到南京中華門方向和下關方向都起火，打電話到總隊部也打不通。派人到總隊部去看，回報說，總隊長下午七時到總指揮部開會以後沒有回來，參謀長邱清泉也離開了總隊部，城裏部隊很亂，都紛紛向下關方向跑去。這時總指揮部的電話已不通，旅部參謀馬連桂報告說，八十八師防守的雨花台障地已被敵人占領，並有一小部敵人攻進了城，八十八師部隊很混亂，又看到粵軍鄧龍光部隊都出了太平門。周振強當即趕到富貴山總隊部，召集步兵第三旅旅長馬威龍、工兵團團長楊厚燠、騎兵團團長王翰卿（此時總預備隊第二旅旅長胡啟鑑、四團團長王化、五團團長羅友蘭已不知何往），告知當前情況，並商議決定：第二旅旅長馬威龍率本旅同粵軍鄧龍光部一起突圍；工兵團團長楊厚燠率本團到下關煤炭港、燕子磯之間準備渡河器材，騎兵團團長王翰卿率本團占領煤炭山之巔擔任掩護；第一旅第一團團長秦士銓率本團為後衛；從十二時開始逐次由障地撤退，留一部占領紫金山的天寶城為掩護障地，其餘部隊向煤炭港、燕子磯之間方向撤退，設法渡江。周振強於是日夜一時率總隊部特務營約百餘人，經堯化門到了煤炭港，即指揮隊部渡江，並指定滁縣為集中地點。十二日上午十二時才用木排渡江，十三日到達滁縣，共收容官兵四千多人。十四日晚，沿津浦路步行到明光，乘車經徐州、開封到武昌，得悉第二旅只有旅長馬威龍、團長鄧文偉二人突出包圍。此後，教導總隊奉令改稱為四十六師，開駐湖南衡山。

敵人攻占南京只有二個師團，攻擊重點是紫金山、雨花台。紫

金山以北只有敌人少許部队，水西門到下关根本没有敌人。烏龙山长江封鎖綫在十二日下午二时才被敌人突破，敌舰才深入到下关江面。在十日至十一日的战争中，教导总队三团兵力約一万人沒有使用，其余防守水西門的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和布防在下关的三十六师，以及集結城内的粵軍，估計約二、三万人。周振強在紫金山上看到敌人晚上向我陣地攻击时，麒麟鋪一带駐有敌人部队的村庄都有灯火，目标很明显，当将这种情况报告桂永清。并同第三旅旅长馬威龙工兵团团长楊厚焯联名建議，要求集中兵力由紫金山的叉路口地区出击，威胁敌人的后方，但沒有得到桂永清、唐生智的同意。他們的理由是“現在消耗兵員太多，万一出击不成，守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够了”。

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在上海作战时損失很重，担任防守雨花台的重要任务，本来兵力不够。在敌人重点攻击下，雨花台吃紧时，如果总指揮部能派队及时增援，雨花台陣地不一定会失得这样快。

当时，下关碼头的蘆船以及各軍控制的民船，估計約千只左右。如果当时总指揮部有精密的撤退計劃，將守卫南京部队作有計劃的渡江撤退，部队就不会損失这么多。但因为总指揮部沒有計劃，高級將領搶奪交通工具，各自逃命，抛弃部队不顧，以致造成守卫南京的部队官兵，除了三十六师全部和教导总队少数部队渡江，以及粵軍邓龙光一部突出敌人包围外，其余全部复灭。

周振強于十二日下午二时渡江到达八卦洲对面北岸时，敌舰已突破烏龙山长江封鎖綫，亲眼看到渡江的我軍官兵，在下关一带江面遭到敌舰敌机射击和冲击，因而死在江中的，約有三、四千人，情况极凄慘，目不忍睹。教导总队參謀长邱清泉、第五团长睢友蘭、第二旅旅部中校參謀廖謨湘等三人在南京撤退时，化裝藏入民

間，以後又化裝難民，才逃出南京。據他們說：敵人占領南京後，即大事搜捕我軍官兵，裝上卡車送到下關，用機槍集體殺害，並將屍體投入長江。這樣被殺的有幾萬人，下關江面都為我軍官兵的鮮血所染紅。

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曾在南京城牆構築有永久城防工事。當教導總隊奉令防守時，發現中山門至光華門之間城牆上的永久工事，雖然外面塗了水泥，而內部的橫梁都是南竹，並且已經腐爛。官兵發現這種情況，憤恨已極；一致要求要報告蔣介石嚴懲谷正倫。

教導總隊的官兵在撤退時經過挹江門，看到三十六師的官兵將交通部、鐵道部的東西全部搬運過江，並放火燒了交通部、鐵道部。渡江後到滁縣的途中，又看到三十六師的部隊沿途收繳零星逃出南京的各師士兵的械彈。

桂永清曾自吹自擂地說：“大家都不願守南京，我向校長自告奮勇，得到了十萬元的犒賞費。”當時守衛南京的教導總隊官兵約三萬五千人，十二月份的薪餉，除了渡江的四千餘人補發外，其餘三萬餘人的薪餉和十萬元的犒賞費，全部為桂永清所吞沒。教導總隊改編四十六師開駐湖南衡山的時候，教導總隊傷亡官兵的家屬，紛紛要求發放生活津貼和撫卹金，桂永清避而不見。副師長周振強見到在南京陣亡的團長秦士銓、謝承端的家眷，每家發了五百元的安家費，但還受到了桂永清的申斥，認為發多了。

從以上南京守衛戰的歷史事實，證明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抗日是隨時準備投降敵人的；而國民黨的高級將領的抗日則是為了升官發財，到了稍有危險時，就拋棄部下不顧，各自搶先逃命。真正抗日的是大多數的中下級幹部和全體士兵。他們英勇作戰，不怕犧牲；他們才是真正抗日的無名英雄。

广德、泗安的防御战

黄应乾

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军兴，川军出川抗战，分编两个集团军。邓錫侯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任副总司令，指挥三个军：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錫侯，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这年九月，各军由成都出发，经川北开赴郑州集中，参加山西抗战。李家钰出发较晚。

刘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任副总司令，指挥两个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在旧历中秋节后，各军经由渝、万两地到汉口转赴郑州集中，分驻新乡、博爱等县，准备应援石家庄。后因石家庄陷敌，刘湘所部奉调南开，集中南京附近各县，时为十一月初旬。

当淞沪淪陷时，蒋介石在此役已使用兵力二十二个军；对广德、泗安一线的防御，实无军队抽调。经蒋同刘湘商议，调刘所部分防广德、泗安，以保卫首都的外围。刘遂分令全部共五师、二个旅约五万人，限期集中广德、泗安一线，分布如次：一四四师师长郭助祺，担任左翼，由泗安向长兴推进。一四五师师长饒国华担任右翼，固守广德。一四六师师长刘兆葵属右翼，守广德。一四七师师长馮国楨守泗安。一四八师师长陈鸣谦守泗安。独立第十三旅旅长田冠五、独立第十四旅旅长周紹軒守广德。

时唐式遵未赴前方，刘湘以二十五军团长潘文华代理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广德、泗安的军事。

广德、泗安地居重要。近百年前，太平天国为拱卫天京，曾以名将堵王黄文金率重兵固守此地。清廷以勇将鮑超率霆军专攻此线，搏战经年。天京失守，此线始为鮑超突破。如广德失守，敌进可威胁南京，直趋皖、赣。所以形势扼要，为兵家所必争。

十一月十二日淞沪沦陷，苏、常相继失守。潘文华部分由溧水、溧阳及蕪湖等处开赴广德、泗安应战。潘与刘湘商妥军事部署后，经由蕪湖、宣城遁赴广德。郭勋祺师长前往会报军情，潘即召集军事会议。因上海失守，士气不免沮丧，如潘的参谋长杨熾猷为蒋介石借抗战之名，以消灭赤牌军，应稍战即退，保全实力。有的人说：“中央军尚抵挡不住，我们这些地方军又得不到装备武器，现还有使用旧式双筒枪的，咋个得行嘛（川语，怎样能抵抗）！”郭勋祺一向主战，当向潘表示，大意为：“敌沿太湖进兵，势颇被猖。为国家民族安危，只有在此奋战，寸土必争，予敌寇迎头痛击，使寇遭受重创，才能振奋人心，然后逐步退却。如不战而退，则寇军势焰方张，我们要退亦无法退了。”潘在四川各界的欢送会上，曾当众预立遗嘱，有“胜则生，败则死”的壮语。潘深以郭的谈话为然，当指示应奋力决战，不得后退；并以郭部为前锋，由泗安向前推进。郭部距长兴四十里，即与敌寇大队遭遇。

十一月二十三日，敌牛岛师团（即十八师团）由太湖分乘汽轮及橡皮艇百余艘，窜抵宜兴、长兴一带，分兵两路进犯广德、泗安。敌约一旅团冲到泗安，与郭师发生激战。敌以机炮猛烈轰击；郭勋祺亲临督战，士气振奋。抵抗一日，郭腿部负伤，并向团长唐普照指示，应即举行夜袭。唐跟即集结所部，乘夜向敌袭击，敌大感惊

慌。郭师以伤亡甚多，向后退却；随奉潘文华令，由西安向宁国撤退。

攻广德之敌约四千余人，挟其机炮优势，冒死进逼。并以飞机二十七架整天轮番轰炸，工事尽毁，城舍为墟。潘文华率同饒国华师长、田冠五旅长等与敌激战甚烈，士兵奋勇，坚强抵抗。防守二日（二十七、二十八），因团长刘儒斋不听饒国华指挥，擅自后撤，以致全线溃败。敌于二十九日进占广德。潘率部退守宁国、旌德、石埭、太平、青阳等处，以巩固皖南阵地。日军既占广德为通道，战略目的已经达到，遂舍弃川军，将主力直趋蕪湖，以折断中国军队的退路，配合松井石根指挥的日军主力，围歼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

师长饒国华于广德失守后，亦愤而自戕。饒为四川资阳人，刘湘的学生，武德学友会主要干部；为人慷慨性急，治军有能名。饒原属于唐式遵，但对唐极鄙视。团长刘儒斋系唐亲信，恃唐奥援，对饒常以恶语相加。因刘儒斋不战自溃，广德失守，饒觉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刘湘；又因唐掌握大权，痛感难期长处，便决意自戕。他退离广德数十里地宿营时，写就致刘湘绝命书，内有“刘儒斋不听指挥，以致军败，不惜一死，以报甫公”等语。随即沐浴，于更闌人静时，自戕而亡。时刘湘队病汉口万国医院，唐式遵到青阳代理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任副总司令。顾祝同为分化刘湘所部，串通唐式遵对潘进行诱陷，以潘作战不力，予以撤职留任处分，而刘儒斋旋即晋升旅长。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供稿）

關於韓復榘統治山東和被捕杀的見聞

王 一 民

韓復榘任山東省主席時，我擔任省政府參議，對於他的情況知道一些。韓在山東七年之久（自一九三〇年九月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軍佔領山東為止），軍政、財經、司法一把抓，儼然是個割據一省的“土皇帝”。在蔣介石統治時代的各省省主席中，韓是一任最長的省主席。大家知道，蔣介石對於非嫡系的軍人，總要多方排擠，去之為快的。為什麼韓復榘會在山東一任七年之久而能站得住腳呢？

原來自從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後，名義上全國雖已統一，但是局面始終動蕩不定。如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蔣、“九一八”事變、石友三兩次反蔣、西安事變等等，都給韓復榘帶來了保全地位和擴充實力的機會。但最後蔣介石還是借口韓復榘抗戰不力，在一九三八年年初把他處死。以下就我所知韓復榘的一些情況，分別加以敘述。

一 韓復榘叛馮投蔣

韓復榘是河北省霸縣人，性格傲慢，剛愎自用。他最初在北洋陸軍第二十鎮入伍。那時軍營中官兵識字的極少，韓幼年讀過私塾，算是軍營中的“秀才”，因此被提拔為司書生。他的營長就是馮

玉祥。

以后，馮玉祥的职位不断上升，一九二〇年馮已升任陸軍檢閱使，水漲船高，韓也由連長上升到团长、旅长。馮玉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培养大批軍事人才，曾保送韓到北京陸軍大学旁听。一九二八年蔣、馮合作北伐时，韓已升任为第二集团軍第三方面軍总指揮了。但是馮玉祥治軍很严，部下官兵犯了錯誤，往往被打軍棍，毫不留情。韓虽是高級將領，有时候因为小錯，也要受到“罰立正、站門崗”等处分。韓感到面子难看，对馮有了憤恨之心。

这年蔣、馮在兰封會議时，曾决定甘、陕、豫、魯四省划归馮軍駐防，并昇以这四省的軍政全权。但是蔣为人口是心非，阴險成性。就山东說，名义上是馮部孙良誠担任山东省主席，但孙的势力只限于济南至魯东濰县一段，而青島、烟台、龙口等重要海口及魯北德州和魯南兗州軍事要地，均有蔣軍或收編的杂軍占据；孙的部队，陷于蔣部和杂軍的包围之中。那时山东省主席管轄的地盘仅有全省四分之一的面积。再就河南說，名义上是馮部韓复榘担任省主席，但河南駐有蔣收編的岳維峻、樊鍾秀、刘茂恩、万选才等杂軍，相互牵制和監視。一九二九年，馮对蔣的阴謀背信已有認識，憤而撤出山东，集結兵力于潼关。蔣随令陈調元繼任山东省主席，日軍退出的胶济路防綫，由陈部第四十六师范熙績及第五十五师阮崇昌等軍队填防。蔣并依馮的部下韓复榘、石友三等对馮很不滿，乘机密派蔣伯誠等进行勾引，由蔣先送韓、石軍費各一百万元，并允許韓原任河南省主席的地位不动，以后每月撥給韓、石軍費各六十万元。条件商妥后，韓在撤退到陕州时，回軍倒戈投蔣。蔣升任韓为西北軍总指揮，石友三为第十三路总指揮。但蔣对韓、石仍然不放心，另派唐生智进攻馮軍，而將韓、石两部移往豫东、魯

西、皖北。因此，韓在河南成了一個“空頭”主席，而韓、石兩人從開始投蔣的時候起就存了反蔣的心理。一九二九年十月，馮部為唐生智及其所率秦牌軍擊敗。十二月唐又與石友三聯合反蔣，韓也參與其事，旋因形勢不利，按兵未動。果然唐軍在許昌、漯河一帶陷於孤立，唐失敗下台，所部全軍覆沒。石友三的問題經馬福祥奔走調停，以石向蔣悔過、所部歸韓復榘指揮為條件，暫時與蔣妥協。但是韓、石與蔣的裂痕進一步加深了。只是由於閻、馮繼唐生智之後，於一九三〇年二月，聯合反蔣，蔣沒有余力也騰不出時間來對付韓、石，才不得不反過來拉攏韓、石，共同討伐閻、馮。蔣怕韓在河南距離馮部太近，韓的部下謀變投馮，乃決定調韓率部開往山東。

一九三〇年三月，正是蔣與閻、馮準備大打的時候，韓部奉令向曹州、濟南移動。韓派伍百銳、靳文溪兩參議作代表到濟南與陳調元協商駐軍等問題，商定韓軍分駐濟寧、泰安、濟南、青州等地。當各軍剛剛到達防地，五月間閻、馮的軍事行動已開始了。他們先後進占平津、河南，大軍隨即南下，晉軍二十萬人由傅作義、張蔭梧率領由津浦路向山東進攻。蔣介石特別重視馮軍，而輕視晉軍，因此把強有力的軍隊布防在河南及魯西一帶。沒想到晉軍竟於六月下旬攻占了濟南，韓軍沿膠濟綫向東退却。晉軍占濟南後，兵分兩路：一路由傅作義指揮，率領李生達、馮鴻勳等軍沿津浦綫向南進攻到泰安、曲阜。一路由張蔭梧指揮，率領李服膺、丰玉璽等軍沿膠濟綫向東進攻。晉軍攻勢很猛，韓軍因獨當一面，傷亡很重，退往濰縣，後來反攻奪回了青州。於是兩軍隔濰河對峙，戰事呈膠著狀態。

蔣介石得到韓軍敗退到濰縣時的情報，急電駐烟台劉珍年的第十七軍星夜開往昌邑、寿光等縣，明為增援，實則密令收斂特部

潰軍。同時，又派第十六軍軍長李鶴珩率部自青島向西挺進。這時已是七月上旬，閻、馮派鄧崇熙代理山東省主席，閻又派第二十六師師長高鴻文為濟南警備司令兼膠濟鐵路護路司令，並布告安民。至七月下旬，閻錫山一度借同第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秦建斌等乘專車到濟南慰問晉軍作戰部隊。

可是，到了八月上旬，傾盆大雨，山洪暴發，濟南馬路上積水成河，房倒屋塌，半月之久，不見太陽。晉軍官兵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吸海洛英毒品，由於空氣潮濕異常，火柴划不出火來，抽吸頗感困難，因而士氣不振。韓利用天時，乘機反攻，俘獲晉軍大批官兵。同時，津浦綫蔣軍下令總攻，晉軍抵擋不住，渡河退往德州。八月十六日，韓軍回到了濟南。蔣介石於九月五日下午令調陳調元為安徽省政府主席，派韓繼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另以自己的嫡系劉峙為河南省政府主席。由此可見，韓的山東省主席是鑽了蔣、閻、馮三系軍閥的矛盾的空子，蔣介石為了瓦解馮玉祥，打垮閻錫山，才給了韓復榘一塊山東省地盤的。

二 蔣、韓之間的矛盾

韓復榘在籌組山東省政府時，推薦李樹椿任民政廳長、王向榮任財政廳長、王芳亭任工商廳長、張鉞任教育廳長。但是蔣黨中央已決定仍以何思源擇聯教育廳長，並調張鴻烈為建設廳長。何張二人都是國民黨中央系統的人，而張鉞原是韓的參謀長，至此只能得到一個空頭省政府委員。韓對此很不滿意，乃異想天開，在省政府組織里設一額外參議廳，任張鉞為參議廳長。這在人事上顯然和蔣黨中央有了很大的矛盾。

韓任河南省主席時，手下擁有三個師的實力，即孫桐萱部第二

十师，曹福林部第二十九师、谷良民部第二十二师。韩任山东省主席后，又陆续扩编了两个师另一个旅的兵力，即乔立志部第七十四师、展书堂部第八十一师和手枪旅雷太平部。以后由李汉章继任七十四师长，吴化文继任为手枪旅旅长。此外，并扩充了四路民团约六万人，即鲁东民团总指挥赵明远，鲁西民团总指挥谷良友，鲁南民团总指挥原先是张襄五，后任是谢树贤，鲁北民团总指挥赵仁泉。这四路民团的装备与正规军一样，仅仅名义上有区别。蒋介石本来只允许给韩协饷每月六十万元，后来竟不兑现。韩也就不待蒋同意，擅自派人接收在山东的国民党中央税务机关，赶走了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税警局长及中央财政部特派员等。这自然是蒋所不能容忍的。

烟台有蒋所收编的第二十一师刘珍年部，后来扩充为第十七军，所部占据胶东平度、掖县、黄县等二十多县；各县田赋收入不交省库，均直接解交烟台刘军的军需处和解往南京。刘的驻济南办事处处长赵兰言和副军长何益三、参谋长韩词等，曾到济南和特务刘子建密议，企图分化韩的部属。这一阴谋为韩侦悉，立即派人到刘的驻济办事处拘捕。因事先有韩部营长张亦农泄露了机密，何等得以逃回烟台。以上情况，使韩怒不可遏，因此他动员了五万人向刘进攻，先后攻下了平度、掖县等地。烟台是山东重要海口之一，蒋收编刘珍年时，即派军统特务刘子建任戒严司令兼警察局长，控制着烟台附近十余县。韩进攻刘珍年就如同向蒋进攻一样，因此蒋令黄杰等军集中徐州，准备助刘攻韩。韩也集中兵力十余万人，准备抵抗。这时山东人民看到大战一触即发，尤其是住在津浦路沿线的，纷纷离家逃难，车船非常拥挤。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山东人，他接到家乡父老很多电信，便向蒋介石提议和平解决。随后上

海清帮大头子张仁奎专车去济南进行调解，结果蒋、韩两军各回原防，刘珍年调往浙江，韩所委的山东税务人员，由南京加委，税款、田粮转帐作为拨付韩部的军饷；这样，蒋、韩两军的混战才没有爆发。清帮头子张仁奎为什么能把韩说服呢？原来韩的很多高级将领，如孙桐萱、李汉章、谷良民、雷太平等都是拜在张仁奎门下的。他们在韩的面前时常吹嘘张仁奎的威望地位，如说黄金荣是张的门徒，杜月笙是张的徒孙，而且张也是山东人，在山东也有很多“有面子”的门徒。他们都到过上海，受了张仁奎的特别招待，在上海花天酒地，于是大家纷纷向张拜门。韩本人也去过上海一次，张仁奎特地盛宴招待，陪客有黄金荣、杜月笙、吴铁城等。这样，张仁奎出面调停，自然就发生效力了。

以后又发生了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萃村被韩秘密派人杀死事件。张是山东人，听命于蒋介石，经常收集韩在各方面的情报，如扩充军队、截留税收等，向蒋报告，早为韩所不满。有一次，张竟当面斥责韩说：“中央命令你把二个军五个师缩编为两个甲种师，一个乙种师，手枪旅缩编为团，划为地方部队，你为何不遵照缩编，漠视命令，加重山东人民经济负担？”韩听罢拂袖而走，并且忿忿地说：“我跟党棍子说不通！”又有一次在纪念周会上，张萃村说：“党政军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对得起中央付托的重任。我是山东党务负责人，也有权过问山东的军政大事。”韩听了这些话，暂时隐忍在心，却对别人大发牢骚说：“张萃村当面说的是团结的话，背后却捏造情报，挑拨离间。”张又进一步向蒋建议把韩的军队调出山东，以“中央军”填防，事为韩侦悉，就派人暗杀张于济南进德会游乐场。

韩杀张后，一面报蒋说张被人暗杀身死，一面伪称正在派人緝

拿凶手。韩派执法队到山东省党部搜查，密嘱亲信执法官将暗杀张的那枝手枪并子弹藏在身边，塞在书记的办公桌抽屉里的文件夹层内，当时就把书记上了手铐，指为杀张凶手。蒋曾急电韩要提解那个书记到南京审问，但是韩一味借词拖延，不许外人接见。而蒋对张被杀一案，也只能以不了了之。

三 “青天”治鲁的“德政”

韩复榘在山东省主席任内，独断专行，滥用职权，以“青天”自命；实际上是暗无天日，给山东人民带来了很多的灾难，因限于篇幅，仅略举一二。

由禁烟、搜烟到公开卖烟

韩任山东省主席后，首先雷厉风行地禁烟禁毒。过去山东是日本人经营毒品的大本营，韩以督军吸毒致遭失败为前车之鉴，所以禁止自己的部下吸毒。

当督军失败撤退时，有很多箱子的鸦片海洛英被韩的追击部队截留下来，堆在军需库内，不曾开箱检查。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韩通知各军派代表到市政府空场上监督焚烧毒品，士兵先把这些成箱的毒品堆在空场上，并在木箱上浇火油，然后点火燃烧。谁知燃烧不久，突然轰隆一声爆炸起来，当场被炸死炸伤者有省政府秘书、警察官员刘子占等三十余人。原来督军退却时，有几箱黄色炸药也被截留下来，而韩部并未认真检查，竟把这几箱炸药放到毒品箱子堆里，以致出了这个惨案。

在雷厉风行禁烟禁毒的时候，韩曾下令枪毙了一批批的吸毒犯和贩毒商。山东各县城照例是每星期农民进城赶两个集，往往每集就推出十个、八个的在山东称为“抽老海”的犯人来砍头。韩在

山东的几年，因为吸食海洛英被杀的人，如统计起来将是个很惊人的数字。以后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军法处的库里堆存的鸦片海洛英越堆越多，有一次在烟台海口就查获鸦片烟土一万二千两，军法处堆存的鸦片烟土不下十多万两。而韩复榘在这时，忽然改变了主意，不但不肯焚烧烟土，反而叫军法处长魏汉章出面找济南商会及资本家们开会协商，借口“军餉困难”，要派销鸦片以裕军餉。规定鸦片每两八元，要大家分派若干两。在韩的暴力统治下，谁敢说一个不字，于是各资本家及各大商店都交款照办，而山东境内竟又公开大卖烟土了。

坐堂審案揮手殺人

韓在山东是被称为“韓青天”的。因为韓经常坐在省政府大堂上审問盜劫、毒犯、賭徒等等刑事案件，对司法越俎代庖，而韓审案并不根据法律，全凭个人喜怒，任意胡为。韓审案时，两旁站立的是执法队軍法官等，他点名让犯人站在堂口，定睛看一、二分钟，給犯人相面，观气色，不多开口。他用右手向下一撈，再把手向右边一伸摆，执法队兵士就把这个犯人拉在右边站着，用准备好的六号汽車送去枪毙。如果他右手向上一撈，再把手向左边伸摆，执法队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左边站着，这是他认为无罪，准备释放的。不管有多少犯人，他都这样相面、观气色、撈手示意完事。

有一次，省政府参議沙月波雇用的一个小听差名字叫小道的，年才十五岁，沙参議派他去省政府給秘书长张紹堂送一封信，正值这位“韓青天”坐堂审問一批盜犯。他一时好奇，站到大堂右边看。韓的执法队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竟把这个看审案子的小听差也居然推上六号汽車。这个孩子大声喊叫道：“我是送信的！”韓听见就問什么事？执法兵說：“报告主席，他說他是送信的。”韓回

說：“送信的也該槍斃！”原來“韓青天”錯誤地認為是給土匪送信的。當時這個孩子嚇昏了，再也說不出話來，就這樣被糊里糊塗地被拉出去槍斃了。

事後，沙月波等到吃午飯時，還不見小道回來，就向省政府秘書長張紹堂詢問。正值這個時候，軍法處核對死者名單，卻多了一具尸首，經查明之下，確是誤將沙的小听差小道誤殺了。當時沙月波獲悉之下，連忙帶同小道的母親哭到省政府找韓，說執法隊誤將小道推上汽車槍斃了。“韓青天”笑了一笑說：“現在他是小道，如不殺掉他，將來就是大盜！我也不叫沙參議為難，給他娘五百塊錢過日子吧。”事情就這樣了結了。

下鄉巡視遺殺一律

韓常常出外巡視各地，美其名曰“視察民間疾苦”，其實是到處濫殺一陣，草菅人命。有一次，“韓青天”到了臨沂縣，又照例升堂審案，那天審訊的是一件兩姓相互仇殺的案子。有唐姓一家在一九二五年時被王姓殺死六口人之多；一九三〇年，唐姓復仇，把王姓殺死七口人。原來魯南人民強悍，在舊社會里，打官司花不起錢，因此多採取直接行動，互相仇殺，並不報官。誰知這位“韓青天”在一九三五年秋天巡視到那兒，當時聞悉臨沂有仇殺之風，大為震怒，隨即下令傳來王、唐兩家，他只簡單地一問，便問姓唐的全家還有多少人？唐姓說：“有十一口人，老的已八十四歲，小的才十二歲。”韓毫不思索地說道：“把唐姓全家十一口人完全斃到，一律槍斃！”當時臨沂縣長對韓說：“王姓也殺了人。”韓回說：“民國十四年我沒有來作省主席，我不管；民國十九年我作了山東省主席，唐姓敢於亂殺人，那不成！你不要多說話！”吓得縣長再不敢声响了。當時顧問張聯升在旁勸說：“請主席把八十四歲的老頭子放了吧。”

韓說：“留着他也會哭死的，還是一齊殺掉了好。”終於把唐姓一家老小十一口人殺光。

表面嚴厲甘受蒙混

韓雖然恨馮而倒戈，但是他在治軍方面却總想學馮的一套辦法。在軍閥時代里，人們常說“法愈嚴而弊愈深”。韓對他的部下雖然非常嚴厲，可是部下卻摸到了他的脾氣，互相包庇，哄騙過去，現舉一事為例。

韓的師長展書堂駐防沂水山區時，胡作非為，欺壓人民，以致激起了民變，農民數萬人以黑旗會名義聚集起來，要把展書堂的軍隊趕出沂水。展惶報韓說，黑旗會聚眾造反，并全師出動，向農民襲擊三晝夜，被擊斃的約五千餘人，重輕傷者約四五千。展又向韓蒙蔽報告說，匪徒已完全肅清，地方秩序恢復安寧。此時韓正在出巡，已到臨沂，預定由臨沂到莒縣轉沂水去青州，乘火車回濟南，這個路線被展打斷了，不免心慌意亂。他密電韓的高級隨員張聯升、程希賢及甯太平等高級隨員，設法阻韓去沂水視察。這些高級隨員秘密商議，擬定了一個巧計。他們急電青島市長沈鴻烈及膠濟鐵路委員會委員長葛光庭，請他兩人給韓一個電報，催韓到青島有急事相商，沈葛二人先到濰縣車站迎候。韓接電後，果然中止去沂水，由莒縣、諸城、安邱等縣直達濰縣車站，沈、葛兩人迎韓同往青島。原來韓喜愛酒色，每次到青島時，葛光庭等都弄女人來奉承。葛等找到了韓的這個弱點，對症下藥，果然非常靈驗。韓在青島有幾個漂亮的姘頭，都是沈、葛兩人拉攏介紹的。最後葛又介紹一個名叫馮翠琪的給韓作姨太太。青島是韓常去淫樂的場所，膠濟鐵路專車隨時可開，有時候韓假借視察為名，乘鋼甲車沿膠濟鐵路各縣走一下，就到青島度其荒淫無恥的生活去了。

四 孔祥熙同韓的斗法

韓視山东为禁錮,不把蔣党中央放在眼下,这样就造成了韓部軍官在山东各海口及各地包庇走私的机会。山东成为华北走私的一个主要地区,官商勾結,軍隊保护,使南京財政部长孔祥熙十分头痛。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山东烟台、龙口、利津、羊角沟、虎头崖等海口,每次輪船或帆船靠岸,公开装卸大批私貨,海關人員多与駐軍有联系,或者是駐軍代替了海關职务;因此影响了整个华北關稅收入。孔祥熙的亲信財政部參事李毓万,想出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从打入韓的軍隊内部着手,利用韓的一部分軍隊的力量来制止軍隊走私。

先由李毓万把九江海關稅務司李桐华找到孔祥熙的上海公館里,指示李桐华再找关系去山东拉攏韓的師长李汉章。李汉章到庐山参加軍訓经过九江时,和李桐华同桌吃过飯,见过一次面。孔祥熙交給李桐华一部从美国新买来的最新式手提收音机送給李汉章,叫李桐华和李汉章伪称是亲兄弟,公开在济南住些日子,欺騙韓及其部下,再想办法在山东設立海關稽查处。

李桐华带着礼物到济南和李汉章見面后,即密談孔的意图,而李汉章有了发财的机会,当然一拍即合,逢人便說“我哥哥是九江海關稅務司”,并在他家中邀請了些軍、師、旅长吃飯打牌,叫李桐华不露形迹地参加,說和他哥哥多年不見面,这次趁休假机会来山东看望。李汉章比李桐华小四岁,可是李汉章是河南沈邱县人,而李桐华是安徽阜阳县人,說成是亲兄弟怎样能自圓其說呢?李汉章說他哥哥幼小时就信基督教,跟着神父到安徽阜阳讀書,后来由教会送到湖北同文书院讀外文书,代他填了阜阳的籍貫,他自己說不

知道，畢業文憑領下來才發現。因為關係不大，也就沒加改正。這一番鬼話，當時居然也就瞞過了眾人，連韓復榘也就相信李漢章有這樣一個親哥哥了。

就在这个时候，由孔祥熙派李毓万带着孔的信来济南见韩，面談財政部想在華北設一個海關稽查处，征求韓主席意見和請協助。另一面由李漢章向韓建議說，財政部想在華北設海關稽查处，不如我們推薦個自己人，把稽查处設在濟南。韓很信任李漢章，因李在韓部師長中是一個最年輕、精悍而又會說話的人。李就推薦他哥哥，請韓向孔保薦李桐華為財政部海關山東稽查处處長。這套把戲果然把韓騙住了，韓認為海關稽查处雖然是中央機構，還是控制在自己人手里，非常滿意，即向李毓万提保李桐華在山東設海關稽查处等問題，李毓万却裝着須請孔部長批示。隔了數日，財政部復韓電照准，一些官樣假文章，作得象真的一樣，完全實現了孔的願望。

李桐華接到任命後，就在濟南緯二路一座花園洋屋裡成立了中央財政部海關山東稽查处（本來是海關緝私處，怕刺激韓的耳朵，故改用稽查处）。另一面李漢章也推薦些軍官擔任稽查員等，分布在各海口緝私，而各地駐軍聽說是韓主席派李師長的哥哥當海關稽查处處長，認為是韓主席下令緝私，聲勢煥赫，非同小可。這樣一來，已往有些中級軍官包庇走私的，都怕查出毛病，因此下令部下協助緝私，果然在山東海口裝卸私貨的事從此少有了。

孔祥熙為了進一步分化韓部，由李桐華說服李漢章，拜孔祥熙為老師，親筆寫了門生帖子送給孔，而孔又把財政部魯豫硝磺局長一職囑李漢章派人擔任，作為收門生的禮品。

孔祥熙這一陰謀終於暴露了。後來在緝私中查到一批私貨白

糖五千包及大批进口香烟、呢絨等，这批私貨原是省政府秘书长张紹堂勾結商人包运的。这一下子激怒了张紹堂，立刻用电话告知李汉章說：“你哥哥查了一批私貨，也就是和你哥哥一样的私貨，你看請主席来处理好嗎？”李汉章一听这话不对头，馬上坐汽車到张紹堂公館里面談。李汉章这套騙人把戏，张紹堂已有所知，他怕拆穿西洋鏡，連师长职位也保不住，只得請求张紹堂与之合作，以便朋比为奸。张紹堂在山东是有名的包夹县长缺、营私舞弊、无恶不作的大坏蛋，李汉章虽有兵权，也怕他三分。两人面談的結果，除把私貨发还外，又把鲁豫硝磺局长一职让給张紹堂派人担任。

事情就这样缓和下来，但是海关稽查处里的职员大为不满。因为查着私貨，职员是有奖金提成的，这样一来，損害了緝私人員的利益。有个海关职员写了一封无名信告到韓复榘那里，张紹堂拆信一看，大吃一惊，馬上告知李汉章說：“有人給主席密报你哥哥是假的，来山东是为财政部做机密工作的。”李汉章很怕韓以軍法从事，立即叫李桐华先离开济南回南京向孔报告西洋鏡已被内部人員拆穿，在山东的海关稽查处即請撤銷，一面送一部分錢給韓的太太，預备韓問他时好有話回答。以后韓的太太和张紹堂在韓的面前都替李汉章措詞掩蓋，又值时局日趋紧张，韓也就不追問了。

孔祥熙老早就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和韓进行斗法，甚至不惜将亲生女儿也作为分化韓部、勾結韓部軍长孙桐萱及其弟孙桐崗的工具。孔祥熙所以要这样大的政治手腕，固然蔣介石一心一意要搞垮韓，而孔因山东财政的特殊化，对自己已大大不利，也非要搞垮韓，以解心腹之患不可。那时鲁豫統稅局、山东熏烟稅局还掌握在孔的手里，孔想以这两个局为拉攏孙桐萱入彀的魚餌。

孔为什么看中孙桐萱兄弟呢？因为孙桐萱在韓部高級將領

中是具有雄厚实力的，同时也是最得韓信任的心腹。孙桐萱有一个弟弟孙桐崗，在意大利学习航空，当他在航空学校毕业之际，正是国内宣传航空救国的时候，他乘了一架意大利木制飞机，自己駕駛，从意大利飞回中国，那时轰动全国，成为我国众口喧騰的风云人物，上海的流氓头子所謂聞人杜月笙，居然化了十二万元购买了一架飞机赠送給孙。孔祥熙也想利用这位风云际会的人物作为自己政治上斗法的工具。

孔对孙桐萱方面，利用李毓万和财政部山东中央銀行經理馬鐸秘密勾結，先把魯豫統稅局駐濟分局主任一职由孙桐萱派他的參謀担任；繼而又把駐山东坊子熏烟稅局長一职委派孙的姊夫周錫三担任。由李、馬等人从中說合，孙桐萱也給孔呈了門生帖子。另由李毓万出面，給孔二小姐作媒，介紹給孙桐崗为妻。这样的政治結婚，可以达到买透孙氏兄弟的心。可是，政治上如意算盘如此，而两个当事人却都不同意。孙桐崗这时已有了挚愛的女友，并不同意和孔二小姐的婚姻。而孔二小姐也不同意，她得悉了这一阴谋，火冒三丈，非常憤怒。当这个婚姻快要訂成的关口，她印了一些結婚喜帖，散发到上海中央銀行及财政部統稅局等机关，喜帖上印着：“李毓万之长女李淑媛和孙桐崗于×月×日在威海五路×号李宅舉行結婚典禮，敬請閣下光臨！”

李毓万看到了这样的喜帖，弄得啼笑皆非，連忙多方派人將喜帖收回。事后当然晓得是由于孔二小姐的惡作劇，不但孙、孔的婚姻未有撮合成功，李毓万本人也恼羞成怒，向孔請辭財政部參事职务，几个月未到部办公。

李汉章和孙桐萱被孔祥熙勾結了去，韓内部中人都明白这个事实，虽不敢明言道破，背后却議論紛紛。并且李汉章和孙桐萱之

間，也互相猜疑，暗中互相攻击。青島市長沈鴻烈偵悉个中情况，非常为自己担心，恐怕万一韓的山东地盘被孔祥熙搞垮了，自己又要另找靠山，他本人和韓已成莫逆之交，言听計从，但对孔和韓的部下两个握实力的师长又都不敢得罪。他便建議韓保荐一个魯豫統稅总局（設在青島）局长，一方面討好子韓，另一方面把财政部所委的总局长換成韓的另一亲信担任，也就会和孙桐萱所掌握的两个分局在稅收上发生矛盾，讓他們自己互斗起来，韓也就慢慢地会知道孔祥熙要搞垮他的实力。沈的建議成功了，韓当即向财政部保荐駐京办事处处长唐襄任魯豫統稅总局局长，連河南的統稅和許昌的烟叶均落到韓手里了。时过不久，果然内部互相斗起来了。

孙桐萱認為是唐襄在京活动謀取魯豫統稅总局来侵害他的权利，因而孙和秘书长張紹堂密議搞垮唐襄，另保別人。正好唐襄接任后，出賣濰县、烟台分所所长及駐青島、烟台、威海卫烟酒面粉厂、火柴厂等駐厂員缺，得了大批脏款，尙未向韓呈报，孙、張隨即向韓密报，說唐襄貪脏卖缺影响主席的名譽。韓当时頗为震怒，立即和張紹堂商議，电孔祥熙借詞唐襄另有重要职务，拟推荐山东省政府參議柴春霖繼任魯豫統稅总局局长，并已囑柴即刻赴青島先行到局候令接事。弄得孔啼笑皆非，孔对韓的斗法，又失败了。

五 保存实力坐視国土淪陷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韓复榘本心不想抗日，一心想保全他的山东地盘。蔣介石要他抗日，也是想借抗日消灭袁牌軍，所以蔣韓二人在抗日問題上仍是明爭暗斗。

蔣介石对韓最痛心的一件事，是西安事变蔣被扣时，韓于十二

月廿一日发出“馬电”，首倡各省“自治”，这对蔣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蔣回南京后，表面上对这个“馬电”置之不理，但是心中痛恨切骨，并且下定决心除韓。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韓复榘被委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所部五个师另一个手枪旅扩编为十二、五十五、五十六三个軍，分由孙桐萱、曹福林、谷良民任軍长，并增加于学忠部五十一軍，担任在山东方面对日軍作战的责任。十月日軍侵入山东，大本营命令韓复榘拨两个师归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馮玉祥指揮，参加在津浦綫北段对日軍作战的任务，起初頗为得手。当时馮指揮韓部第八十一师展书堂全部，自禹城反击日軍，并已克复德州、桑园，正待向馬厂方面前进。展书堂正兴高彩烈，乘胜追击日軍的时候，突然接到韓复榘軍用电话的斥責，叫展书堂立即將軍队回撤，不得向前再进，并限令十小时内撤回禹城。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使展书堂及其部下，均极感困惑。“为什么向前杀鬼子、打胜仗，韓主席还罵我們，說我們不該反攻呢？”这里面是有种种原因的。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自徐州到济南召开軍事會議，决定要韓負責指揮山东的軍事，并要韓承担日軍不得越渡黄河的重要责任。韓要求发重炮三十門配备在黄河南岸，以便固守。李宗仁允許“立即照办”，一面派駐在徐州的炮兵旅史文桂旅长率領全旅炮兵，立即开往山东泰安，一面向蔣报告。可是蔣介石得悉一旅重炮調到山东听韓复榘指揮，心中大大不以为然。到十一月初旬，蔣下令調走駐在泰安的重炮旅，在这个时候，正是韓复榘部展书堂师反攻日軍得手的时候，已克复了德州和桑园等地。韓复榘在得悉蔣介石把駐泰安的重炮旅調走了之后，憤不可当，当时破口大罵蔣介石，說蔣介石这样做，不是抗日，而是想牺

牲他的实力，消灭他的军队；那末，他也只好保存实力了。以后日軍大批增援反攻，并偷渡門台子黄河渡口，拟横断胶济铁路进攻济南。当时守軍为韓部第二十二師谷良民部，曾向韓报告：“日軍有千余人已于昨夜(十二月二十日)在門台子过了黄河，我守軍正与日軍激战中。”韓复榘聞报回說道：“日軍过了黄河，我們沒有大炮是挡不住的，你先撤退到周村好了。”

韓复榘这个时候，一面命令各軍向泰安、兗州方面相机撤退，一面到蔣介石駐济南的总參議蔣伯誠那里說道：“日軍已过了黄河，我軍沒有重炮，难以固守。我已决定放弃济南，候中央增援，再行反攻！”蔣伯誠說道：“請示蔣委員長长后再决定吧！”韓很不耐烦地說道：“我已命令各軍撤退，你不走，我先走了，济南已命令孙桐萱率部留守。”韓即乘鋼甲車离开济南，到达泰安暫停。这是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蔣介石得到蔣伯誠的電話报告，給韓复榘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韓不得无令撤退。但韓这时已退到泰安，蔣再命令韓固守泰安。可是韓竟抗命不遵，置若罔聞，又由泰安退到兗州，繼而退到济宁，最后退到魯西曹县，方不再往后退了。这是什么緣故呢？原来魯西与河南省境毗連，他原想撤退到豫西、陝南的山区里去，避开日軍的侵略鋒芒，保存自己的兵力，以便割据地盘。当因河南省駐有程潛指揮下的第一战区部队甚多，韓的退路受阻，于是暫駐曹县。这个时候，蔣介石定下了捉拿韓复榘的阴谋鬼計。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先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召开軍事會議，韓是第三集团軍总司令，当然是与会的一个主角。且李宗仁前在济南召开軍事會議，韓对李印象不錯，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顧慮，由济宁乘鋼甲車到了徐州。就在韓到了徐州的次日，蔣介石由汉口发来了軍机密急电，电中有四十五个高級將領，

定于一月十一日在河南省“开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当然李宗仁召开的徐州军事会议要受到影响，只有到“开封”开会去了。韩复榘部下孙桐萱（最心腹的部下）也列在四十五个将领之中，韩当时虽然稍有犹豫，但觉得这样大的军事会议，当不会出什么岔子；而且和李宗仁等人一齐去，又不能有所托词；加之还有孙桐萱和一营手枪队保护前往，也就不起什么怀疑了，于是就同李宗仁、孙桐萱同去“开封”了。直到韩在开封被扣以后，李宗仁才明白这是蒋介石搞的一个计策。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也是蒋的命令，目的是把韩驱到了徐州之后，再第二步诱骗到开封去。李宗仁那时也是被蒙在鼓里。

六 蒋介石捕杀韩复榘

关于蒋介石诱杀韩复榘的当时情况，言人人殊；当时报纸上所宣布的更不是事实，是国民党的中央社完全粉饰捏造的。据韩的亲信及当时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所谈，事实是这样的：

韩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到开封，住在黄河水利委员长孔祥榕的公馆里。他的一营卫队留在翔甲车上，对韩说是因为城内住着很多军队不方便。他带了参谋长刘书香、参谋处长张国选、张斌、交际处长曹青山和传令队等计有四十余人，都一同住在孔祥榕公馆里。

一月十一日下午七时，蒋介石在河南省政府召开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并先通知说为了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会议在夜晚举行。到了夜晚开会的时候，韩同孙桐萱等同坐汽车到了省政府大门口，即看见电灯旁贴有一张通知，上写“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并有军警宪兵在指挥车辆，把车辆排列到旁边的空地上。韩当时

和很多与会的将领，一样下車向里走。到了第二道門口，左旁屋門上貼着“隨員接待處”，于是韓帶去的三個衛士和孫桐萱帶去的一個衛士，均留在接待處了。韓同一些參加會議的將領，一路談談笑笑地來到了“副官處”，看見貼有一張通知，上面寫着“奉委座諭：今晚高級軍事會議，為慎重起見，所有到會將領，不可攜帶武器進入會議廳，應將隨身自衛武器，暫交副官長保管，給予臨時收據，俟會議完畢後憑收據取回。”同時，當着韓的面前，也有些將領紛紛地正將手槍從腰間掏出來交給副官處，取回收據。韓也不疑有他，就將自己身上帶的兩支手槍，也掏了出來交給副官處，把收據放在衣袋里，跟着大家一齊進入會議廳。在會議廳里，韓的座位左邊是劉峙。蔣介石親自主持會議，他起頭一開口就說：“我們抗日是全國一致的，這個重大的責任應該說是我們每一個將領又不容辭的責任，可是，竟有一個高級將領放棄山東黃河天險的陣地，違抗命令，連續失陷數大城市，使日寇順利地進入山東，影響巨大。我問韓主席：你不發一槍，從山東黃河北岸，一再向後撤退，繼而放棄濟南、泰安，使後方動搖，這個責任，應當是你負擔！”韓復榘是有膽量的，而且他是做上的老資格，他听了蔣介石的話，毫不客气地頂上去說：“山東丟失是我應負的責任，南京丟失是誰負的責任呢？”韓的話還未說完，蔣正顏厲色地截住韓的話說道：“現在我問的是山東，不是問的南京；南京丟失，自有人負責！”韓正想開口反駁，可是，劉峙就拉着韓的手說：“向方（韓的號），委座正在冒火的時候，你先到我辦公室休息一下吧！”于是他拉着韓從會議廳邊門走了出來。

劉峙裝着很親熱的樣子，握着韓的手走到院內，早有預備好的一輛小汽車，劉峙手指着說：“坐上吧，這是我的車子！”韓那里知道這個小汽車就是逮捕他的工具。韓先上了車，劉峙說：“我還要參加

會議去。”說時就把車門關上了。在這個時候，汽車前坐上有兩個人爬到後車廂里來，分左右坐在韓的兩旁，出示預先寫好的逮捕令給韓看，並且對韓說道：“你已被逮捕了。”韓起先還以為前坐上兩個人是對峙的隨從副官，看見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這兩個人是軍統特務，又向外邊一看，沿途布滿了憲兵崗哨。汽車飛快地行駛到了火車站月台上，由兩個特務拉着韓的雙手，並肩登上了預先備好的一列升火待發的專車，並有大批荷槍實彈的憲兵、特務等分布在車廂內。汽笛一聲，火車開了，沿途不停，直達漢口車站。在專車上押送韓的是特務頭子戴笠和龔仙舫。漢口車站上也是有預備好的押送韓的大小汽車，一共有五輛之多，滿載憲兵特務，一齊到了江邊碼頭，專輪渡江到武昌，即把韓交“軍法執行總監部”管押在軍事委員會办公厅旁邊一座二層樓上。這時已到了一月十二日的夜晚。

一直到一月十九日，才組織高等軍法會審，何應欽是審判長，鹿鍾麟、何成濬是審判官，賈煥臣等是軍法官。二十一日開始審訊，問韓以下各條款：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東強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繳民槍、強迫魯民購買鴉片等等。問韓“這些罪証確實，你有何話可以申辯？”韓聞詢之下，只昂首微笑，一句也不答復，也不請求寬恕。法官再向他追問，還是一言不發，無可如何，只好仍令還押。這個審問，就是等於宣判，而且在逮捕令上，已註明了韓的罪狀和革除韓的二級上將及本兼一切軍政職務。因此，韓已拿定主意，一句話也不回答。到了二十四日晚上七時左右，有一個特務走到韓的面前說：“何審判長請你談話，跟我就去！”韓當時還以為真的何應欽找他談談，就隨着下樓。到樓梯半腰中一看，院子里布滿了持槍待放的哨兵，他方知道自己死將臨頭，當時他說：“我腳上的鞋小，有些擠腳，我回去換雙鞋再去。”他邊說邊回頭，就要上樓，就

在他回头上楼脚刚迈了一步，站在楼梯边的特务已开枪向韩头上打去，韩一回头，说了一句“打我……”这时连续的枪已打倒了他，歪在楼梯血泊中。他头部中两弹，身上中五弹，计打七枪而死。

可是，事后蒋介石还伪善地说，已囑令不要打韩的头部，因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的主席，并在《中央日报》上宣传韩的五大罪状及审问多次。但实际上如上面所说的只审问过一次，那一次的审问就等于宣判而已。

蒋介石为什么用这样大的阴谋诡计来捕韩复榘呢？蒋介石很清楚地知道韩拥有很大的兵力，假如他首先召韩参加军事会议，韩也许会借故不到，那便是放虎归山，为患无比，可能韩复榘要率部突围而出，那就有不可估计的伤亡和损失，更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了。因此，蒋事前设谋定计，很用了一番心计。蒋先囑李宗仁在徐州召韩去开军事会议，所以当时报纸上及外间传说韩复榘是在徐州被逮捕的。并宣传韩带有很多的贵重物品金条、纹银等想逃跑，被中央军截住等等，这些都是蒋方的捏造。说是临时发觉韩要逃跑，才下令追捕截获的，借以激起民众恨韩的情绪，掩饰蒋介石借口放弃山东捕杀韩复榘的阴谋。而且西北军的将领中还有些同情韩复榘的人，所以《中央日报》始终没有披露在开封捕韩和召开军事会议的消息。

在开封召开的会议上，孙桐萱当时曾起立要求蒋介石对韩复榘予以宽大处理。蒋介石说：“韩复榘罪有应得，应交军法总监部组织会审，你安心供职。”并宣布韩的军政职务已革除，所遣第三路军总指挥委孙桐萱继任，另委韩的军长曹福林为津浦铁路前敌总指挥。这样，蒋在表面上重用韩的两个军长，以安军心，而孙、曹两人，各得升官，韩的部下也就安定下来了。

在这以后，孙桐萱因有孔祥熙的关系，升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不久被撤职。以后孙、曹、谷三个军合并成为一个五十五军，由曹福林任军长，抗战期间曾先后划归张自忠、刘汝明等指挥，解放战争中在鲁西被消灭。吴化文部手枪旅则划归沈鸿烈指挥，抗战中由沈率领入鲁，后投降日寇，胜利后又投国民党反动派，解放战争中在济南起义，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韩复榘在武昌被枪毙后，由他的二太太纪甘青和他的亲信张斌等人前往收尸，葬埋在鸡公山公墓。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
上海市文史资料办公室供稿)

刘湘死后川局波瀾記略

黄应乾

一 刘湘病中的策划和致死的傳聞

抗日战争初期，刘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南京淪陷前，刘湘在汉口，臥病万国医院。刘患胃病多年，因經常喜吃炒沙湖豆、螃蟹等不易消化的食物，使胃病逐渐加重，成为胃溃疡。这时，刘的主要侍从人員是參謀长傅常、經理处长刘航琛、駐汉代表邱甲等数人。刘在病中考虑到一时不能返川，前后方的軍政应作重新部署。傅常等也恐刘湘死后失去权势，为巩固他們的权位，傅等同刘商定三个策划：

（一）撤換唐式遵在前方的軍职，以傅常繼任。刘湘认为唐式遵愚而詐，且与蔣集团勾結有據，对他甚不放心，遂下密令交给傅常，要傅到安徽青阳，借慰勞唐部为名，和机行事，將唐撤換。傅到前方后，得悉刘湘病情日趋严重，又恐唐拒不受命，发动兵变，自己生命难保，就在深夜將刘的密令焚燬，隨即返回汉口。

（二）撤換邓汉祥的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以傅常繼任。刘湘以邓汉祥吃“两头望”（即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借地方力量，与国民党中央有所勾結；同时又挟此自重，且在川中各县布置与她有关的具訓学生分任县、局长，以树党羽。刘对邓早已不滿，所以有以傅繼邓的决定。乔毅夫赴汉探視时，刘曾問乔：“邓汉祥造得起反嗎？”

乔答：“我们在后方向有军队十余万，邓那几个学生敢造反吗？如有异图，我们请他到绥署优待起来（拘押之意），不就完事了嘛！”刘始默然。傅常素性胆小畏难，此项拟议也无形搁置。

（三）以潘文华返川代理川康绥署主任和四川省府主席。傅等与刘密议，电召潘文华返汉口，回川兼代绥、省两署职务。时潘率部在安徽青阳参加抗战，奉刘电后即刻起程返汉，探问刘病。刘握潘手，仅呼“仲三”（潘别号）二字，即呜咽不能成声。次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九日）刘即死去。潘回四川的计议亦未实现。

刘湘虽患胃溃病甚剧，但身体素健，尚能作长时间的支持，本不致遽尔亡故。后病情急速变化，传闻系被特务阴谋毒死，现把我*听到的关于刘湘致死的各种传说，分述如后，以供参考。

（一）据孙壹东谈：他被囚于贵州省息烽县集中营时，与特务同押一起，孙听到犯罪的特务说过，刘湘死在汉口，系为特务所毒害。因经常为刘诊病的医生，一为葡萄牙人，一为德国人，两医生可能即为特务，或为特务所收买而下毒手，在打针时注射某种毒药，即可使病情发生恶化。

（二）某友人曾云：为刘诊病的医生曾告知护士，将毒药水滴三点交刘服用，护士只滴一点药。刘服此药水后，病势即转沉重，护士气得用头撞那医生，因刘曾允送她一万元，并允送她出国念书，又有相爱之意，故刘死后，护士很感悲切。

（三）潘文华云：刘死时，其遗体有紫青伤痕。邓锡侯从前方返省，往省府弔唁，刘湘夫人向邓云：“刘主席是被人害死的呵！”言下悲愤填膺。时刘部属均各自顾不暇，亦未引起应有的注意。

当时我正在汉，曾听友人谈及蒋集团决不让刘再返川，以免

* 编者注：作者黄应乾，系川籍国民党立法委员，当时接近潘文华。

国民党政府迁渝后的麻烦。刘已自知很难脱离虎口，但以为有自备飞机一架，尚可乘以回川。不料飞机在由渝飞汉途中，因机器发生故障，坠地焚燬，以致无法逃出汉口，最后終遭毒手。

二 成都軍人反对张羣、願視同主川

刘湘死后，蒋介石聞报大喜，以刘部下多半同床异梦，上层將領早經分別加以收买，这时四川羣龙无首，大可为所欲为。因此，蔣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发表张羣为川省府主席。此令到蓉，刘的部屬以武德学友会为中心，約請鍾体乾、张再、彭煥章等會議，大家以刘湘新故，蒋介石既不派員来蓉慰唁，又不与有关各方商洽，即命张羣主川，实属趁火打劫，意图宰割；因而羣情激昂，决定反对张羣来川。当夜即在全城张贴标語，并举行遊行示威。軍人中由彭煥章領銜，率同留守四川的十七名旅长朱果、刘哲雄、刘树成、李子猷、周成虎、张鴻誠、唐华等联名电蔣，以张不治輿情，請收回成命。至于邓汉祥一見张羣新职发表，就立即拟出欢迎的电文，省府各厅长均已签名，独保安处长王陵基拒絕签字。武德学友会同人聞訊大譁，有主张将邓“攔平”（打死之意）之議，經有人婉言劝解，始告緩和。

当时前方抗战軍事方殷，后防又复动荡，国民党中央在川势力薄弱，张羣就无法来川。蒋介石知硬干不行，遂改变策略，复电川中各將領，有“刘故主席部屬即中正之部屬，決一視同仁，希各安心”等語；并另发表鍾体乾暫代川康綏署主任，邓汉祥暫代川省府主席，以維現局，靜待后命。蔣又电召刘树成、周成虎赴汉，亲为撫慰；临行約宴，宋美齡亦出作陪，意在阳为籠絡，以期分化川軍。

张羣既不能到蓉，中央与地方之間，一时形成僵局。蔣对四川決不肯輕易放手，以願視同曾任重庆行营主任，对各方大多熟悉，

阴谋以顾继张主持川政。当时刘文辉坐镇西康，邓錫侯远在山西，潘文华留在汉皋，唐式遵驻军皖南，成都又全系刘部军人控制，四川形成了内外团结一致的局面。顾如何入川，在汉颇费踌躇。时潘文华正在汉口，因被唐式遵勾结国民党进行陷害，受到撤职留任处分，自己嫡系部队又均参加前方抗战，彼以忠于刘湘，对国民党各派系无甚特殊关系，新遭刘湘之丧，进退维谷，处境困难。我同潘清洲、戴高翔随潘同住扬子江饭店，一榻横陈，孤灯荧然，瞻望未来，良多感喟。恰于此时，郭汝栋已成顾祝同嫡系亲信，郭、潘在川，交流最笃，潘经郭的负责保证，得到顾祝同的信任，立即撤销处分，并内定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蒋又对潘一再召饮，殷殷敷衍。顾、潘等几经密谈，顾表示他如主川政，系过渡性质，将来决以全力扶植潘，并希望川军能多参加抗战。郭希望将来潘在川主持军政后，留守后防，将其参加抗战的二十三军与郭部的二十军合并为二十八集团军，由郭以副总司令负责在前方指挥，如此郭可在军事上成一单位。嗣后潘以“甫系”（刘湘系）军队保有团结，对郭的愿望婉辞拒绝。当时顾、潘、郭三人在汉洽商决定后，同乘专机返渝进行活动。顾、潘抵渝，即与成都有关军人王陵基通长途电话，据答：“顾祝同如敢飞蓉，当以机枪大炮在机场欢迎。”顾既不能到省，即囑潘文华先期飞蓉，设法运用。潘到省后与綏署代主任鍾体乾及乔毅夫等经常商谈，得悉反张即是反蒋，如站在蒋方说话，定必遭到反对。潘以大势所趋，乃完全赞同军方主张。鍾以王續緒是“老乱”，王陵基“粗暴”，唐式遵“痼症”，均不可以有为，独潘文华较为长厚，遂决定扶植潘继承刘湘事业。当应潘请求，由綏署补发欠饷四十万元，并携一百万元作为武德学友会基金。随又推潘任武德学友会会长，军人方面如彭煥章、刘兆藝、刘树成等均向潘表

忠誠。自是潘在川根基始告穩定。王縉緒因與蔣有勾結，早不為劉湘所信任（劉生前曾說笑云，他有三個禁令，一禁王縉緒的打油詩，二禁唐式道談馬路，三禁蒲殿俊寫大字）。王與武德會同人不相和洽，而又熱中省主席，遂與潘深相結納。他們秘密約定由王主川政，潘以綏署副主任兼省府委員；王先主持省府三個月，期滿即率部出川抗戰，省主席即由潘以綏署副主任兼理。王以此相引誘，求得潘的全力支持，潘大悅，即密電告我，對王事悉心協助；一面又將成都軍人以王縉緒任川省主席、潘文華任川康綏署副主任的主張，正式通知顧頌同，且表示軍方態度堅決，甚難為力。顧知陰謀無法實現，索然返漢，密商蔣介石，遂有第三度以賀國光繼主川政之企圖。

三 王縉緒壓倒賀國光得任川主席

當時我正在漢作代表，在法租界萬國旅館三十一號經常與劉航琛、盧作孚會商川事，並與何應欽保持聯繫。此時何以“笑面虎”姿態出現，如潘、唐、王（縉緒）、王（陵基）及軍方代表去看他，總表示他是劉湘的知心朋友，好言安慰，勉以大局為重，決不使用刺激語氣。蔣“硬”何“軟”，扮演雙簧；但此等技倆，卒歸無效。而劉航琛、盧作孚等均主潘任省政，張羣亦表示“川政還是作三好，不能因趕走‘節度使’就推‘留後’，是為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王因硬要省政，與張羣對立，張對王深表不滿。而成都鍾體乾等以世亂方殷，均不主潘奔軍權，重慶石體元等（石曾任潘文華的秘書長）亦贊同鍾主張，故潘根據我對張羣談話的報告，最後專函給我，說明他不願作主席的決心，並與王商妥於同年二月派李星輝來漢（梅恕曾參加）與桂系白崇禧商洽（白時任副參謀總長），並經常和潘宜之保

持联系。刘湘生前与桂系訂有密約，共同反蔣，故白崇禧很表支持，并暗示“成都軍人只要坚持主张，蔣会从长計議（即蔣定要軟化之意）。”軍队方面亦推刘兆藝、彭煥章等到汉，向何应欽及各方呼吁，坚持軍方所提出的愿望。此时，蔣集团以贺国光为四川軍官速成同学，与潘等关系密切，且在參謀团入川后与各方相处大体尚融洽，且何应欽支持甚力，刘、卢亦密为建議，蔣乃内定由贺国光主川政。随即由蔣分别电召刘文輝、楊森、王縉緒、唐式道、王陵基等先后到汉，会商川事。王縉緒于四月初先期到汉，即向我談云：“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对楊森嗎？就是楊不給我四川省长（一九二五年楊森发动武力統一四川战争，最后因王縉緒叛降刘湘，使楊全軍潰敗）。”并以刘航琛曾代刘湘在新嘉坡购买軍械，侵蝕巨款百余万元，他主张清算，且密囑李星輝准备对刘实行綁票。我云：“刘航琛虽坏，但有如‘百足之虫’，加以‘长袖善舞’，在此期間实不应树敌。”王始默然。当时我們分析川局，認為有三件事我們是有把握的：（1）蔣无兵力来取成都；（2）重庆已成为陪都，四川又为抗战根据地，川事不能长此拖延不决；（3）潘文华在成都，内部很团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們兴言及此，确有“弹冠相庆”之感。王亦憤然說：“我只要一名省主席，班底由他們（指蔣集团）組織，这难道还有什么問題嗎？”蔣介石于四月中旬召集會議，参加會議的有何应欽、何成濬、贺国光、王縉緒、王陵基、唐式道等。蔣正式提出以贺国光繼任川省主席，态度至为坚决。王等当蔣面前均表同意，夜間我同李御良（唐代表）、郭松年（王代表）、梅恕曾（国民党立法委員）等在延庆里十九号姓罗的妓院等候消息。王、唐垂头丧气而来，直呼“贺国光到四川，大家完了完了！”适是日午假系武汉行营任何成濬召飲，有王縉緒、李根固等，席間何成濬曾諺：“川局好像鼎鍋里

的开水，不是瓢把冷水便扑得下去的。”我觉得何这番谈话很有道理，便于夜间引用这段话作为反对贺国光到川的理由，以说明川政波澜不是蒋的虚声恫吓或甜言蜜语所能解决的。大家一致赞同我的意见，坚持王主川政，并由梅恕曾拟定电稿，共同签名发出。成都军人接电后，反对贺主川政的电报随之传来，立即为蒋阅悉。贺得知成都军人反对他上台后，便云：“我对四川好比嫁出去的姑娘，这次如能回到娘家，亦不过将房内床被陈设打扫干净，整理就绪，我便离开了。你们那个适宜，便可回来，我都欢迎，又何必恶语相加呢？”言下颇为牢骚，我亦付之一笑。

张羣主川既遭反对，顾祝同又被拒绝，贺国光亦告失败，潘文华决心不干，而王主川政的机会便日趋成熟。王自知为张羣所不满，转而与康泽勾结，得蒋谅解（王参加了复兴社）。蒋召见时，决定王为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以后张羣发表为渝行营主任，王始真除主席），王受宠若惊，并云：“蒋问我几个儿子，我答：因为多娶了几个老婆，便多生了几个儿子，我一生就做了这件混帐的事。蒋介石颌首微笑。”王又云：“我多接几个老婆，蒋还不是多接几个老婆，我混帐，他不是一样的混帐吗？我在幽默他呀！”

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任命王缙绪为川省主席，潘文华为川康绥署副主任。我与王同住德明饭店，王要我电告潘转述蒋意，云潘已经是特任的大官了，何必再作前任的省府委员呢？事后我返成都，谈及此事，潘大骂王极不可靠，以后貌合形离，成为一九三九年川军七师长鬻王张本。而卢作孚在万国旅馆向我谈到：“王主川政，邓汉祥下台，陈筑山继任秘书长，所谓‘以贵易贵，莫知其非矣’？”（邓、陈均系贵州人）虽以蒋介石的暴戾恣睢，专横毒辣，但在“众怒难犯”的形势下，他对川政的三度阴谋诡计均为成都

軍人所粉碎，而王主省政的最后決定，關鍵實在妓院中的一封電報。

四 川軍整編和新省府的組成

一九三二年二劉之戰時，鄧錫侯與劉湘深相勾結。鄧助劉湘擊敗劉文輝後，曾在百花潭康莊密議，參加者有劉湘、劉神仙（從云）及彭煥章等數人。劉湘表示，遇有適當機會，川康綏署請鄧繼任。鄧在川治軍數十年，向主寬大，故鄧主川康綏署，成都軍人咸表歡迎。抗戰初期劉湘系的川軍在鍾體乾主持下分別編成三個集團軍，報請重慶行營批准，其番號如下：

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初由劉湘兼任，劉死由唐式遵繼任，潘文華為副總司令。唐式遵兼第二一軍軍長，轄饒國華一四五師，周紹軒一四六師；潘文華兼第二三軍軍長，轄陳萬仞一四七師，潘左一四八師；郭勛祺為第五〇軍軍長，轄范子英一四四師，田鍾毅新編第七師。

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王縉緒，彭誠孚為第四四軍軍長，轄王澤濟一四九師，彭誠孚一六二師；許紹宗為六七軍軍長，轄廖震一五〇師，許紹宗一六一師。

第三〇集團軍總司令：王陵基，王陵基兼第七二軍軍長，轄劉若弼新編十三師，范南煊新編十四師；張再為第七八軍軍長，轄鄧國璋新編十五師，陳良基新編十六師。

其他派系川軍出川抗戰的，有鄧錫侯部四五軍和孫震部四一軍編成初由鄧錫侯任總司令，繼由孫震任總司令的第二二集團軍；以楊森部二〇軍為基礎編成由楊森任總司令的第二七集團軍；以李家鈺四七軍為基礎編成由李家鈺任總司令的第三六集團軍。

至于留后方的川军属于刘湘系的有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潘文华指挥由潘兼任军长的第五六军，辖陈兰亭一六三师，彭焕章一六四师，还有刘树成的新十七师，周成虎新十八师，李根固新二五师，以及四川省保安处长刘兆葵指挥的保安团队等；其他派系的军队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指挥的黄隐部九五军，辖谢德堪第一二六师，杨晒軒新编第九师；以及驻在西康的刘文辉部第二四军，辖唐英第一三六师，刘元塘第一三七师和刘元璋独立团等。

鍾体乾以川军编制就绪，川局粗安，出川参加抗战的军队正纷纷开拔，遂解除绥署职务，交由邓锡侯继任。此次川军改称各军师长都经国民党政府加官晋爵，实为蒋介石借抗战为名，对川军副谋籠絡和分化的一种手段。

当王纘緒于四月初到汉口时，楊森亦率召宗汉，对川事有所商陈。王約同前往，一再周旋。楊森向我谈及：“过去我不该与刘市澄冲突，他当大哥，我为二哥，如今大哥死了，便该二哥继承，那不是顺理成章吗？且第七战区不应因刘市澄死了便告结束，我支持潘、王在川内主持军政，他们该当主张恢复第七战区，我愿效劳（即愿作战区长官之意），内外相维，大家都好。”但因为互相猜疑，楊的打算自无结果。

中間鮮英等曾主张瀾老先生任川省主席（聞張羣以自己既不能到川，亦曾贊同此議），当由邵从恩、张瀾二老約同到汉口中山公园茶叙。邵征詢我的意見，我答：“表老（张瀾号表方）能返川主政，大家都很喜欢，就是军方通不过。”此議遂作罢。从此王纘緒认为张瀾破坏他主川政，对张在川的各项反蔣活动大加阻挠，并捏称在遂宁查获张瀾私运鸦片烟一大卡車，实屬弥天大谎。

王纘緒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就川省主席职，省政府主要组

成人选系各方面拼凑而成：

秘书长陈筑山，贵州人，旧国会议员，系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向蒋介石推荐，得张季鸾的支持，由贵州省省府委员调任。

民政厅长胡次威，万县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CC系，为陈果夫推荐，原任湖南省民政厅长，此次调长川民厅有“借赵云”之说。

财政厅甘绩鏞，刘湘幕客，理财较稳健，刘航琛对他不满，造作蜚语，并制一联以讽之：“财政无可虞，刘难办来稽会办（刘航琛长财厅，经常不到厅办公，而以稽祖佑作会办，主持厅务）；民厅真不幸，甘既庸兮王又庸（甘既庸系甘绩鏞的同音假借，甘曾长民厅）”。

教育厅长杨廉，安岳人，政粗派，由安徽教育厅长调任。因杨曾强占一有夫之妇，其妻向宋美龄控诉，宋与蒋介石谈及，表示不满；又发现杨在安徽教厅任内有重大贪污事实，遂于重庆中调团受训时予以枪毙。

建设厅长何北衡，罗江人，贼学会分子，与卢作孚勾结很深，且系张季鸾在川得力助手。王对何虽不满，但以张季鸾支持，为了掩护卢作孚任内交代，仍蝉联建厅。

保安处长刘兆葵，南部人，刘湘合州军官传习所学生，为刘部师长，武德学友会核心分子。成都军人坚持以刘继任保安处长，而以复兴社的王元暉任保安处副处长。

潘文华因与王合作，分得三个机构：（1）四川省银行行长潘昌猷（为潘文华二弟，因他的重庆银行以及商业公司等，须利用省银行资金来周转、扩充和运用，故潘文华指定要省行）；（2）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周瑞林（潘部副官长）；（3）四川军管区参谋长戴高翔

(潘部參謀長)。

其他如黃岡想當公路局長，王松谷(唐式遵代表)想當建設廳長，李星輝想當教育廳長等，王上台後，不但無溫語相加，並警告他們，“現在天都亮了，不要亂想，皇城填抓鍋魁，要挨控子(川語，意即忘想非分，將被打)。”黃等叫喊道，“嗨，我們抬了轎子，轎錢不給，還要打我們的‘扶手板’呀！”

五 王縉緒與川中各方面的矛盾

王縉緒為人反復成性，喜怒無常，一飯之德不酬，睚眦之怨必報(但恐幸評他為“望之不似人君”，鍾體乾評他為“老亂”)，以致與各方面矛盾重重，形成四面楚歌。

(一) 王在省府的總理紀念周作報告，詆毀劉湘對他不起，他又公開謾罵劉湘系的師長劉樹成、周成虎。有人曾勸他：“你在劉湘時升到軍長，又兼過川鹽運使(第一肥缺)，他又有啥子對不起你呢？他已死了，你又何必惡語相加呢？且劉、周均為劉湘親信，手握強兵，你又無力量消滅他們，又何必多惹反感呢？”王答：“你清楚，我還不明白嗎？你既清楚，為何不當省主席呢？”

(二) 彭煥章、劉樹成、夏雲三師長以王既主川政，前去看他，表示好感。不料他們到省府守候一個多鐘頭，王始嫻嫻而出，開腔便說：“現在不來這一套了(即不必周旋之意)，大家都跑前方抗戰去了，我們還在後方干啥？保安團長我已撤換五個，還要調換；縣長我已撤換一批，還要繼續撤換。嘉、叙、瀘(劉、周兩部防地)為四川富庶之區，如不註開，我的政治便推不動。今後大家要跑前敵去呀！”態度倨慢，引起彭等的憤怒，從此勢成水火。

(三) 王縉緒與王陵基極不相能，張再、劉航琛、何北衡均與王

陵甚较为亲近，向来看不起王楨緒。王到省府即派人送款与张再，并托致意，张一概不予理会。王很生气，借口查禁烟毒，要缴张的烟枪。张时为王基陵部军长，陈兵自卫，相持数月，王亦无如张何。

(四) 王友人同他谈到张灏老先生是他的老师，又是同乡，应当约张到省府请教，王当同意，并已约定会晤时间。届时友人问他，是否派车迎张，王半响云：“我为啥要约他谈？我谈的 he 不懂，他谈的我不愿听，你给我喊他‘爬’？”绵阳专区行政专员鲜英为张宗儒，被王撤职。荣昌县长杜象谷为张私人秘书；被王加以贪污罪名，几被枪决。张以王横施压迫，由省避居重庆。

(五) 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座谈会由省府举行，王出席讲话：“军人出征打仗，这是光荣的，你们在家应守妇道。”随指一穿高跟鞋的军属说道：“你穿起高跟鞋在马路上摇摇摆摆，是不是想不守妇道呢？”这一军属立即哭起来了，到会军属以王谈话侮辱他们，很感不平。

(六) 潘昌猷长省银行后，借口行规，对王部属贷款来做私生意的，多所限制。王部属啧有烦言，王亦想借此机会，树立自己的经济势力；决定将省银行收归掌握，以郭松年(王的代表)为省行董事长，熊觉梦(王的女婿)为总经理。王又以袁育梵(王的姪女婿)接长川江航务管理处。自是潘、王两部的矛盾，更趋尖锐了。

(七)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四川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成立，王作施政报告，有一段话说：“现在天都亮了，有些人偷了几十年，未必还要偷吗？该收得手了。我本来准备一桌酒席端出来，他们要给我零零碎碎地拿出来，我有啥办法呢？”意在區別建厅何北衡、財厅甘績鼎。何北衡感到难堪，不久便离开建厅，对王也就大为不满了。

(八) 王上台后，声言要逮捕刘航琛，清算刘在財厅的贪污款

項，并咨文重慶市府將劉拘押來蓉。劉以得張率支持，渝市府對王來文置之不理，而軍長范紹增又公開派兵保護劉的住宅。王大罵范紹增：“六親不認了，我們是兒女親家，他都不維護，反派兵保護省府要犯。”劉樹成爲此事在成都漫罵王縉緒說：“劉湘死后，那個的帳清得？拿薪水來說，不夠有些人的姨太太買玻璃襪子呢（指王的姨太太銀袂蝶）。如要清帳，我們大家來清。”事實上劉湘死后，劉航琛即約劉樹成、周成虎到榮昌燒酒房秘密商談。劉云：“劉湘尚存有二十五萬元在川鹽銀行，由我代管，你們將來擴充部隊，應多培養幾百幹部，但經費困難，你們有啥辦法呢？劉湘這筆存款當交你們運用，按月連同本息，可按二、三萬元以作擴軍準備，但劉湘圖章應請劉周書（劉湘的老婆）交我，以便將款提出，另立戶頭，你們便可自由使用了。”劉、周二人聞之大悅，遂聽命于劉航琛而與王縉緒勢不兩立了。劉航琛施用此項巧計取得劉湘圖章后，凭此印鑑，倒填年月，將彼貪污之款便寫在死人（劉湘）的帳上了。同時又將劉湘存入川康、川鹽兩行之現款取出，歸己運用，由存戶轉而爲股東，便將股票交與劉周書按月領取息金。故王清算劉的貪污款項，因多系劉湘條令支用（根本無財政制度），自無結果。聞于川鹽銀行查出劉航琛給澡堂擦背費三百元的紙條一張，劉因早有準備，便“款段出都門”，到貴州省主席吳鼎昌的花溪別墅作上賓去了。兩年後，劉航琛以該存款用盡爲詞，通知劉樹成、停止補助，劉樹成始知受騙。

（九）川省臨時參議會于一九三九年三月開始酝酿，由各具提名二人報省府，由省府加倍提出候選人名單，報請行政院核定。當時內定以李肇甫爲議長，鍾體乾爲副議長。李征求鍾意見時，鍾云：“要干我就要當議長，如要我當副議長，我連參議員都不干。”李

又商同潘文华，將熊克武、但懋辛及軍方有关人選密報張羣，請為注意（此項專函系吳鈞先來渝陳述）。四月，名單發表共為參議員七十人，李肇甫為議長，向傳文為副議長（向因硬要，得戴季陶支持，故作副議長）。王懋緒名下，只有一名參議員，余均落選。潘、李等企圖借省參議會以限制王的活动。

（十）刘文輝、邓錫侯談到川康兩省联防時，認為他們槍枝雖多、子彈缺少，擬商王懋緒少成立兩個保安團，而以此項新餉密購子彈存儲，以備萬一。邓向潘文华商妥後，潘自告奮勇，與王洽談。王表面贊成，隨即將此項密議電告蔣介石。又國民黨政府遷渝後，龍雲奉召飛渝逃職，路過成都，與刘文輝、邓錫侯、潘文华、王懋緒簽訂密約，表面上以加強團結，擁護中央，三省联防，共同患難為借詞，實則為繼續劉湘時與龍雲之密約，互相支援，以對抗蔣介石勢力和鞏固三省地盤為目的。此項密約簽訂後，王即電告蔣介石，而此項密電又隨即洩露出來。邓、刘、潘聞悉此事，既甚不快，又感威脅，以王太不可信，密商對策，決計驅王。當時邓、刘、潘對各方面有關人士尚能多方設法，兼收并蓄；而王則一概不予理會，行為又極妄誕，使在職者人人自危，而無職者又感到永無安頓的機會。於是引起人心不安，反王聲起，遂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六 川軍七師長反王的經過

一九三八年刘文輝在成都時，曾在某次紀念劉湘的集會上發表演說，首先引用陳子昂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一詩來表達他追思劉湘的感情，繼述他同劉湘的一度乖舛，有如“君子之過如日之蝕”，希望今後友好團結等語。一席演說，大受歡迎，“甫系”軍人，自是對刘文輝多表好感。劉派

邵石痴为驻省代表，与邓部代表馬毓智、潘部代表彭煥章等經常密談，商定步驟，积极共謀驅王。

第一度會議地点为东門外放生池，时间为六月初，借与刘树成供生为名，由邓部代表馬毓智(川康綏署參謀长)約集。刘树成亦于当日午前赶到，并代表周成虎签名；其他参加者为师长謝德堪、彭煥章、刘元塘、楊晒軒、陈兰亭及邵石痴、黃岡、邱素双、黃謙怀等二十人。席間大家对王主川政的措施荒謬，一致表示憤慨。馬毓智立拨二千元，作为活动經費。

第二度會議在江汉路邵石痴住宅举行，参加者有彭煥章、謝德堪、刘元塘、刘树成等七师长和极少数有关人員，决定事項为：(1)草拟反王电文，不用通电，只采密陈方式；(2)如发生軍事行动，推定謝德堪为总指揮；(3)推黃秋侠赴渝，联系成渝双方共策进行；(4)严守秘密，以邵宅及任家巷潘宅作为經常商談的地方。黃岡來渝后，駐曾家岩潘宅，隨即約同邓、刘、潘三部駐渝代表和友好等約二十人聚会于潘宅，由潘昌猷主持，参加的有冷杰生、赵巨旭、刘航琛、石体元、姚仲良、邱甲、黃应乾、吳晉航等。黃岡报告成都商談經過(牛范九在渝亦参加过)后，决定联系有关方面，宣传王的罪恶，并輪番在康宁路冷宅及金城別墅赵宅会談，三部团結，空气热烈。九日晚成都彭煥章来长途电话，請潘昌猷談話，我与黃岡同在。彭詢潘云：“电文及各項均已准备就緒，是否即将电文发出？”我們贊成立发，潘答彭云：“电应立发，王必垮台。”翌晨，七將領的灰(十日)电便发出了。

灰电以彭煥章領銜，签名者为陈兰亭、謝德堪、刘元塘、刘树成、周成虎、楊晒軒，共七师长。电文数王罪恶，大要为：(1)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希图坐收漁利，攘夺川康政权，归己掌握；(2)征兵征实，扰民病民；(3)侮辱出征軍人家屬；(4)招权纳贿、实官獨

爵；(5)任用私人，树立党羽，請为速即撤換，以平民憤，并請遴選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主持省政，用順輿情。此电既反对王楨緒，同时亦在拒絕張羣，各將領均主由潘文華繼任省政。

当时成都方面，刘树成师在簡阳的徐正綱旅率队进驻松茂山，邓錫部队前进到新津宝子山，刘元塘派队由双流向簇桥前进，謝德堪师由新都进驻天迴鎮，向成都警戒，彭煥章住省垣部队亦作战时戒备。刘树成出外会客，改乘大卡車，車上架机关枪，如临大敌。有的說，楊弯子的袍哥队伍开进成都了；有的說，陈誠要派飞机二百架轰炸成都。謠言四起，人心浮动，省垣局势，頓呈紧张。

蒋介石接到七师长反王电文时，速說：“这几个乱师长又出岔子”，并決定指示賀国光会商邓錫侯、潘文華共挽危局。先是，邓、刘、潘决計驅王后，刘早返西康，潘于四月赴閬中边区綏署，邓亦提前赴川东一带調軍。邓行至梁山，正值灰电发出，賀速电邓返省(潘借口防务仍留閬中)。邓于十二日由梁山直飞成都，約集各將領談話，囑以維持各地治安，靜候中央解决。彭煥章、夏云亦赴閬中向潘会報，潘指示前方正在抗战，后方不可“打响”(即不应开枪作战)。潘对刘树成亦作此項指示，并囑注意团结，防止分化。

七师长中，刘元塘想当軍长心切，乘机赴渝活动，受蔣集团收买，回成都后表示消极。刘兆藎因系保安处长，态度初頗游移，后見灰电发出后并无任何处分，遂决計反王，于七月初会同七师长赴新津純阳观忠孝堂插血为盟(杀雄鸡，吃血酒)。席間邵石痴多方打气，大家表示，一定反王到底。刘元塘未去，改以刘元琮参加。成都特务魏廷鶴聞訊，約同张志和赴新津进行調解。刘树成說，“一切要王治易(王續福号)先下台再說。”魏保証王决心出川抗战，刘一笑置之。

灰电发出后，我于当日午后即飞成都，駐紮煥章师部，將重慶

情况会混。在此期間，每天二、三十人羣集彭師部，或則吞云吐霧，或則麻將八圈，或則酒肉征逐，或則談古說今；交換情況，一致認定蔣是無力平“亂”而王必然下台了。賀國光談：“四川情況複雜，王治易如何搞得好的？行轅在成都，他還不理會呢？以後就看蔣如何決定了。”鄧錫侯在綏署向我談：“王老么一定下台，就看下文如何分解了。”我返渝也將成都情況詳細向同人談及，並在康寧路吳宅訪候張潤老先生。張談：“王橫緒真愚蠢，以為反對我，壓迫四川軍人，就可博得蔣介石的歡心，在四川便可長命富貴。只要大家同他不合作，蔣介石就會犧牲他，王真愚蠢啊！”

七師長反王時，經過很機密，王事前只略有所聞，以為他們不敢“造反”。灰電因系密陳，列有那些罪狀，初尚不熟悉，自以為有蔣介石撐腰，滿不在乎。隨而見到部隊開拔，進逼成都，彼所能指揮的只有保安一旅，無力應戰，坐困愁城，無計可施。嗣聞蔣介石不予支持，神色沮喪，退志始決。

九月間，何應欽來蓉，駐中央軍校，並派蕭毅肅了解各方情況，征詢對川事意見。大家以川事非速去王不能得到安定，王亦自知無法戀棧，乃於九月下旬離蓉赴渝，準備轉往前方。

七 蔣介石兼選四川省主席，為張靈鋪平道路

蔣於十月初分別召集鄧錫侯、潘文華赴渝，告以王橫緒決出川抗戰，並說：“川省主席，我要自兼，不是說玩的。”鄧、潘均表歡迎。事先張羣與鄧談：“你又不願主省政，劉文輝中央是不相信他的，潘文華精力很差，難勝繁劇”，暗示蔣自兼川政勢在必行。蔣向鄧說：“此次事件，彭煥章是領銜，我要處分他。”鄧答：“我是綏署主任，彭是我的部屬，我治軍無方，請先處分我。”蔣又交一手令，為“失意軍人無聊政客邱嘉雙、郝石痴着即逮捕押解來渝，以隄法辦”。鄧答

邵和七师长关系密切,如要处分,恐局势轉趋复杂,請再斟酌。蔣云:“你返省后,酌办好了。”

蔣曾詢潘以四川人不满张羣的原因,潘答:“岳軍离川太久,大家不了解他,所以无感情。”邓潘返省刚三日,蔣兼理四川省主席而賀国光以行轅主任兼省府秘书长,代行主席职务的命令便发表了。

有人曾向蔣談:“你既为行政院长,便不应再兼四川省主席。”蔣答:“院长我可不做,四川省主席不能不兼。”事实上蔣每年难得到省府三次,成了遙領之局。一九四〇年十月省參議會正式会期,秘书长賀国光应出席报告,但当时省府对全年决算和預算既无书面报告,对上次省議会的提案处理亦无书面說明。經參議會陈古杖等严詞質詢和指責,賀大成窘迫。省參議會对省府发生不满,而各方面对蔣兼理四川省主席多有責难,自是蔣乃乘机派賀耀組飞省,分訪邓錫侯、潘文华传达蔣意,以张羣繼主川政。邓、潘立表贊同,刘文輝与张羣交好,亦有默契。张羣任四川省主席,至此已水到渠成,遂于十一月十三日明令发表。张羣就职的深夜,成都合城张贴标語传单,反对张羣主川政,并丑詆其家世(辱罵张为龟儿子)。警察局长戴頌仪将标語、传单分別檢送张羣閱看,张臉色頓表沉重,后获悉为楊全宇(曾任成都市长及教育厅长,改組派,四川·西充人)所主使。嗣因合川囤集谷物案,楊全宇被押重庆軍委会,张乃电蔣有“不杀楊全宇則物价殊难稳定”之語,楊遂被枪决。张羣沉深阴狠,外寬内忌,在省參議会的茶会上,他曾表示,他追随蔣介石数十年,决以身殉葬云。

王縉緒挾成都軍人的力量以拒絕张羣,而彭煥章等七师长复借軍隊力量以赶走王縉緒,蔣兼理川政又为张羣鋪平道路,此走馬灯式的旧政局轉来轉去,都是黑漆一团,而老百姓的生活便更加苦不堪言了。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資料工作组供稿)

民生公司概述

吳晉航

赶热行市起家

民生公司创立于一九二六年。这个时期正是四川境内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已经形成，混战比较频繁的时期。当时四川有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军匪纵横，一是交通梗阻。从交通方面看，既无铁路，又少公路，轮船也极有限。主要的交通工具陆路仍是轿子和滑竿，水道是木船；速度既慢，途中又不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轮船就成了天之骄子，极受欢迎。英日资本家看中了这一宝，就在川江大量增加轮船，获利极厚，几乎是一年就可赚得一条船的对本利润，称为“黄金之路”。民生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就是在这样一个川江航业的黄金时代，赶热行市创立起来的。

民生的创办人卢作孚，出身于小市民家庭，只受过小学教育（合川瑞山小学毕业）。由于他刻苦自学，掌握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知识。在杨森任四川督理时，他作过成都市通俗教育馆馆长；工作虽有成绩，却因设备费很多，为人中伤，负气辞职，回合川原籍。当地有些士绅愿意集资创办轮船公司，并在合川县城办一电灯公司，两事都由卢作孚负责。当时重庆、合川之间的北碚是土匪聚集的地方；要办航业必先解决航行的安全问题，所以卢作孚又被推任峡防局局长。等到轮船公司股本认定了数万元以后，卢

就到上海，向外商洋行购买发电设备，向和兴造船厂訂造一只七十吨的小輪船，命名为“民生”。但是輪船公司所收到的股本还只有八千余元，不够支付船价。合川县知事郑东琴就以便利渝、合交通为理由，商得县中士紳同意，在县中教育經費項下先行挪垫一部分款項。当輪船在上海預备启航时，又向聚兴誠銀行（川幣銀行，楊曉波任經理）貸借了数千元。卢作孚乘新造的民生輪船回到重庆，正益川江航业兴盛时代，股东們看到有利可图，无不踊跃繳納股款，資金問題也就解决了。

民生当时的业务是以客运为主，貨运为辅，往来于合川、重庆。每次开船，卢作孚必亲自到船检查，并处理一切問題。公司最初設在重庆水巷子汇源店，租一个房間，食宿办公都在那里。他的主要助手听说就是他在瑞山小学的同学郑璧成、彭瑞成。經營一年，获利甚厚。随即加造民用輪一只，又购买順庆輪一只，改名“民望”，增強渝涪航綫。从购买順庆輪的經過，可以看出四川当日軍閥橫行的情况。原来順庆輪也是順庆富商譚謙六集資赶热行市建造的，从造船到开閩都非常順利。但船到重庆时，駐在重庆的川軍师长范紹增認定这船是駐順庆的师长罗泽洲的，范同罗有宿怨，就把船扣留。虽經譚一再申明与罗无关，范总不相信，扣留几有一年。最后由郑东琴居間疏解，同时譚謙六也为債務所迫，愿将船售予民生，証明同罗确实无关，这样才得解决。

当时川江不靖，外商輪船有的由小兵輪护送，有的有外兵随船保护。中国商輪有时也請有航务处士兵随船护航。无论中外商輪，領江台、大餐間和官艙的两边都装有鋼板，以保护駕駛人員和乘客的安全。經過土匪應第地带，有些乘客就藏在貨艙下面。輪船行駛很快，又只在大碼頭停靠，这不特可以避免零星股匪的威

扰,同时还可减少驻军滥收税捐的麻烦。由于有了这些条件,輪船运费就提得很高,利潤更大。因此想要經營航业的人就多起来,重庆、泸州两地商帮也有多人集資开设輪船公司。英日資本家經營的怡和、太古、日清这几家較大的公司更是紛紛增加适宜行駛川江的輪船,并且凭借不平等条約的特权,任意开辟航綫,扩大范围:不仅伸入重庆、万县,即連未經开辟为商埠的泸县、叙府等地也乘势侵入。华商小輪船公司不断增添,漸漸供过于求,业务竞争异常剧烈。这些小公司都只有一、二只輪船,經營管理又非常腐敗。例如渝江公司經營航业将达一年,公司負責人还不知道渝江輪的载重量,直到航务处查禁私貨时方才明白。到了一九二九年前后,华商輪船公司,竞争不过外商,紛紛倒閉。民生虽然起初也只有三只短航小船,但是卢作孚能采用資本主义的經營管理方式,別人賠本他賺錢。在购买順庆輪船之后,就开始施行兼并政策,从事扩张。他所努力的重点是改进經營,減輕成本,力求同外国資本家对抗。記得陈学池曾向我說,卢作孚第一次同王陵基見面,就大談航业,說要統一川江的航輪;可見大魚吃小魚的計劃,他是早就决定了的。

发展兼并三部曲

在川江航业漸漸处于不景气的时候,民生公司就对其他輪船公司开始了兼并的活动。以下是它的发展兼并三部曲。

第一步兼并商輪。卢作孚兼并商輪所采用的手段,是先就营业不佳、亏损显著、負債已多的公司商洽收买合并。一經議定价格,大都由民生付与部分現款,作原公司偿还外欠,或者对急需現款的股东退还股本,使問題順利解决。其余大部分的价款,則轉入民生,另換股票。原公司所有公司和輪船职工,也由民生全部接

收，重新安排工作。所以它在兼并的过程中，进行是比较顺利的。除了一家挂法国旗的聚福洋行有两只輪船（船名福源、福同），因为首先托庇外人，不受軍閥压迫，其次老板黃錫滋和經理李泽敷，資本厚，經營得好，没有被合并以外，其余的商輪，都被民生并吞了。

紧接着第二步就是兼并軍輪。当时的軍閥投資的輪船不在少数，例如李家鈺的川东輪、川南輪，范紹增的富順輪，楊森的永年輪，刘湘、潘文华、唐式遵、甘緒鏞等的永丰輪等等。軍閥們經營的輪船，往往凭借势力，获得特有的方便。例如貨运的裝載，軍队的检查，在开行時間不受到阻碍等等。这样，軍輪就成为民生的劲敌。卢作孚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向各軍閥陈說利害，劝其合并。他那时已兼任川江航務处的处长，何北衡任副处长，何间陈学池、刘航琛等北大派人物也一齐在刘湘面前为民生講話。在航业形势衰頹的情况下，軍閥們为了保全老本，乐得同意。不过接洽合并时，就不象同商營輪船公司那样順利。因为这些軍輪公司的經理，无一不是与各軍閥有特殊关系的人，折本有东家，中飽归自己。所以接收这样一只輪船，却要經過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其中如潘昌猷主管的永丰，田习之主管的永年，卢作孚却是既花錢，又“下話”（四川土語，特別客气的意思），費尽心机，然后才达到合并的目的。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叙府、泸县属于廿四軍防区，駐叙府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稅捐总办刘文彩，是刘文輝的五哥，拥有蜀通、南通、昭通三只小輪船，行駛叙、泸、渝，实行垄断；由叙泸运出貨物，价值貴，運費高，其他公司不能染指，民生也大受影响。卢作孚曾亲去叙府，面商刘文彩，企图在营业上得到比較公平合理的条件，好久不得要領。于是轉赴成都，求助于刘文輝。卢作孚去的本意，只是要求不被歧視，不料竟得到意外收获。刘文輝甚不以刘文彩兼營航

业为然，电令刘文彩将輪船无条件地合并于民生公司。記得我在成都有一天去刘文輝办公室，巧遇刘文輝正責备刘文彩，只听见刘文輝严厉地說：“你們縱容底下的人办輪船，这事是那样简单能办好的嗎？应该交给卢作孚，凑和一个朋友，办成一桩事业。”看到我突然进去，他們才沒有繼續談下去。按道理說，刘文輝答应了，事情該好解决了。但并不然。刘文彩觉得有利可图，总是阳奉阴违，拖延应付，不肯合并。一直拖到二刘之战，刘文輝兵敗退出叙、泸，这批輪船被刘湘部队俘获，才征得刘湘同意，作为刘文輝投资入股，并入民生公司。而且也还不是全部，刘湘所部师长潘文华扣留一只，借口軍用，作为私有。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民生同四川的封建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第三步是向外国輪船公司进攻。一九三四年向美国公司购买了美孚輪船，向英国太古公司购买了一只沉輪，一九三五年向美国捷江公司购买了五只輪船，这是当时比较好的輪船。捷江公司是董少生的哥哥董季达代替美国资本家經營的一个公司。董季达死后，董少生繼續負責，他就是这样进入民生公司的。

民生的企业逐年扩大，輪船逐年增加。航綫也逐年增多。其所以能够这样的发展，一方面是靠改善經營管理，剔除积弊。对于碼頭、倉庫、躉船等設備，充分加以合理利用。这比过去只一、二只輪船就設一个公司的情形，管理费已少得多。其他对于旅客怎样服务才能周到，对于貨物怎样赶运才不致使顧主失去时机，都經過精心研究，找到了較好的办法。同时不但同大的进出口商直接联系，并多方拉攏報关行，給予回扣，代为兜攬貨运。另一方面，民生同川帮聚兴誠銀行、川康銀行拉攏关系，并多方利用航务处职权，把持航运。例如涪陵、长寿划为民生專营的航綫，他輪不得染指；鄞

都、涪陵一帶特貨(鴉片)的運送也由民生獨占，運價特高。這樣，民生的基腳打穩了，競爭者在他的面前完全無能為力了。它逐年有了盈餘，企業不斷發展，到一九三五年已有輪船四十隻。一九三二年民生的航綫已由川江延伸到宜昌。一九三四年以後，开辟了四條短航、五條長航，計有渝合、渝涪、渝涪、涪鄧、渝叙、渝嘉、渝宜、渝申、宜申等。一九三五年客運已達四百零八萬人，貨運六萬噸左右。從一九二六年創立，到一九三五年，共獲利達一百五十多萬元。在長江中下游，上海、宜昌設有分公司，漢口、南京設有辦事處，長江全綫通航。可以說這是民生的少壯時期。

同外商輪船的一場鬥爭

民生船隻日多，力量日大，從川江內河延伸到長江下游，引起了壟斷長江航業的太古、怡和、日清等外國公司的仇視。英商太古首先實行放低貨運價格，企圖抵制並拖垮民生。由上海運到慶的棉紗，每包運費從幾十元逐步跌到八元，只等於每包裝運包到的人力工資。太古預料民生資本微薄，又只有這條航路，如果虧折兩年，必然停業倒閉。而外商輪船在中國的航綫，除長江以外，還有沿海一帶，以其他航綫的盈餘來貼補長江的虧折，也還綽有餘裕。等到民生被拖垮以後，將來全部壟斷，再來提高價格，利市十倍，不但以前賠的不一概收回，以後還可大賺其錢。這是帝國主義打擊中國民族資本的一套老辦法。

民生看到了帝國主義者這個陰謀，採用避實就虛的辦法，放低貨運，專抓客運，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諸如改良各等艙位的床鋪及衛生設備，訓練招待人員，對客人服務周到，態度和藹。因此大受顧客歡迎，客運猛增，收入也隨之大大增多。而外國輪船素來只

重視貨運，對於客運向不注意，也未將客票列為重要收入，除大餐間以外，其他幾種艙位，都是只取押金包與買辦茶房經營。不僅設備惡劣，尤其歧視中國乘客。所以大多數中國旅客，寧肯等待班期，搭乘民生輪船，求得精神愉快。又外國輪船的經理、船主、大副、大車、會計等，向來是用他們本國人充任，工資很高，往往三、四個人的工資，就相當於民生全船一百余人的全部工資。由於這些原因，民生經受兩年的抵制，不但沒有虧折，而且還有盈餘，添購了新船。

後來太古覺得放價不能拖垮民生，轉而與民生攜手合作，共同協議貨運價格，並在長江、川江特別尊重民生的意見。怡和、亞細亞等公司，也將他們認為構造不良，効用過時的船隻，個別交與民生。民生加以分別改造利用，船壳改為圓船，機器另造新船，不僅增加自己的力量，也減弱了外商的競爭。這一場鬥爭，外商公司失敗了。

民生與外商輪船公司作鬥爭，先後都能取得勝利，尚有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由於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無理挑釁和凌辱，激起了各地人民反帝愛國的運動高潮。在較長時期中，不僅抵制外國貨，同時也抵制外國船。一九二六年九月英商太古輪，在萬縣撞沉木船數隻，淹死乘客、沉沒貨物。駐軍蔣肇初太古商輪扣留，要求賠償。英帝國主義調重慶、宜昌兵艦兩隻，五日炮轟萬縣，死傷居民二千余人，損失財產無數，繁華街市，變成瓦礫。全國人心憤怒，反英運動異常激烈。當時四川各地凡受英人雇用者都自行離開。客貨自然更不搭英輪，凡英輪載貨到川境碼頭，工人堅決不為起卸貨物，原船原貨開回。反帝愛國思想的深入人心，和人民力量的支持，是民生在長時期與外商公司鬥爭最有利的條件。

联系軍閥，靠近“中央”

民生是在四川防区时代发展成长起来的。它的輪船航行的碼頭，属于不同的軍閥防区。如果各防区軍隊加以骚扰破坏，不只是損失問題，根本就无法航行。例如合川属于邓錫侯部的陈书农，重庆属于刘湘，万县属于楊森，涪陵属于郭汝栋，叙、泸属于刘文輝。为了求得消极不加妨碍，积极稍加维护，卢作孚对各軍閥都极力周旋，并标榜个人服务社会事业，不参予軍事政治。各軍閥对他也不怀疑，乐于相助。卢作孚同地方軍閥搞好了关系以后，又进而靠近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作过四川省建設厅厅长，中央粮食局局长，交通部次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商日清公司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抵制。这对民生和卢作孚个人都极有利。不但江浙金融资本家张嘉璈、陈光甫、錢永銘等对卢重視，进步人士如黃炎培、杜重远等也都认为他是一个突于苦干的新兴企业家。随着民生事业的发展，他也成了社会上的一位名流。他在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也就是这样得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他突了不少气力，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面利用他，一面对他还是歧视。一九四四年，鋼板价格涨到战前的三千零一十倍，柴油三百倍，煤一百六十倍。装运军队和政府物资的运价，却压得很低。燃料是統制的，民生能得到的官价燃料不到一半，其余都是求諸黑市。“船打兵差”(川語用船运兵)約占业务百分之六十，而運費只及商价五分之一。民生真是有苦无处訴，从此亏累下去。官僚資本不容民族資本发展。同时排斥地方資本，这是最好的說明。

此外，民生在本身业务相当巩固的基础上，利用地方和“中央”各个方面关系，还尽量投資于有关事业。計有民生机器厂、恆順机

器厂、渝鑫钢铁厂、上海大中华机器造船厂、天府煤矿、北川铁路、大明印染厂、民安保险公司、三峡染织厂、华通物产公司等等。特别是在北碚建立了一所西部科学院和兼善中学。这些事业都是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卢作孚与一般普通商人有所不同，那就是他能着眼到科学、文化、教育各个方面，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

引起官僚资本的垂涎

民生的企业是逐年扩大，资本也是逐年逐月地增加。最初，大部分的股东是合川的地主，接着逐渐有和卢作孚相熟识的军阀、官僚、政客陆续入股，有些军阀是在他们的轮船被合并时转作股东的。后因业务关系，与重庆商帮往来频繁，就有一些商人陆续入股。公司上中层的职工也有不少人被鼓动拉拢，相继入股的。股本从来没有定额，月月都可加入。按照加入的月分，分配每年度应得的股息。在满足一百万元银币股额时，曾发行过一百万元的公司债，由金城、美丰、聚兴诚、川康、和成等银行募足。这次公司债的发行是由于张嘉璈的策划和支持。金城银行买的最多，成为民生私股股本中最大的一户。因此金城对民生贷款额很大，条件也比其他银行优惠。一九三九年，民生最后一次增加新股，定额是七百万银币。民生积累资本的手法与其他资本家并无二致。不过它更来得巧妙，在剩余价值中转入公积帐，每年提船舶保险费十分之一，折旧费十分之一，特别准备金百分之十到三十。另外物产部借口业务的需要，还大量囤积物资。重庆税局长孙邦治因民生巧立名目，积累资金，影响税收，曾提出反对。经过反复的说明和疏解，事情才了。

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通货就开始膨胀。民生最后一

次增股时，孔、宋都想予以控制。宋在香港派胡筠庄飞重庆，极力主张由中国銀行以鉅額现款，投入民生作股。孔在重庆也极力主张由中央信託局加入鉅額股本。张羣曾向孔說，他本人是小股本，不担任董事，免得引起别人误会中央要插手地方企业。这是給孔的一个暗示。孔宋双方相持不下，后来才由交通銀行董事长錢永銘居間調处，只由中国、交通两行投資入股，数目相等，而总额又不超过民生原股之半。理由是中交两行均有商股，对民生投資，当不致被认为是官股而变更民生是商营的性質。两行股本总额不超过原股半数，又免得影响民生原有組織。自此以后，除按通貨膨漲情形作过升值調整外，就不再增加新股了。孔宋两人想控制民生的計劃未能得手，在表面上虽忍耐过去，但心仍不甘，有机会就要报复。孔扯破面皮，硬要收买民生的办公樓，扩充中央銀行門面。曾以不支付民生应領的公差等費来作要挟，終于被他強迫买去。宋伪装好人，口头說在大借款内可发給一笔款項买船，实际上先在民生向加拿大借款担保案上，恶意拖延廿余月，不办担保手續，使民生遭受加拿大物价上漲影响，損失三百万美金。并且至今尚有七只新輪在广东沿海行駛，而不能通过台湾海峡，开来长江，以致減低了民生輪船在川江行駛的效能。这說明，官僚資本对民族資本的压迫，是无孔不入，无恶不作的。

向加拿大借款造船的曲折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由南京迁都重庆，各部門的物資器材，紛紛由长江下游运往四川；内迁工厂，也有不少の机器设备运到后方。这对民生來說，是有利的机会。卢作孚曾亲往汉口，拟具兵工器材和政府机关迁往四川的运输計劃，得到蔣介石

的批准。民生全部船舶都投入到这一运输，运费仅及外商轮船的十分之一。卢又亲到宜昌督运，到一九三九年运入器材达十六万吨，部队四十五万人。民生乘此时机添购小轮七十余只，壮大实力。航线虽然缩短，但是招商、三北大型轮船，不能行驶川江，只好让民生独占。不过受了战争的严重威胁，轮船连年被敌机炸毁，自己触礁沉没，以及运军用品爆炸等的损失很多，而又无法恢复，只能在重庆制造木壳小轮，略资补充。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知道当时民生的情形，从生意经出发，建议由加拿大借一千二百万元加币（略与美金相等）与民生公司，作为在加拿大造船之用。计划在抗日胜利后，由海道开至上海，以适应上海、重庆间水运的需要。办法是由民生出具期票交加拿大银行，一次贴现，作民生支付造船之用。民生只付百分之十五的外汇现款，其余百分之八十五全系借款，年息三厘。从船只到达中国开始营业时起，分十年归还本息。加拿大政府对加拿大银行负担责任。经过欧德伦的介绍，卢作孚利用到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的机会，转加拿大签定条约。那时宋子文在纽约，卢接着也到纽约，请宋担保。宋仅答应候他的大借款告成就拨发民生借款。事实是宋不愿有他人能向外国商人借款。蒋介石听说卢作孚向加拿大借款成功，曾一度由电话约卢谈话，说明经过，即命另具书面到行政院。在行政院会议上，根据民生书面请求，蒋即说应予批准。秘书长张厉生即席申明，民生申请是两件事，一是借款担保；一是要官价外汇二百方，照当时黑市约差法币十六亿；如果批准，其他民营企业援例，如何应付。蒋听了连说哦哦，最后仍说只办担保部分。事后蒋再约卢作孚谈话，告以请如此巨额外汇有困难，是不是由政府投资十六亿。当时倒把卢作孚大吓一跳，只好委婉地说，这样办，民生当然

感激欢迎。但是对加拿大借款有影响。因为民生与加拿大商量的时候，曾經申明无官股，现在忽然有了官股，而且官股很大，惹起外人怀疑，可能不利进行。蔣听了說哦后，跟即說那就不必了。后来这二百万加币，民生是在黑市购来交付的。蔣只同意通过担保，张厉生电宋請示，又被擱置。最后拖到宋子文向加拿大商量借款时，加拿大政府对宋提出，先完成民生所签章約的担保手續，再商談宋的另一笔借款，宋才被迫依照加拿大意見由政府为民生担保。但历时二十余月，加拿大物价上涨百分之十五，而借款总額如故，只能建造九只輪船，比原計劃減少了三只，民生所受損失約三百万元加币。加拿大貸出这笔借款，实际是为它的資金找出路，并推銷器材，从而获取利潤，同时也可以增加工人就业的机会，借此緩和他們国内的階級斗争。

在加拿大造船期内，民生发现美造柴油机的优点，卢作孚主张在美国购买柴油机。加拿大商人极力反对，說是不合借款用意。后来卢作孚提出理由三点：(一)购价低，(二)体質輕，加造柴油机重量为三十吨，占三百吨的船十分之一，长期营业，損失太大；(三)零件在美国是大量生产，随时能买，在加拿大要特制，緩不济急。加拿大政府打了一下算盘，要民生能賺錢，才有希望还本，这才劝告本国厂商同意卢的主张。

民生做这笔买卖，还发生了一个波折。加拿大船厂把物价估計錯了，他們看的是老皇历，以为象第一次大战后一样，物价要跌，得到价款不随时购买原料，以致不能按期交船。船厂約卢作孚去加拿大商談，卢根据合同力爭，加拿大政府从中調停，卢答应无论物价如何变动，只能以借款余額補貼，不能再向中国政府另請外匯，并且要加拿大政府担保交船。加拿大政府在道理上說不过去，

同时想得以后还要同中国资本家做买卖，不得不讲一点信用，才同意了。抗战胜利后，宋子文曾令救济总署拨一批登陆艇交民生经营管理。解放战争时，民生仍为国民党政府服务，从事军运。卢作孚不断向政府借款，预支运费，要求官价外汇，利用美金储蓄券，吸收美金和黄金到美，加购买剩余物资，如登陆艇、驳船、钢板、五金器材和海轮设备开辟沿海和近海航线。当时国民党招商局曾想尽办法阻碍民生的发展。但卢始终坚持奋斗，并同美国钢铁公司拉上关系，为美轮办理联运和代理业务。卢又一度同美国新兴资本家凯沙尔协议合伙在中国开办造船厂，合同蒋委员长签字时，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凯沙尔变卦中止了。

走向新生的光明大道

抗战胜利后，民生曾又一度繁荣，不过这是一种虚假的现象。这时民生恢复了下游航运，从国民党政府手里得到了五只登陆艇，又买进了两只旧海船，场面又大起来了。但是民生的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已被削弱，收支极不平衡，只有寅支卯粮过日子。股东的股息已经长时期没有发过。公司内部为了应付环境，各方面的人，不论好歹，兼收并蓄，于是机构臃肿，贪污腐化，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经济状况愈形恶劣，对职工的剥削也愈残酷。再加上反动政府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的飞腾，职工的生活也就越来越苦。工人弟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罢工浪潮不断兴起。民生曾勾结反动统治采用无情镇压手段，如民生机器厂的解雇，就是一件铁的事实。这个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中了。

民生的初期，是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应当承认比当时的封

趣买办资本是要高明一点。但是到了全国解放以后，社会性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新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民生因机构庞大，财务混乱，特务从中破坏，海员事故多，在未公私合营前，负债达到旧人民币一千三百多亿，每日亏折到一亿四千万元，可以说已濒于破产的地步。

卢作孚死了以后，民生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生产关系有了改变。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民主改革，技术革新，全体职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克服了过去所不能克服的困难，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奇迹。如在枯水季节，改行崆岭险滩的碛口；利用月色增加夜航，沿江安设航标；学习苏联推行一行式的拖带和顶推法的经验；改进港湾作业，缩短航行时间，增加吨位运量，多样节省燃料等等。一九五六年以后，整个长江航业都欢欣鼓舞地接受了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民生在长江航务局统一领导下，职工群众发挥了高度积极性，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进一步改进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大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从而国家所给的任务，历年都是超额完成。还曾几度降低运价，出现一片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我在过去，同民生公司曾有较长时期的历史关系，因此也感到特别兴奋。但我对民生公司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希望熟悉情况者，再进一步加以补充，如有舛错地方亦希望纠正，以便民生公司的史料更加全面和翔实。

关于西山會議派的一鱗半爪

周 一 志

前 言

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是首先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的反革命派系，可以说是一个极右的政治集团。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后，凡是提到邹鲁、謝持或者说某人是西山派，那是最臭的名词。后来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反共，汪精卫也跟着反共；经过若干年时势的演变，尤其是到了重庆时期，西山派的林森、张继、邹鲁、居正、覃振等人反都成为国民党内元老阶层的人物了。一九二五年秋，北京成立了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那时我是大学生，被朋友拉去开筹备会，竟成为“积极分子”。到了十一月，西山会议（即林森等召集的中央委员会）在北京碧云寺揭幕时，我也到会场摇旗呐喊。除了广东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另成系统外，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孙文主义学会同西山派人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西山派的邹鲁、謝持以及邓泽如、伍朝枢等人，当初在中山先生身边反对三大政策的详情，我不十分清楚。不过从西山会议开会以后，这派人的一些反动的政治活动，我知道得不少。因此用一鳞半爪为题，写成此文。

自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决定了革命的三大政策之后，当时国民党许多老干部以及带兵的人，根本反对中山先生这种伟大的划时代决策。但中山先生毅然决然地在三大政策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许多人同中山先生争辩不休。最后中山先生对这些人说，“你们再不听，我就开除你们。要不然，你们就开除我好了。”^①这可见当时国民党内阻力之大和中山先生意志之坚决。我听说当时反对最力者是邓泽如、谢持、林森等人，邹鲁、居正、伍朝枢、吴铁城等人也是反对的。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山先生亲自主持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会。次日他在追悼列宁的大会上痛切陈词，赞扬列宁的伟大及中国革命必须以俄为师的道理，要求党员一定要服从他的决定。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因实行三大政策之故，中国革命形势真是一日千里，突飞猛进，造成全国人民欢迎并支援北伐的基础。

国民党内分子复杂。代表封建意识和地主阶级的一些党人，如何能长期接受革命的三大政策呢？这些分子为数不少，他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当然会“物以类聚”，集合起来在党内进行各种反动活动的。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案。那时中山先生尚在，已无法制止这类党员的蠢动。但中山先生曾亲笔批示，对这些监委谆谆告诫，要他们遵守党纪。一九二五年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八月二十日，拥

^① 故林伯渠副委员长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孙中山九十诞辰纪念会”上，曾作关于这个事实的叙述。

护三大政策最力的廖仲愷先生在广州被反动派暗杀。(我在三十多年来,曾向许多人询问此案的内幕,不久也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写出来。)从此国民党的“掌舵室”,就根本发生问题了。廖案一起,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召开联席紧急会议,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胡汉民因与此案有关,逃到黄埔蒋介石那里,求其庇护。二十五日广东国民政府下令拘捕梁鸿楷等人,反廖的伍朝枢等人就逃赴香港了。九月二日,蒋介石又驱逐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出境。党内出头露面的右派分子就更无法在粤立足。邹鲁借组织“国民外交代表团”为名离开,此团由林森任团长,邹是实际主持人。当时汪精卫、蒋介石是党内假左派;汪、胡两人从此交恶。蒋在他们中间又加重些挑拨手段,使他们成为水火不相容的政敌。邹鲁、许崇智等人当然不甘心,乃酝酿反动的政治阴谋。

在确立三大政策时,所谓太子派的首脑孙科也是不赞成的。伍朝枢、吴铁城等人是围绕孙的人。他们在广州有一个俱乐部叫“南堤小憩”。这批人过着金迷纸醉的生活,如何能接受学习苏联艰苦革命的那一套呢?后来伍朝枢一逃,邹鲁等在广州站不住,孙科也到了上海。由孙拿出一笔钱组织一个秘密策动团体,叫做“国民委员会”;同时在北京、上海、南京拉拢青年,组织公开的孙文主义学会,作为“反共”的工具。北京“国民委员会”由右派的“民治主义同志会”主干分子傅汝霖、姜绍謨、王昆仑、陈兆彬等人负责。上海的“国民委员会”由黄季陆等人负责。这些组织的成立是西山会议的前奏,因此孙科可算是西山会议的原始发起人。邹鲁也在海外华侨方面,以“国民党将亡于共产党”的危言耸听之词,捐募了些钱,积极筹备“反共”的会议。

到了十一月間，酝酿成熟。一届中委邹鲁、謝持、林森、张繼、居正、覃振、戴季陶、叶楚傖、邵元冲、茅祖权、石瑛、傅汝霖、沈定一、张知本、石青阳等人到了北京，在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开除党内的共产党籍中委，指责苏联顾问鲍罗廷专权。于是西山会议派这个名词便从此叫开了。我记得开会那一天，是由林森作主席，邹鲁、覃振、沈定一等，一个一个地演说，都是“激昂慷慨”，反动的气焰很高。西山派把共产党中委开除以后，就说到会的过了半数已足法定人数，开会合法的。广州方面，却说他们违反党纪，不在革命政府所在地开中央全会，完全非法；把参加西山会议的人有的开除党籍，有的书面警告。在当时，这是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西山会议背叛中山先生手定的三大政策，是反动的。西山会议的宣言及决议案大半出自沈定一之手。此人能说能写，当时对于我们一批右派青年颇具吸引力。西山派在北京南花园一号成立党部，同拥护广州中央的翠花胡同八号的党部，一“左”一右，对立起来。邹鲁、林森等人在开会后一心想推翻广州的革命政府，密令广州公安局局长兼师长吴铁城相机行动，驱逐汪精卫、蒋介石等“左派”，企图由他们回去主持党政。他们密议的地方是竹竿巷林森等人的住所。当时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人，也有意通过原为国民党员的执政府司法总长杨庶堪的关系，拉拢西山派这批人，阴谋捧段及进一步拆国民党的台。可是邹鲁等一心想着广东地盘，无意走杨庶堪投段的路子。

广州方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出自汪精卫手笔，内容非常之“左”。三月间，西山派在上海法租界“建国学校”也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一切，仍是多半由沈定一写的。法国租界当局因西山派是“反共”的，

沒有加以任何阻撓。這就是所謂國民黨上海中央。

西山會議時還有一個插曲：國民黨內還有一部分極右派，以馮自由、馬素為首，學生中有江偉藩、王文彬等人。他們在西山會議前，竟說黨內有些共產黨要在碧雲寺開會，對黨不利，於是雇了幾個流氓把戴季陶綁去了。戴向他們哭訴，說他此來是為了如何如何地“反共”，才被釋放。經此一下，戴問邵元沖不等開會，就回上海去了。

二

在西山會議開會以前兩個月光景，北京、上海、南京各地的右派青年，看到廣州黃埔軍校有孫文主義學會的組織，加上鄒魯、謝持等人也策動各地成立此會，以便同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內左派青年作鬥爭，因此各地孫文主義學會紛紛成立。它的產生及其經濟來源和政治方向，是同西山會議分不開的。先有各地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發宣言、叫口號、辦刊物，作為西山會議“反共”的前奏，所以西山會議開會前後，也顯得有青年有羣眾的擁護。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廣州發生了中山觀案，這是蔣介石進行“反共”陰謀的開始。汪精衛因此“消極”，不久離開廣州。五月間，蔣把“老朽昏庸”^①的張靜江抬上了中政會主席之職，通過一個所謂限制共產黨活動案。西山派人們看到革命策源地如此情形，“一葉知秋”，認為吾道不孤，心中十分高興。我們這些右派青年，也跟著他們表示“愉快”。

① “老朽昏庸”是當時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罵廣州的張靜江、鄧澤如等人所用的形容詞。至於鄒魯、謝持等，他們是反革命，還不在此詞的範圍之內。

戴季陶同蒋介石当初是同嫖同赌的密友，蒋叫戴暂时不必同西山派混在一起。先是由蒋给戴一笔钱，戴写了《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反动理论的小册子，在上海居然设立“季陶办事处”。蒋培养戴成为反共理论专家，以便日后御用。孙文主义学会青年们，当时被这两本小册子麻醉的太多了。可以这样说：戴的反动理论虽非唯一的“权威”，但它的坏影响的确不小。汪精卫、蒋介石看出孙科虽然自己不出面，但在经济上支持邹、谢等人，对他大不放心，叫吴铁城（当时的太子派）到上海把孙拉回广东，作建设厅长，以后又作交通部长。蒋在另一方面派人拉张继，又公开致张一封长信，信中还是扮演“左”的样子。张继也就以蒋的态度为转移，同西山派无形中冷淡了一时。叶楚傖是上海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的主干之一，经蒋拉拢，便同西山派脱离关系。邵元冲回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教务方面工作。西山派在开会之后，邹鲁等人回到上海，主要的原因是上海离广州近，便于进行种种阴谋。北京的南花园党部由林森一个人看家，有一个时期穷得要命，不久也去上海。

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大杀共产党，背叛三大政策。西山派人们认为他们的主张实现了。蒋先嚇使监察委员吴稚晖、李石曾等公开反共，而他扮演着好像是根据监委的提案他才出来“救党”。胡汉民立即随蒋到南京，组织南京的国民政府，同武汉的汪精卫、邓演达们对立起来。这个时候，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就走运了。因为当时陈立夫还是总司令部一个机要科长，尚无CC系；蒋、胡等为了反共，只能利用孙文主义学会的这批反共青

年。我記得那時滬寧路火車上，只看見一些“孫會”的人，多半穿著軍衣（因在各軍政治部工作），十分活躍。西山派老頭們也知道他們不久就會出頭。胡漢民對王昆侖^①、鍾天心等人，頗加拉攏，我們也就成為擁胡分子。各省省黨部“清黨委員”，由“孫會”分子們擔任的很多。

五月二十一日，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六月，武漢政府中反革命勢力抬頭，夏斗寅等蠢蠢欲動。七月十五日，汪精衛等也決議同共產黨分裂。至此國民黨全黨背叛了三大政策。（只有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等很少數人例外。）武漢既然繼南京之後實行分共；漢寧雙方也就沒有繼續對立的理由了。這個時候，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聯絡好何應欽，以團結漢方同志為理由，逼蔣下野^②，蔣只得暫時走開。蔣一走，胡漢民、吳稚暉等發表聲明，說從此“一了百了”，也跑到上海。接着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在龍潭打敗了孫傳芳，成了南京方面的主角。可是黨務卻落到西山會議派的手上。

當初中山先生北上時，胡漢民系代理大元帥。一九二五年七月廣州成立國民政府，竟由汪精衛出任主席。原因是胡不擁護三大政策，廖仲愷先生堅決擁護和執行三大政策，汪的態度介乎廖、

① 王昆侖時任總政治部秘書長。蔣介石、馮玉祥一九二七年在徐州第一次見面舉行的徐州會議，胡漢民、吳稚暉等都隨蔣前往。在歡迎南北兩總司令的民眾大會上，由王昆侖先致詞。

② 蔣下野時，我們不以為然。王昆侖同黃埔一期生潘佑強趁奉化見蔣，以大道理向蔣進言，蔣完全聽不進去。我們從此對蔣失望。後來看他製造“一一二二”慘案，看清楚此人太陰毒了，從此我們在心理上總覺得非反對他才過癮。西安事變發生時，我們興高采烈。何應欽的作法，想叫蔣速死，當時我們贊成。

胡的中間；廖就贊成汪出任主席。此外，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是實力派，捧汪而不捧胡；許的意見也有影響，所以汪才能上台。武漢反共後，西山派推出許崇智，以和汪是老友的關係同汪接洽；汪立即答應由武漢的黨中央、南京的黨中央，以及上海的山西派黨中央^①三方面合作，共同組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委員會。此時南京方面胡漢民是主要後台，出面者是張靜江、吳稚暉等人。他們看到汪都承認西山派出頭，胡同鄒、謝等本為老友，到此時還有什麼話說，於是三方面合作局面就告成功。在汪初意本想同西山派密切合作以對付寧方，不料寧方立即將計就計，更極為拉攏西山派以抵制汪。因此，特別委員會的黨務實權，竟由寧方在會議上力推西山派人多負責任，汪在會場上無法反對，只得承認。我記得鄒魯是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謝持是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昆仑是組織委員兼主任秘書。覃振、傅汝霖都在黨務方面占有地位。汪發覺上了大當，立即回武漢，組織政治分會，攻擊特別委員會的組織違反黨章。大家都罵汪真是一個狐狸精，變得未免太快了。實力派的桂系，一腦子地方封建主義，同“反共”的山西派人們本來沒有什麼淵源，此時他們也一拍即合。後來西山派同桂系人們來往頗密，政治上呼應不少。桂系的胡宗鐸、陶鈞在湖北得勢時，殺了詹大悲、李漢俊及無數革命青年。胡、陶也有“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走一個”的狠毒表示。西山派的張知本，被他們抬為湖北省主席。

西山派得勢的南京國民黨特別委員會，從這年九月起，到十一

^① 當時寧漢兩個國民政府對立，時人有上聯曰：“一個黨，兩政府，三黨部，四分五裂。”無人對出下聯。

月垮台。蔣在下野后，曾去日本同田中又一等勾結一番。蔣又通过宋子文拉汪，說特別委员会背景是胡汉民，應該由蔣、汪合作，恢复二届中央党統，才能推翻特別委员会。汪因唐生智被桂系打败，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軍事也失败，走头无路，只得回头捧蔣。他們暗中布置妥當，蔣乃叫南京党务学校的谷正綱等发动学生和羣众大貼标語，游行示威。标語是“打倒非法的特別委员会，打倒腐化分子邹魯、謝持，打倒西山會議派，打倒潘宜之(桂系分子)”等等。軍警竟根据蔣的密令，对遊行羣众开枪，硬制造一个“一一二二”(十一月二十二日)惨案。当时桂系主力軍队已經打败唐生智占领了湖北，賀貴严帶領第四十軍第二師开到南京，采取了拥蔣抑桂的措施。^①蔣对黄埔学生是有办法控制的，他在特別委员会垮台后，即赴宁复总司令职，夺去何应欽的兵权，任之为參謀长。西山派人們这时被指为“一一二二”惨案的凶手^②，还組織特別法庭要审訊他們。于是邹、謝等人又回到上海做寓公，静候并另找政治上的出路。胡汉民看到蔣、汪暗中合作之势已成，乃約同孙科、伍朝樞一同赴欧洲考察政治。

四

蔣介石复职后，由于汪派捧他，开成了二届四中全會，推譚延闓为国民政府主席。张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不愿意蔣、汪合作，想法破坏。吳稚暉說蔣同宋子文是至亲，而宋同汪一貫有关系，觉

^① 參閱女特第九輯《蔣介石背叛革命后下台又上台》一一七頁。

^② 后来桂系的潘宜之代表李、白到宁見蔣，提出惨案事，蔣即轻松地回答說：“那个惨案是我当时政治上一个运用，现在事过境迁，不必介意”云云。

得頗難設法。李石曾說“只有把展堂(胡漢民的號)拉來那就行了”。李即赴歐見胡，胡以倡議五院制入寧捧蔣。一九二九年三月，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部分代表是指派的，汪派及許多人都反對，胡漢民卻堅持。這給陳果夫、陳立夫弟兄造了絕大機會，CC系從此在中委中得到多數。會上決議把汪精衛、陳公博、甘乃光、顧孟余等分別開除黨籍或警告(因廣州張黃事變一案)。胡主持大會十分得意，以為蔣、汪不能再合作了。西山派人們更不用說，因是慘案凶手，案尚未了，沒有人當選為中委。於是汪派和西山派恨蔣也恨胡，他們乃合流反蔣。

一九三〇年春，閻錫山看蔣打敗了桂系、唐生智及馮玉祥，知道要輪到他頭上了，乃把被誘到晉祠的馮玉祥放出來，決定武力討蔣。事先叫趙丕廉同汪派及西山派人們周旋，成為兩派的好友。擴大會議的召集，趙丕廉起的作用不小。桂系的李、白也在廣西與閻、馮呼應。從五月起，蔣軍與閻、馮軍在河南開始作戰，即所謂中原大戰。七月間，汪精衛到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開張，西山派又活躍起來了。擴大會議在黨部方面採取“公平的分贓制”，比方中央組織委員會兩個秘書，四個科長，由汪派及西山派各占一秘書，兩科長。各省省黨部也是如此，“頗為公允”。^①汪精衛、陳公博等同鄒魯、謝持、覃振等，當初是一“左”一右，至此竟成為莫逆之交了。

中原大戰時，張學良舉足輕重，大走紅運。蔣及閻、馮等雙方都派代表赴沈陽，爭取張學良作副司令。閻的一個代表就是西山

^① 擴大會議時我在日本，覃振、鄒魯等內定我做組織委員會秘書(改組派為谷正綱)。我如果在上海，一定會去北京。我回國時，擴大會議已要垮台了。

派的覃振^①。九月中，张学良通电双方罢兵，接着东北军入关，扩大会議失败^②，閻部退回山西老巢。閻不久下野去大連，馮后来上泰山，汪本人又到海外。西山派和汪的改組派人們暂时在天津日本租界閑住。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蔣扣留胡汉民于湯山，于是汪派同西山派反蔣的机会又到。五月，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會議。因汪精卫及孙科的坚持，凡是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委，只要来反蔣，一律都是非常會議当然委員。西山派人們因都是一届中委，又都出头了。以后因九一八事变，宁、粤双方举行和平會議^③，虽仍各自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但議定了一、二、三各届委員都是中委的原则。CC系那时也就无法包办党务了。

一九三二年，蔣、汪又合作，汪为行政院长，西山派居正由司法院副院长(院长伍朝枢在香港死去)升为院长。汪同居都是走亲日外交路綫的人，来往甚密。汪在反共后，以“反共有先后，反蔣有迟早”为口号，表示他和誰都是朋友，不象胡汉民那样狭隘。张羣、楊永泰、熊式輝的新政学系在蔣身边得势起来，汪同他們也勾結很深。CC系为了打击新政学系，只有拉胡之一法。他們先拉西山派的謝持到南京，再由謝去拉邹魯，并尊謝、邹当元老。邹本为最反蔣之

- ① 蔣派张羣、吳鉄城到东北拉张学良，用錢一萬千金，滿不在乎。张身边的人大多脫南京代表大方。閻錫山、馮玉祥派覃振、薛篤弼为代表拉张，据說兩人路費只千元，蔣方代表之闊，他們之穷，有天淵之别。
- ② 当时上海某画报把蔣、馮、张、閻四人画在一張漫画上，頗有意思。蔣是一只手枪，一只手錢。馮是一只手大刀，一只手窩窩头。张是一只手拉住女人，一只手大烟枪。閻是拿着大算盘在打算盘。
- ③ 国民党在几年中，开了各种名詞的会，因此有“‘特別’‘扩大’；‘非常’‘和平’”的对子。

人，由于CC尊之为元老，蒋对他也表示一些好感，邹态度渐渐软化。最后由邹鲁、居正、张继等替CC系拉胡回宁，胡本已心动，后因脑溢血死去①。

五

在写出就个人所知道的有关西山派的一些政治活动之后，再把这派比较重要的人物的生平，就了解的最突出部分，逐一简略地写在下面。

邹鲁：广东人，同盟会员，旧国会议员。追随中山先生在广东革命，收罗各色人等为部下。任广东盐运使时，因他的老婆抓到钱就不放，邹竟串通部下把她暗杀。广西军阀刘震寰归顺国民党，是邹拉拢的。邹后来作广东师范校长（后改中山大学），中山先生作三民主义的讲演，即在此校。西山会议的发起，邹是最重要的一分子。他同胡汉民私交很好。胡由佛山回到广东，组织新国民党，邹同刘芦隐是两个大将。胡死以后，邹以CC系的拉拢依附蒋介石，任中央常委。大陆解放后，邹由广东到台湾，不久死去。

谢持：四川人，同盟会员，旧国会议员。曾任中山先生的秘书长。北京右派青年组织的“民治主义同志会”同国民党发生关系，是谢和邹鲁介绍的。北京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与组成，即由民治主义同志会的人在背后主持。当时，我曾代表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南下，想策动开全国孙文主义学会代表大会。我同谢的接触颇多，

① 胡汉民死后，南京拉邹鲁当教育部长，邹有允意，但以仍兼广州中山大学校长为条件（因中大范围颇大，不愿放弃）。因鱼及熊掌难两得，没有实现。最后邹毕竟对蒋妥协，同CC系在许多事情上打成了一片。

觉得他对人甚亲切。谢在参加扩大会议后，因身体衰弱住在上海，没有赴广州参加非常会议。后来被CC系在上海的大将吴醒亚、吴开先等拉去南京，尊为元老。目的在叫谢拉回邹鲁，再由邹拉胡汉民以抵制杨永泰等新政学系，并且拆西南割据之台。但谢不久即因病重而死。

居正：湖北人，同盟会员，同日本人关系最深。在中华革命党时，居是健者。西山派中，邹鲁、居正是政治慾最强的人；比较起来，邹还不及居。倒袁世凯时，居到山东胶州湾一带任民军司令，蒋介石是其部下。西山派失败时期，上海《江南晚报》始终苦撑下去，完全靠居。白崇禧从北方逃往广西，搭日本船，被蒋方偵知，命令吴淞要塞司令部下于该船进口时把白抓住。居为救白，托日本领事密电该船暂时不进吴淞，适有另一日船由沪赴日，白即在公海改搭另船转道南回。因此桂系一贯对居有好感。居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及蒋尊霖騙到司令部扣留。居被押到南京，居的老婆见蒋介石，蒋要居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的老婆对蒋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后来居改禁在南京“周必由巷”一所房中，我曾去看他。他虽被囚，仍不断写私信叫人如何反蒋。宁、粤和谈时，居也被释放。九一八后，犬养毅企图解决东北问题，方案大体是东北宗主权仍属中国，但不驻兵，只设保安队。此事通过居乎秘密进行，居竟跃跃欲试，想去东北当保安总司令。后来居在宁任司法院长，CC系尊之为元老，想由居等人拉胡汉民回宁。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以及抗战后逃离重庆前，一贯同居交情特殊，因两人都想走亲日路线。一九四九年，何应钦的行政院长垮台，代总统李宗仁及白崇禧拉居为行政院长，在立法院以一票之差未得通过，改由CC系所抬的閻錫山繼何。居到台湾后，

同香港的許崇智常通信，許曾一度搞反動的“第三條路綫”，因此蔣對居很不放心。某一天，居忽在夜間中風而死。

覃振：湖南人，和宋教仁是同鄉，又是親戚，舊國會議員。覃雖然比我們大二十多歲，但同我們當時一批年輕人最合得攬，可謂忘年之交。他富於正義感，有愛國心，沒有虛假。辛亥革命前曾在家鄉鬧革命，被送桃源縣監獄坐牢三年。接受中山思想的影响很早，是民族革命時的健者。他是西山派主幹之一，但後來對西山派被CC系所捧而思想毫無進步的人（尤其是对居正），內心是不滿意的。國民黨寧、粵和談時，他率領我們力主文人大團結，拉汪、胡、孫合作對蔣。他最大缺點是生活太沒有規律。同盟會時代人物十有七八如此。他同我們坐咖啡館，談國民黨逸事滔滔不絕。任司法院副院長時，曾出洋考察司法。在重慶時，孫科有一個很短時間在政治上表現得很好，覃與孫頗多接觸。覃一貫尊重孫夫人，並受到他老友林伯渠同志的影響。在西山派老人中，覃是唯一的後來思想有些轉變的人。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翦伯贊等在長沙組織中蘇文化協會長沙分會，當時湖南省主席何鍵及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CC分子百般阻撓。為了掩護協會的工作，覃出面擔任中蘇文化協會長沙分會會長。由於他擔任會長，省當局對他不能不客氣一點，因此掩護了當時一批進步人士的抗日救國活動。有一次在重慶舉行的“中山學社”的年會上，覃對陳立夫極端反動的話，毫不客氣地加以駁斥；大家拼命地鼓掌，予陳難堪，弄得陳面紅耳赤。日本宣布投降後，毛主席到重慶，中蘇文化協會總會召開大會歡迎毛主席，覃當時已臨病在床，也扶病參加了歡迎會。他緊緊拉着毛主席的手，感動得流出了眼淚。一九四七年覃在上海病故，死後葬在長沙岳麓山，同黃興、蔡鐸的墳一起。

戴季陶：浙江人而在四川長大，同盟會員。在日本同蔣介石同煙共賭。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北上道經日本對眾講演時，戴任翻譯。清末本名戴天仇（與滿洲不共戴天之意），後來改名良弼。同蘇果夫、蔣介石在上海一起開交易所時，一心發財，想做陶朱公，又改名季陶。後來說中山先生是繼承周公文武孔子的聖人，他自己以賢人自居，所以又名傳賢。西山會談在政治行動方面，邵魯是主干人物，在反動理論方面，多半是戴負責的。前已說過，戴所寫的两本小冊子，為害青年不淺。當時羅秋白同志在《响導》及其他刊物上，對戴的反動右派理論大加批判。有一張漫畫很有意思，世界革命公園內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立象，戴硬把中山先生的立象從世界革命公園背往孔廟里去了。我們一批人在上海辦《再造旬刊》（前期），戴特寄八個字的題字來。（我記不清了，好象是一心革命，努力再造）。南京成立五院，他一直任考試院長。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黨員手冊》等反動文件，大都出自他的手筆。我在重慶時，才覺悟到戴是國民黨的大罪人。朱家驊拉鍾天心同我還有幾個人代表中央組織部視察學校黨務，戴特請我們吃飯（朱家驊是捧戴的）。他的書房正桌上，挂着觀世音菩薩象、中山先生象，和他的母親象，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我曾打比，假定蔣介石是俄國沙皇，戴就是妖僧拉斯布丁。一九四九年初，戴從南京逃到廣州，同于右任同住招待所，兩人夜間深談。于右任責備他，蔣的許多罪惡，他應負責任，因他同蔣是密友，可以無話不說，他對蔣不但不加規勸，反而助紂為惡，使蔣叛黨禍國之罪更大。戴因蔣幫大劫已去，繼陳布雷之後，于二月十二日吃安眠藥而死^①。

^① 戴季陶死後，精說有遺書。孫科當時是行政院長，听说戴死，立即趕到招待所，把遺書拿走，遞給在奉化的蔣介石。

林森：福建人，旧国會議員。清末在九江海关任高級職員。九江光复与林的努力有关。吳鉄城（吳家在卢山牯岭开一家“和昌”罐头店），从小就跟林学英文，后来林介绍吳加入国民党。辛亥革命，林任江西代表。南京临时参議会成立，林被推为議長。以后曾一度任福建省長（国民党軍許崇智在閩的时候）。林奉中山先生之命，常赴美州联络华侨。胡汉民任立法院長时，林为副院長。宁、粤和会时，由粤方提国府主席一职，应由“牟高德劭”者充任，林以此資格做了摆样子的“元首”共十二年之久。在南京时常去夫子庙一带买古玩，十元以上者不要。一九四三年八月，林在重庆因所坐的小汽車同大卡車相碰，受伤不治而死①。

張繼：河北人，同盟會會員，是一个好打手。同盟会在日本同保皇党是政敌，保皇党开会，常由張一馬当先，跳上台去把保皇党說話的人拉下台来。北京第一屆国会，張曾出任参議院議長②。他本为西山派积极分子，后被蔣拉了过去。南京特別委员会时期，張同西山派人們赴中山陵致敬，他又兴奋作詩，有“当年碧云寺，今日紫金山”之句。在南京方面，張繼是次于張（靜江）、吳、李、蔡一級的元老。CC系特別捧他，囑使他以老資格罵政学系。有一次，触怒了蔣介石，蔣在会場上公开申斥他一頓，他當場認錯才罢。重庆政府迁回

① 林森从重庆郊外“山洞”（地名）住宅乘小汽車进城，在路上被一軍用大卡車連車帶人撞伤。时人窃窃私議：很有可能因蔣夫如在一九四二年去印度訪問时，蔣不是国家元首的身份，印度根据英国习惯（时印度尚未独立）只得以元帅之礼，蔣夫如頗不滿意，所以蔣想做元首；又不好意思无故去林，故用此阴谋手段云云。

② 据国民党老人說，張繼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对中山先生說，袁世凱早晚必叛民国；如果他做了国会議長，就有資格容易見到袁，必要时可以对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为国除害。中山先生見其志可佳，乃叫党人投張繼的票，作了参議院議長。

南京的第二年，有一天，张因吃的太飽，兼受风寒，得急性病而死。张的老婆崔振华也是国民党員。崔曾对主管北京故宮的易培基（李石曾亲戚）大肆攻击，后来易被通緝。崔表面上好象發揮正义，其实因为易沒有滿足她的要求。

沈定一：浙江人，大地主出身。青年时在云南作县长，把家里的錢用去不少，当时云南人說他是一个怪物。曾一度加入共产党，又背叛出来，成为西山會議派主要分子。蒋介石奉中山先生命赴苏联考察，沈曾同行。王昆仑同我去过他家中（浙江蕭山衙前乡）。他能說能写，对右派青年的吸引力頗强。沈的政治野心很大。在他家乡衙前，他以大地主身份，有一套自治的方案，类似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对工人的那套办法，对农民施行二五減租，实际上是以小恩小惠来和緩革命。我曾对他有好感，对他那一套也有过憧憬之意。因此曾特去衙前考察了一番，还在上海《再造旬刊》上写《考察記》长文，对他的“自治方案”頗加贊揚。現在回头想来，知道是大錯而特錯了。在沈本意，想借他那一套邀將重視，求作浙江省主席。但蔣的反动本質連改良主义也是不容納的，陈果夫、陈立夫弟兄又非常嫉視他，他就无法施展。一九二八年夏，沈被陈果夫所派的人暗杀于衙前汽車站，这件事当然是得到蔣的默許的①。

邵元冲：浙江人。曾多年追求张默君，张提出邵非当博士或碩士以及少將以上的职銜才同他結婚。后来邵到美国留学得到碩士，中山先生可怜他，又給他一个少將，才遂了心愿。邵在杭州任市长，

① 沈定一死后不久，記得上海各报上曾刊載新聞一則，說蒋介石从奉化家乡坐汽車到衙前祭沈。后来我到衙前，问所有的人，都否认此事。可見蔣发布这项新聞，故意表示对沈关切，而叫人想不到祭沈是他同意的。

一做官就貪污，被人指出舞弊數萬元。他作的文章既長又臭，被人比為“王大娘裹腳布”。他在立法院任經濟委員會委員長時向蔣告密，說胡漢民背後有怨言。胡漢民之被扣，也與邵撓撓有關。蔣扣胡後看到風色不對，曾打了邵一個嘴巴。孫科任立法院長，邵為副院長，竟提出十人要孫同意提為立法委員。孫因此大發脾氣，連夜出京，表示不就立法院長了。後來蔣派多人疏通，孫才回來，并由林森以前任立法院副院長地位，在政治會議上說明副院長僅能在院長有“故”時，代理一下，此外一切應服從院長。邵既不辭職，也不到院，只拿薪水。覃振、鄒魯等人，都看不起邵。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同一批立法委員到廣西。因為想同李宗仁、白崇禧多談談，我單獨留桂林多住些時。那時邵也在桂林。廣西當局為他同我以及他的秘書習文德三人特別布置一次游歷，一同坐小船沿江而下，看桂林到陽朔的风景。李、白對他大概說了些私話，因此他特到西安見蔣，恰好碰上了西安事變。別人住在招待所平安無事，獨邵大為恐慌，跳窗出去，被士兵開槍打死。南京報紙說他“聞蔣委員長有難，特越窗赴救，政府待以國葬之禮”。

此外，我對許崇智另有一專文，對孫科也打算專寫，這里就不提及了。

我所知道的陈誠

杜 偉

我和陈誠自小同乡,又是老世交,并且有过互为部属的关系。在旧社会时,相知不可謂不深。后来虽然疏远些,但是回想过去,值得記述的故事还是不少的。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点点滴滴地写在下面,作为史料。

一 出身保定軍校,分发绍兴

陈誠,字辭修,浙江青田高市人,現年六十四岁,出生于地主家庭。父陈希文,前清秀才;叔父陈一鵬,前清貢生。希文依靠一鵬的力量,曾任青田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陈誠即在这个小学毕业。随后陈誠进入处州第十一师范;毕业后和該校同学吳子奇的妹妹結婚。接着拿了妻子的嫁妝費到杭州进体育学校,半年毕业,但想找一个小学教員的位置而不能如愿。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老朋友,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輩找不到出路,念他年紀还輕,便把他带往北京,保送投考保定軍官学校。由于学历条件不够,借用本家陈德的一处州中学毕业文凭,冒名頂替;又因考試成績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經我父亲向主試官魏宗翰(陸軍部軍学司司长)疏通,总算以备取的名义勉強入学。

一九二〇年陈誠在保定軍官学校毕业,分发浙江見习;我父写

信給我囑為照顧。那時，我在紹興任浙江陸軍第二師第三旅少校副官，便向師部聯系，派他到駐在紹興的第三旅第五團第三營當見習官。同時來的還有周至柔、周搏風、李進德等三人。半年後，陳誠即補了少尉排長缺^①。他向上爬的思想很濃，做了兩年沒有升級，便感到不耐煩，常來我家談心，表示親近。他口頭上說的無非是一些家常話：家中尚有一個姐姐，兩個弟弟，都要上學，家累很重……但總掩蓋不了他內心的苦悶和要求：在紹興當個少尉，前途很難發展，希望我幫助他另找出路。我總是勸他耐心等待，不要性急，並安慰他有機會就給他想办法。

二 隨鄧演達赴廣東參加革命

那時（一九二二年），恰巧鄧演達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來羅致保定軍校畢業同學赴廣東參加革命，我把這情況向陳誠介紹，並問他愿否跟鄧演達南下。他興奮地表示“很愿意去”，並說鄧曾在保定軍官學校作過他的區隊長，有師生關係。他向團部請假，沒有批准，他不顧軍紀的約束，徑自跑到上海隨同鄧演達赴廣東去了。當時，鄧在粵軍第一師任團長，派他為連長。在東江打陳炯明這一戰役中，陳誠受了輕傷，正在住院療養之際，忽接家裏來的電報，說他的父親病故，於是回籍奔喪。到家因傷未全愈，沒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的猜疑，認為他有外遇，憤而用剪刀刺喉自殺，發覺後立即送溫州醫院救治，未死。他在家寫信給我，告知家裏出了兩件不幸的事故，十分灰心，不想回廣東去。要我處（這時，我在寧波任警察廳長）工作，希望我給他安排一下。我一面匯一點錢幫

^① 陳誠任排長時的直屬連長是樊崧甫，樊愛稱陳為“小老弟”。

助他的治喪費用，又勸導他仍回廣東去。可是他不聽，跑到杭州請求夏超（省長）給他找一個警察界的位置，沒有被錄用，不得已也只好回廣東。

這時鄧演達已調到黃埔軍校，陳隨鄧到黃埔軍校，鄧初任訓練部副主任，派陳為上尉特別官佐（候差）。以後鄧調教育長；陳任第二期的炮兵隊區隊長。不久，陳又升任少校炮兵隊長、中校炮兵科長。他來信告知黃埔軍校辦得很好，邀我去參加工作，我去去。

三 北伐以後的升遷

一九二六年廣東出師北伐，他在二十一師嚴重師長部下當團長，周至柔為團參謀長。他帶部隊到杭州，我們相見甚為歡洽。他邀我同道出發前往蘇州。

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武漢“七一五”事變發生，鄧演達出國。嚴重也辭職，臨走時保舉陳誠升任師長。他認為自己擔任團長還不久，即升充師長，感到資歷太淺。好在全師所有營長以下軍官，都是黃埔學生，尚能和衷共事。他對嚴重的學問道德極為推崇，說嚴重的見解很高，要我多和嚴重談談。我以為他對嚴重推崇備至，無非是感激知遇之恩而已。

他當了師長後，部隊駐滬寧鐵路綫一帶，不久，即遇到鎮江、龍潭的戰役（打孫傳芳渡江反攻南京的部隊）。他因患胃病，坐轎上前綫督戰，後來有人把這件事向何應欽反映，被免去師長職務。他受了這個處分，大發牢騷，認為自己抱病上陣，不但無功，反而受過，深怪何應欽偏信謠言的不是。又說：“蔣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應欽聯絡白崇禧的桂軍逼走的。他們對浙籍軍人，是要排擠的。”我說：“嚴重現在南京當軍事廳長，你不妨去那里向他說明實際情

况。”他接受了我的意见，立刻去南京找严重。后经严重向何应钦代为解释误会，并由严重保荐他当军事厅副厅长。可是他的度是狭窄，后来对何应钦始终怀着成见，其根源就在这里。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复职，由于陈诚系浙江籍的青年军官，被选拔为南京总司令部警卫司令。不久，蒋介石赴徐州部署军事，准备向京津方面的张作霖部队进攻。何应钦留守南京，任参谋总长。陈诚赴前綫任炮兵指挥，要我同去，我时任军械局长，没有成行。他的警卫司令职务，由参谋长应山三代理。以后张作霖退往关外，对奉军事告一段落，陈诚回到南京，他的警卫司令职务没有了。因为何应钦在他跟蒋介石北上作战期间，已以参谋总长名义将警卫司令部撤销了。陈诚对我说：“这事蒋（介石）并不知道，何（应钦）又来同我为难了。”从此，他对何应钦的成见更深了。

四 在“討唐”“討馮”战役中的表现

蒋介石从前方返南京，設立“軍事編遣委员会”，计划縮編全国部队：改军为师，改师为旅。我那时在兵工署任总务科长，知道蒋介石派陈诚前往皖南整編曹万顺部第十七军，同南京两个警卫团并为第十一师，以曹为师长，陈为副师长，負实际責任，林蔚为旅长，罗卓英为参谋长。整編完成后，开駐蕪湖。一九二九年春蒋、桂战争时，曹被調走，陈任师长。

同年冬，蒋介石将唐生智指挥的京汉铁路北段湘军移調武汉整編，唐率領部队开偃城，即发生“反蒋事变”，陈诚奉令袭击唐军司令部，唐惨败仅以身免。事后，我和陈诚見面，問他“唐生智是有名的健将，何以在河南偃城一带被你师袭击时，失败得这样惨？连司令部官兵也大部被俘？”他說：“（1）唐孟瀟（唐生智的号）欢喜玩

弄政治，受了汪精卫的鼓动，想和閻錫山馮(玉祥)勾結起来，成三角同盟，来要挟蒋介石，提出条件，反对編遣委员会，以保全个人兵权。他不知道蔣早已得到消息了。(2) 湘軍久戍在外，將士思乡，高級軍官多不满唐所为，唐自己还莫名其妙。(3) 还有一个迷信的笑話：唐有一位顧老师(顧和尚)，传说神通頗大，唐非常相信，什么事都要請顧老师用奇門遁甲来算一算。原来唐的作战計劃是要头一天发动的，可是顧老师的阴阳八卦决定必須推迟一天。这是他司令部里一个彼俘的参謀說出来的。唐的举动如此迷信，安得不失敗？”他又說：“蔣鼎文、赵观涛(蔣、赵二人資格都比他老)諸人这次都因功升軍长了。”我看他对功名地位的心很切，而且斤斤計較，絲毫不肯让人，言下頗有牢騷之意。

一九三〇年，閻、馮对蔣的中原大战失敗。陈誠因对吉鴻昌軍作战有功，升为十八軍軍长，駐武汉。他回南京时，揚揚得意地对我說：“这次是蔣特別提拔的，嗣后只要絕對服从他一人好了。”

五 江西“剿共”和应付“閻变”

一九三一年，陈誠帶領第十八軍由武汉調南昌，在未和紅軍作战前，曾来南京和我見面。他說宋美齡要介紹譚曼意(宋的干女儿，即譚延闓的第二女儿)和他結婚，他打算回家里的妻子吳氏办离婚手續，要求我的父亲出面劝导(因吳家与我家祖上有亲戚关系)。后經吳氏胞兄吳子奇和我父极力相劝，吳氏提出一个条件：“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須同穴”，陈誠当然接受。隨即到上海和譚曼意結婚，这可称之为“政治結婚”。从此他与蔣介石結成“翁婿”关系，也就是为蔣介石所专寵的心腹人了。

一九三二年，他率領部队与紅軍作战，在黃陂、宣黃两次战役

中，都遭到紅軍大包围的攻击。一个师长李明被打死，一个师长陈时骥被活捉，官兵伤亡两万，枪枝损失近二万，弄得溃不成军，南昌也大为震动。而他却有恃无恐地强调说是两侧友军驰援不力，把失败责任推向客观。蒋介石也不予追究，反令收拾残部，并调生力军给他补充实力。据后来有一个被俘逃回来的副师长施北衡说：“紅軍行军迅速，善于迂回，抄到我军后面突击。他们是主动，我们是被动，这是任何精锐部队都要吃亏的。”他表示不干，准备回家，但因陈诚坚留，改任参谋长。

一九三三年秋，陈诚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他任副团长。他邀我到庐山会面，坚留我在他那里当参谋兼秘书长等职务。他说自己对政治是外行，因我在江苏盐城当过三年县长，懂得一些政治门径，叫我帮助处理地方军民纠纷的案件。我以老朋友的关系，便答应下来。在这个时期，我看到他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西洋留学生，以充实他的政治方面的班底。如柳克述、何联奎、郭骥等人都在秘书处工作。这时他不仅有浓厚的军事野心，而且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了。

关于当时在江西五次“围剿”，紅軍失败的原因，陈诚也和我谈起过：“（一）正规军与紅軍打游击战，是打不过的，因为紅軍地形熟悉，爬山越岭，一夜可走百里，这是我军所办不到的。（二）惟有采取碉堡政策，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现在这个办法已行之有效，所以前线很少战事。（三）现在我军实力，约为紅軍的四倍（他估计紅軍约二十余万，国军近八十万）。用碉堡封锁政策，来压迫紅軍，并增加紅軍补给上的困难，限制紅軍的游击活动。这样，曠日持久，紅軍一定被困死而无法作怪了。”

一九三四年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发动事变，成立“人民政府”，宣

布和紅軍合作。当时，陈誠对局势很焦虑，曾說：“糟了，又要动真刀真枪了。”蔣介石亲到南城和陈誠举行秘密會議。第二天陈誠就出发赴黎川督師，向福建方面的十九路軍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紅軍支援十九路軍，甚至发动全面攻击。連蔣介石也是仓皇失措的样子。过了数天，情报传来，紅軍不与十九路軍合作，蔣、陈二人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又喜形于色了。陈誠說：“这下子不要紧了，我大軍云集，一定可将十九路軍打垮。我們还要乘势反攻紅軍，把他們赶出江西。”但不知紅軍已改变战略，有计划地全面轉移，北上抗日。蔣介石又手忙脚乱地派薛岳为“追击总指揮”率領吳奇伟、周渾元两个軍沿湘、桂、黔方向尾追。

六 从“整理法軍”到“解决两广問題”

一九三四年蔣介石为整頓全国軍隊，派陈誠为陸軍整理处长。陈誠先派員到附近各省区校閱部队，一面在武汉設立軍官团，輪流調訓各部队的軍官，并选調高級將校为干部。

一九三五年蔣介石企图控制四川，并拉攏滇、黔等省的西南軍隊，派陈誠赴四川创办峨嵋軍官訓練团，蔣自兼团长，刘湘为副团长，刘文輝为团附。这次訓練，表面上看进行还算順利，但川、黔、滇軍人对这种法西斯教育是不滿的，不过当时沒有鬧出什么問題就是了。陈誠原在宜昌設置“行轅”，后来知道刘湘阴谋对抗，为解除四川將領的疑忌，宜昌行轅撤銷。

一九三六年，陈济棠公开“反蔣”，蔣介石派陈誠赴粵設“广州行營”，以余汉謀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由贛南率粵軍回广东，陈济棠败走香港。接着，蔣介石命陈誠去广西拉攏白崇禧，互談条件，黃紹竑也参与會談，替桂系方面討价还价。陈对黃很不滿，說他（指黃

紹欽)政客氣味太重。但蔣介石對黃還不錯，因為黃在桂系方面有勢力，楊陳放寬尺度。當時，白崇禧在陳濟棠失敗後，已陷於孤立；在陳誠的威迫之下，只好就范。兩廣問題解決後，陳誠即回南京。

七 西安事變和廬山訓練

一九三六年，蔣介石和他左右的高級將領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部隊扣留，陳誠也在其內。這便是震動全國的“西安事變”。蔣介石答應了東北軍所提出的抗日的正義要求後，始被釋回南京。而陳誠則留潼關，在蔣介石的指使下，背信棄義地進行改編東北軍的工作；他曾電我從廣州趕赴潼關協助。東北軍將領意見不一致，起了內變，軍長王以哲被殺害。陳誠派我赴西安，吊王以哲之喪，並和劉翰東師長接洽，把王的靈柩和家屬送回東北去。在潼關的軍事工作告一段落後，他當時對我說：“這次西安事變幸虧共產黨方面沒有同情張(學良)、楊(虎城)的舉動，否則會鬧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不僅蔣(介石)個人垮台，連同被扣留的高級人員生命都不能保險。”我接着說：“那末，今後國共可能合作了。”他又說：“蔣的政治手腕，不是別人可以測度的，我們只有服從命令，不要亂想。”

一九三七年暑期，陳誠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當教育長，蔣介石自兼團長，以各省的省主席和各部隊的總指揮為團附，聘請了一大批資產階級的所謂名流學者(大學校長、名教授)為講師。受訓學員中的三分之二為中上級現役軍官，三分之一為高級中學校長、縣長、國民黨省市黨部委員等文職人員。我任訓練團的總務處長。蔣介石辦這個訓練團的目的，也不外是如何對付共產黨，但只辦了第一期，由於“七七事變”突然爆發，就停止了。

八 在抗日战争时期

芦沟桥战事发生后，全国人心沸腾，纷纷要求蒋介石立即出兵抗日。那时冯玉祥将军和各省主席、各部队高级将领都在庐山，也一致劝蒋俯顺輿情。蒋介石当时还以“动员准备来不及”的鬼话相推诿。他竭力企图缓和中日军事冲突，曾派人向日本方面试探解决办法，但日军侵略形势咄咄逼人，拒绝谈判，不得已只好下令抗战。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段事实。

被迫抗战的形势既成，陈诚向蒋介石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担任苏、浙方面的军事，蒋许可了。那时，张发奎、刘建绪的军队都在浙江，他们向陈诚商量，把我调回浙江，担任嘉兴区行政督察专员，以便搞好地方军政关系和后勤补给工作。陈诚同意了。我即和他们一起到了嘉兴，把总务处长事托副处长庄明远（他现在是农工民主党成员）办结束。

上海战事发生，张发奎部队开赴浦东前线作战；刘建绪驻嘉兴，指挥松江前线作战；陈诚指挥闸北大场作战。据前方退回的伤员说：“陈（诚）指挥作战太不机动，只知固守阵地打死仗，以致伤亡甚大。这样打法那里挡得住敌人的飞机大炮！”果然相持了二个多月，敌寇在金山卫登陆，大场失守，兵败如山倒，陈诚退皖南，张发奎退嘉兴。我和张发奎见面时，他对陈诚的批评也和那位伤员说的差不多。又过几天，黄琪翔（系陈诚的副指挥）也退嘉兴，和我谈起这次失败原因是大场一带的工事，都是临时构筑，非常简单（承办工事的包商偷工减料），的确抵挡不住敌人猛烈的火力。他并说：“敌人已入上海市，即可到松江，日寇先头部队明天可能侵入浙境。”我立刻动身去嘉善，只见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士兵沿路奔

跑，揚言敵人追來了。我勸他們不要亂喊亂跑，並告訴他們，地方已备好飯菜，吃了飯再說。他們怨氣沖天地對我說：“找官長，找不到。”問我看到他們的官長沒有，情況混亂，達于極點。國民黨軍隊打了敗仗，官先逃跑，兵在后面找官，沿途沒有收容士兵的布置，完全成了烏合之眾，真是令人痛心！我回嘉興后，立即通知各縣長轉知各鄉保長办好收容傷兵和退下來的官兵的給養。接着，就同劉建緒回退杭州。這時，我又應陳誠電邀到皖南歙縣和他見面，他問我退浙部隊有多少？我說：“太多了，一时无从調查清楚，他們官找不到兵，兵也找不到官。有的士兵向地方鄉鎮長要求，自願繳槍換取路費回家，弄得地方難以应付。”他說：“糟糕了！這樣還能再打下去么？”我說：“劉建緒在杭州已派人沿途收容散兵，他會有報告給你的。”他說：“這樣看來，南京已難守了，以后只能打游擊了。”我又提到杭州的風聲也很緊。他就要我速回杭州，與劉建緒接洽整理散兵。隔了兩天，他派黃琪翔來杭找劉建緒，和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磋商浙省預備打游擊戰的計劃。陳誠原來打算抽調他自己的部隊到浙江由黃琪翔擔任游擊總司令。黃紹竑說：“已有廖磊兩個師（廣西部隊）為基礎，再訓練地方民兵為自衛隊，就足够了。”他們會談之后，黃琪翔對我說：“黃季寬（即黃紹竑）自己有辦法，我回去了。”后来陳誠對此事很不滿意，過了一段時間，就把廖磊兩個師調往安慶去。黃紹竑只好自己組織抗日自衛總隊，轄四個支隊，約一師兵力。一九四〇年初，敵人渡錢塘占領青山，抵抗不住，失敗了。陳誠又派俞濟時來浙江把這些自衛部隊改編為“國軍”，脫離了黃紹竑的掌握。我覺得陳誠在民族大敵當前，國家存亡千鈞一髮的嚴重關頭，還要意氣用事，真是太不成話了！

一九三八年，陈誠在武汉“大本营”任政治部长，来电邀我到他部里去当总务厅长。論交誼我是應該去的，可是那时我父病重，不允远离，我自己又在丽水当专员，便婉言謝辞。他也复我一电，說家乡事难做，劝我不要滥用乡亲。但据后来有人传知，說他对我的不应邀去武汉，非常見怪。認为我“柔做外官，貪舒服，怕吃苦。”从此，我和他逐渐疏远起来。

一九四四年，我在台州专员任内，曾赴重庆“中央訓練团”受訓，順便去看陈誠。他刚从“远征軍总司令部”回来，当时，河南前綫传来湯恩伯打败仗的消息。他說：“湯恩伯專門和好商勾結，以搶运物資为名，設卡走私，上行下效，軍紀廢弛，民怨沸騰。以致日寇來攻時，官兵無斗志，稍一接觸，即潰不成軍。此人真該殺一警百，以維士氣。”又怪“蔣鼎文太糊塗，非撤職查辦不可”。繼問浙江情況，說：“黃季寬在那里聲名狼籍，搞得也不好。”我說：“象湯恩伯那樣是不會的，個別的也難免。”并問他：“皖南新四軍葉挺過去系你的友好，何必把他排擠出去？”他說：“這是白崇禧、何應欽二人向蔣出的主意，由白到上饒與顧祝同共同計劃搞的。”（我想他一定參與其事，因為他過去與葉有一段友好關係，如果說老實話，怕我會責怪他出賣朋友，故而飾詞推托。）

陈誠在一九四四年当了軍政部長；一九四五年夏，他到鉛山第三戰區視察，電約我前往會面。我問他當前抗日戰爭的形勢。他說：“反攻力量已不行了，只有盡力保持這個相持局面，以時間來拖跨敵人。”這證明他（當然也包括蔣介石在內）已想不出什麼新的戰略方針來指揮抗日戰事了。黔驢技窮正是他當日的處境。他問起四明山、括蒼山、泰順一帶的紅軍勢力怎樣？我說：“不大。”他听了似覺放心些。又問駐在浙江的李默庵和陶廣兩個集團軍在前

錢能否擋得住日寇的進攻？我答：“目前敵人似無進攻模樣。”又問他們是否有象湯恩伯在河南那樣的行為。我說：“比較好一點，少數也是難免的。”他搖頭嘆氣。臨別，他說現在先到福建去看看，再轉到鄉下來一趟。我們分手後不到幾天，蘇聯出兵東北，“關東軍”抵擋不住，日寇無條件投降了。消息傳來，全民歡騰！這是陳誠意想不到的事，他在福建未及來浙，就飛回重慶去了。

九 勝利復員和發動內戰

一九四六年抗日戰爭勝利復員，他已經當了參謀總長。我們在上海會面，他知道我在做投機生意，勸我不要做，說我是外行，將來連本錢都會蝕光的。在他的談話里我覺得他對我還有些舊交情，便告訴他外間的傳說：“蔣介石還主張同共產黨打內戰的謠言，在上海流傳甚盛，大家都不贊成，你應該婉言勸蔣不要再發動內戰，有問題必須同共產黨進行協商，否則，人民太痛苦了。”他說：“蔣是聽美國人的話而決定一切的。我不能阻止，即使說了也是無益的。”我說：“既然如此，恐怕人家都會懷疑是你在從旁推波助瀾呢！”他說：“蔣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談到這裡又掉轉話鋒：“我胃病很深，苦頭沒有吃透，看來還得再作惡幾年才能了事。”我看他當時的內心上是有矛盾的。過後他又問到上海的社会情況：“上海各方面的接收人員，有‘五子登科’的作風，究竟大發接收財的是哪些人？”我說：“湯恩伯、錢大鈞、吳紹澍和戴笠的部下都有這等作風。”他說：“太不象樣子了！”我又說：“你應該反映給蔣介石知道，請他從速處理才是啊！”他說：“這件事，應該派員查究嚴辦才好，否則，輿論譁然，不僅對蔣個人的名譽有關，對國際觀感上也有影響啊！”

一九四七年我到南京去，以老朋友的关系去找陈誠，想把外間輿論責备陈誠是主张内战的頑固分子这个情况相告，劝他悬崖勒馬，回头是岸。这时，他家里管事的，都是一批新人，一个副官見我去找陈誠，就托辞他不見客，不肯传达。我即到他的弟弟陈敬修家，敬修是留法学化工的，头脑还比較清楚，頗不满意乃兄的这种作风，就用电话同他的嫂子譚曼意联系。我再去到陈誠家，才得入会客室和他相見。外交部次长沈昌煥正在那里大談其国际形势，信口雌黃地說什么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的头等強国，吹嘘美国的經濟、政治、軍事三方面实力如何雄厚，还捏造事实說：“共产党是怕美国的。”我在旁听了，觉得沈昌煥說这番話的用意不是向陈誠討好(表示拥护陈誠反共打内战的反动主张)，就是給陈誠打气(坚定陈誠反共打内战的立場)。沈走后，陈誠大言不慚地对我說：“现在国防部組織健全，各部队都是美式装备，武器精良。”自詡“实力強大”，說“只要美国帮助，經濟、物資、軍火等源源接济，打共产党是有把握的。只要半年到一年就可打垮紅軍了。”接着便問我：“上海人有什么样的議論？”我說：“一般輿論都不贊成内战的，曾听得有人向蔣(介石)建議一个折中办法：就是仿过去外蒙古的例子，把东北三省或內蒙古地区划出，註給共产党分而治之。”他立刻回說：“这是政客游說，企图两面討好的办法。你是一个不懂得政治的人，不要听他們的話。”我因他拒絕我的意見，便不再談下去了，隨便拉些家常后就辞出。

隔了几月，担任东北反共軍事的熊式輝吃不消了，蔣介石令陈誠前往替代。这时，陈誠叫赵志尧来信約我去南京談話，我以前次碰过釘子，沒有去，他赴东北后过了几个月，听說他在前方也支撐不住，而且胃病很厉害。我到了南京，見到譚曼意，譚說：“几个月

前薛修很想和你談談，你沒有來。”我說：“他個性太強，嫂子要勸他謙虛一點。”她答：“是呀！現在胃病很重，前方戰事又不利，怎麼辦？”我說：“這一個職務負擔太重了。他胃病如此嚴重，加以北方氣候寒冷，他的身體確實吃不消的。我看只有你向蔣夫人設法找個副手去接替，把他調回醫治才是。”譚說：“我用這個辦法試試看。”我觀察譚曼意當時的情態，也已覺得人民解放軍是打不了的，為了保全自己，還是想法子把丈夫脫離虎口再作道理。果然不久之後，蔣介石派羅卓英去代替，可是也不能勝任。最後由衛立煌去，這時，已面臨東北全部解放的前夕了。

陳誠由南京到上海陸軍醫院施行手術治療時，我去探望他，相對默然，沒談什麼話。這是我們兩人最後相見的一次。

十 我對陳誠的看法

陳誠是一個只知道追求個人名利的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除了我在前面敘述的點滴事跡中可以找到很多的根據之外，現在再羅列一些事實來說明：

（一）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事變”，對共產黨員進行血腥大屠殺以後，陳誠的思想非常混亂，徬徨歧途，不知所措。他既不贊成國民黨，也不同情共產黨。他曾和應山三（南京警衛司令部參謀長，已病故）去找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一度與李過從甚密，並勸我也研究蒲魯東學說。我看不懂，認為這是虛無黨，不贊成。那時，他又經常去吳淞勞動大學訪友，這個學校據說就是李石曾這一派人辦起來的。我以為他要走這一條無政府主義的路綫了。後來我又知道他和勞動大學的一個女學生名叫陳德懿的往來了約四年多，一直到他和譚曼意結婚始分開。他告訴我：

“已答应把她送到法国去留学，以了此一段因緣。”

(二) 一九三〇年邓演达組織“第三党”，曾介紹几个留学生在陈誠部下做事，据說邓演达原来打算以陈誠的部队作为“第三党”的实力基础，布置严密。后来邓被蒋介石逮捕，不久杀害。陈誠对我说：“邓被捕时，我在江西曾密电請求释放。不知蒋会怀疑我是第三党否？”看他顾虑很重，唯恐被蒋撤职查办。我说：“你們十八軍大部分軍官都是黄埔生和邓是师生关系，若要牽連，影响太大了。”过了半年，宋美龄介紹她的干女儿譚曼意同他結婚，他方放下包袱，并且大有“一登龙門，身价十倍”之感。

(三) 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我在陈誠部下以參議、秘书处長、总务处长等不同名义作交际、联络和組織一些文职人員搜集国内外政治經濟資料等工作。关于交际接待方面，陈誠美照我对那些社会名流，学术权威(大学校長、名教授)和著名的新聞記者，外交界人士等要特別招待。他自己对这些人态度謙遜很有礼貌，可是对于接待來見的高級軍官却完全不同，总是摆架子，打官話，耍威风，絲毫不留情面。我常劝他对待將校的态度，不可如此傲慢，要有一定的礼貌。他說：“这些人的好歹我心中自有数，不会得罪錯的。我系代蒋罵他，你不要叫我作烂好人。”我说：“万一蒋下台之后，你将置身于何地？”他說：“我决不再作他人的部下，不怕什么！”

(四) 他在蒋介石面前，尽量表现自己的忠心，奉承討好，无微不至。例如他得知蒋介石有排斥陈济棠的企图，就設法先去拉攏余汉謀、张发奎、薛岳、黄琪翔等广东軍人，利用这些人来对付陈济棠。又如在蒋介石沒有表示与共产党合作之前，他决不表示态度；当他看出蒋有与共产党合作的苗头，就馬上設法与叶挺取得联系。

(五) 陈誠为了满足自己独揽軍事大权的政治野心,处心积虑地排挤何应欽(他曾对我說,何应欽是烂好人)。桂系軍事首領白崇禧是他素所痛恶的人物。由于白崇禧是个“小諸葛”,有实力,他无可奈何,只好采取拉攏、联络的手段来对待。

(六) 在解放战争时期,据接近他的人說,陈誠常常受美国人的閤气,有时,他忍受不住,便会怒火迸发,背后大罵起来。記得一九四八年秋济南解放后,郭忬(后勤总司令,已病死)曾对我說:“陈誠对美国軍艦忽由青島撤走了的时候,发过很大脾气,說‘要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真正的帮助,是整不住的。’大为懊悔。”

以上是我以同乡世誼的角度对陈誠片断的了解,很不全面。大陆上还有不少过去曾作过他的部下或者是来往較密切的朋友,对陈誠有更多的了解,相信一定能够写出关于陈誠的更全面翔实的史料出来。

(致协浙江省委员会秘书处供稿)

抗战胜利后海防痛击法軍紀实

王 理 寰

一 五十三軍被調入越

一九四五年初，滇西对日作战获胜，由卫立煌所統率的远征軍打通了中印公路。不久远征軍撤消，所有部队分散到其它战区。五十三軍(原系东北軍，計有一一六師和一三〇師)全軍集結在昆明西郊附近。一三〇師(師長王理寰)駐在昆明以西四十華里的安寧縣，臨時整裝待命，訓練補充。這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五十三軍全部歸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揮。

在解決龍雲的头一天(即九月二十八日)，杜聿明親自到安寧縣招集全師軍官講沙盘戰術。沙盘戰術是假設街巷爭奪戰，講了半日的時間。最后他出個口試的題目，問軍人以什麼為天職？軍官們答以服從為天職。杜當時說：“以服從為天職是對的，希望你們在什麼時候都是要服從的。”午后，杜在軍長周福成的陪同下，乘車回昆明去了。我當時判斷杜的行動是別有用心的，也許是霍揆彰第二(滇西抗日時霍揆彰是二十集團軍總司令，五十三軍歸他指揮；中印公路打通后，霍准各解決五十三軍，經衛立煌制止)，五十三軍總有被解決的一天。二十九日下午四時，接到周福成的電話，要我準備一下，可能夜半出發。到夜里十二點，由軍部轉達杜聿明的命令，着一三〇師即刻出發，星夜到達建水縣，停止待命(建水縣

是通达越南的重鎮之一)。我把命令下达后,夜里二时左右全师出发,拂晓已南进四十华里左右。这时听得昆明方向的炮声隆隆,心中疑惑:杜聿明先把我师调走,是不是五十三军军部及一一六师要被解决。当命队伍停止、休息、用饭,并以电台向军部联络询问。周福成回电说军部已移城西温泉附近,安全无事;昆明炮声系杜聿明与龙云发生冲突。他叫我仍照前令开拔,每两小时联络一次,到建水县后驻地要集结,尤须注意警戒。我才明白杜聿明调走我们,是怕妨碍他解决龙云。

我们于十月一日下午四时许到达建水县,受到当地行政专员张渭川(龙系)和地方人士的欢迎。张首先告知昆明情况,并谓蒋介石暗下毒手,实属不义。一周以后,得知龙云已被逼到重庆,就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兼云南省主席。一三〇师先开建水是蒋介石准备调五十三军入越的初步。

二 接替六十军的防务

蒋介石虽然逼走龙云,作贼心虚。恐云南部队再回云南,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调卢汉所属六十军到东北参加内战。同时把蒋的直系预二师(师长戴涯)拨归五十三军。调五十三军到越南,归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指挥,接替六十军在越南的防务。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集结海防,由海道远往东北。五十三军经蒙自、老街等地,徒步进入越南国境。开始五十三军军部带一一六师驻河内,一三〇师驻富寿省,预二师驻老街和开远(在中国边境,预二师未全部入越南,表面拨归建制,实际是监视五十三军)。十月下旬,五十三军接替了六十军的原有任务。六十军集结海防后,陆续登船运往东北。

一三〇师于十二月初到海防市，接替六十军龙(跃)师的任务。但龙师防务很复杂，一三〇师按其原任务分配如下：(一)师部及直属部队驻海防(山炮营因道路的关系，尚留在云南省开远县)。(二)三八八团由突山沿海岸经过海防市至广安省沿海防守。(三)三八九团在北宁省及露天煤矿担任地方治安。(四)三九〇团由海阳省车站起经过府凉、商(地名)至凉山镇，负护路的责任。全师主要的任务是看管日本投降兵集中营。投降日军两万八千多人，分三处管训：突山第一处由日本旅团长山本直福(少将)为首，海防市第二处由日本师团长土桥女雄(中将)为首，北安省第三处由日本师团参谋长伊藤松林(上校)为首，统由政治部主任钱钰(蒋系)负责管理的责任，每天上政治课讲三民主义，并做种菜、打鱼等工作。

海防市是越南的重要商埠和军港。全市人口约二十余万人。华侨约五、六万人，法侨约万余人，英美人较少。盟军设有军官联络处，内有混合军官共二十余人。法国设有临时领事代表团。越南设有海防市政府。中国方面有中华会馆、华侨商会和工会、华侨妇女协会和学校等。海防街道繁华，商业茂盛，交通发达。码头建筑非常良好，长约二海里，沿码头大街都是三四层的楼房。港口水深约五、六丈，大小船只和兵舰都可自由出入。海防市南有突山永久坚固国防障地，北有凉山山脉之险，实为越北国防上重要门户，为法国控制北越的主要地点。这一带也就是当年中法战争中国冯子材、刘永福打败法军的主要战场。一三〇师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此接防后驻了很久。六十军军部和龙师仍有一大部留海防等船。(六十军因轮船过少，一直拖延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尚未尽数运完。)五十三军与越南政府和云南军队相处都很融洽。

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间，蒋介石又想出花招，秘密给五十三军军

长周福成一个密电：要将五十三军缩编一个师，由周福成充师长，并密许周福成将来到东北兼某省的省主席。卒因官兵的一致反对，周福成电请撤消原议，否则官兵不稳，恐出意外。蒋介石不得已，许可撤消原令。五十三军从此愈加团结，视越南为第二家乡，多数不愿回国。青年人与越南女子结婚的不少。

三 拒絕法方的片面要求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中法协定在重庆签字。协定内容是蒋介石政府承认法帝国主义殖民者继续在越南的统治权和对华侨的待遇，并涉及滇越铁路、海防自由港和经济问题等等；实际就是蒋介石出卖越南。法国以接收海防为名，暗中解决越北，使胡志明无法抵抗。它首先在西贡法文报纸上发表签字内容：中法交防日期自三月一日至十五日开始，三十一日完毕；交防地点自海防开始，次及河内，并许法军于海防登陆前十二小时，以飞机十二架运送武器，降落河内机场。这些消息，我只在法国报纸上看到，并未接到任何交防命令。同时判断蒋军和八路军作战不利，急于撤军回国参加内战，并使非嫡系军队与八路军作战，相互抵消。

三月四日，海防市市长阮某（名忘记）来访，说传闻法军要到海防登陆，想消灭越南军队，问中国军队是否交防。我说并未奉到上级命令，国际交防必须有政府的命令和双方军事代表到现地协商，规定好日时方能交接，传闻是无效的；假设交防，一定先期通知，请他放心。随后就以电话向军部询问，始知卢汉回昆明，周福成往重庆，副军长赵镇藩在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开会；参谋刘德裕说，军部也未接到交防命令。等到五日早又和赵镇藩通电话，赵说：“昨晚开了一夜会，羣龙无首，毫无结果而散，现在只有听之而已。”我听

到这个消息，无头无尾，法军如到海防强行登陆，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我马上派人收集法军情报。恰好五日上午十时左右，海防法国领事代表阿夫申（譯音）来见，手执法文西貢报纸，向我說中法協定海防交防的事。我答以未奉到政府的命令，报纸不足为凭，也不能私自协商；假使命令到来，国际間的交防也須按交防手續。阿夫申說：“法军已由西貢出发，拟六日早在海防登陆，如等待命令到达，就耽誤法军的行动，有关越北的全局。况重庆及河内方面都許可了，中法又是盟军，如有錯誤，由法国負責。”我听他說的更不合理，“有关越北全局”是別有用意，当即厉声告诉他，我是军人，守土有责，任何人不許侵犯，也无商量的余地；草率要求，不但有碍中、法两国友誼，而且是非法的行为；請他回去，火速制止法军行动，以免发生誤会。阿夫申又說，法军两万多人共十九只兵艦，停在远海，燃料和淡水都成問題，无法补給是不行的。我說西貢不远，不过两日行程，兵艦可暫回西貢，将来真有命令再来不迟。

五日中午，阿夫申又來說：“听河内法国代表說，重庆和河内方面已給师长命令了，你为什么不遵行呢？”我說：“中国向不会騙人，我不但未奉到命令，听說河内中、法、越會議尚无結果（詳情參看本选輯第七輯陈修和的受降紀略）。如何能有命令呢？”阿夫申說，法军正在前进，无法制止，恐怕不能在远海停留（按法国在越南規定：二海浬以內为領海，二十海浬以內为近海，二十海浬以外为远海）恐怕要发生誤会。阿夫申辞去后，海防市政府代表又来問我：“越、法交涉严重，听說法国军队要在海防強迫登陆，中国军队有証防的一說。师长知道吗？”我說“未接到命令，請放心，不論什么时候交防，事先必定通知你們作些准备，我不会教法军登陆。”越方代表高兴而去。

四 痛击强袭海防的法軍

当时我判断法軍一定要強迫登陸，便招集參謀長王冠英、參謀處長谷振寰(副師長在昆明養病)研究法軍情況。日本占領越南時法軍損失嚴重，部分陸軍逃到中國邊境雲南省內。越北無兵，在北緯十六度以南為英國軍隊所接收，西貢方面法國無大兵力。他們宣稱陸海軍兩萬人，兵艦十九只，這是虛張聲勢，威吓中國軍隊和越南人。最大量不過一萬人兵艦不過十只。如果真有十九只，人數兩萬人，其中必有英、美人參加。參謀長和參謀處長說，在國際上的關係，英美不敢直接參加，只能大量援助些武器；听英、美聯絡軍官的口氣，同情法軍登岸，他們是互相通氣的。最後我決心拒絕法軍上岸，僅就海防市現有軍隊準備迎頭痛擊，令參謀處長谷振寰秘密起稿準備下達命令，令參謀長王冠英到市內布置巷戰的準備。我親自到海岸碼頭配備陣地，由海沿到市內長約九哩，碼頭長約三哩，令三八八團第一營(營長張允誠)附工兵兩連為守備部隊，指定第一連專守碼頭(連長趙敬武)，集中全連火箭筒六門、六零迫擊炮六門、輕機關槍六挺、附平射炮兩門、重迫擊兩門、火焰放射器一個(此武器無特別命令不能施放)。

到午後二時許，我到中華會館、華僑商會、華僑婦女協會秘密告知中華會館主席饒純札，婦女協會主席阮太(阮老太太)：法軍要到海防強迫登陸，可能六日晨有激烈的衝突，請火速秘密告知僑胞，今夜都要在樓下和地下室睡覺，听到槍炮聲不要驚慌外出，晚間即行戒嚴；并請消防隊和醫務人員(由中華會館指揮的)計劃一下，明天可能要用。隨即轉到海防市集中營，告知日本土橋眾雄：法軍要求登陸后将日本軍隊移法軍管理等等。土橋眾雄當時說，

日本军队是投降中国而不是投降法国，这是无理的要求，日军是坚决反对。我说这事可能发生冲突，我想把日本士兵改穿中国军服，必要时参加中国军队一齐作战。土桥高兴地说：“我服从师长的命令。”当在土桥屋内给设一个临时军用电话。我回到师部听说曾泽生来过，马上到曾那里，该军龙师长也在座。我先把打击法军的准备告曾，曾表示同意。

午后六时许，法国代表第三次来说：“法军已到近海，因电报不通，不能阻止前进，预算明早六时可能到海防登陆，请中国军队方面原谅。”我当即质问他：“电报不通，你怎么知道法军到近海呢？”他无言相答。我向他要法舰上的电报呼号，以便阻止法军前进。阿夫申不给，我即向他宣布：由现在起中国军队对在海防市的法国人一切生命财产不负保护责任。阿夫申当时面红过耳而去。当日按计划发出阻止法军登陆的命令，即刻宣布戒严：（一）海防市由本日晚八时起开始戒严，九时后除军事机关外一律不准燃放烟火，街上无证件不准通行。（二）自来水和发电厂由军队统一管理。（三）港口内所有各国各种船只，由副官处指挥一律开入内河二十华里以西处停泊。（四）法国街一律禁止出入，由特务连负责。（五）海防港口和突山的灯塔停止放光。

命令下达后，我以电话报告赵镇藩，说明我的意图和准备，赵很同意我的决心和办法。夜里七时许，越南政府派武元甲住在师部联络。到六日早二时许，接到海沿守备部队张允诚营长报告，现下近海已发现一片红光向港口驶来，发射阻止信号十余发，对方不理。我命他们按计划执行，用稳打稳拿的方式。到三时许，法舰进入港口，我方鸣枪制止。法方先行开炮，射中海关码头的弹药仓库（此弹药仓库系日本夺得法国的原仓库，投降时移交中国，库内

所存的弹药都系法国的水雷和二十四口径炮弹),当时火起,黑烟冲天,炸声震动房屋。双方开始激烈战斗,法军边射击边向码头靠拢,一舰在先,两舰相随,其余六舰都在跟进,后方向有数艘在港口外横进中。我军等法舰靠近码头、将要登岸之际,枪炮齐放,火箭筒、六零炮、战防炮打中先头三舰,黑烟突起,爆炸如雷。一舰沉没,二舰负重伤。其余兵舰见势不利,均行回棹,悬起白旗。沉没和负伤舰上的法国官兵束手无策,均向水里乱跳;有的向岸上浮,有的在码头伏地避弹,有的向上高举枪把乱摇,有的手持白旗左右乱摆,齐声大叫希望中国军队停止射击。约激战到八时许,我方才停止射击。法军伤亡五百余人,俘虏阿巴努(海军中将)为首的高级将领五人,士兵两千余人,由第一连连长赵敬武押送师部。阿巴努见我首先认罪,向我道歉;并说:“我们法军是对越北而来,不是对中国军队而来,是奉西贡驻越总督的命令前来到海防登陆,不是无故而来的。”我质问说:“中国军队向你们发出信号,为什么不停止呢?你们直抵码头,先行开炮把弹药库打中起火。在中、法两国友谊上和国际法上是无理的。现在你们被俘,尚有何说?”阿巴努承认法军的错误,要求原谅放回他们,日后再由两国政府决定接交越北。我说接防不接防是另一件事情,今天中、法军冲突的事情如何处理。阿巴努说如能把他们放回,甘愿立字负责。当时我们拟出简单协定文件如下:

中、法军在海防三六事件协定要旨

(一) 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法军偷袭中国军队海防守堤,被中国军队击败,此次误会,纯由法军负责。

(二) 海防市所有各国居民的生命财产一切损失,都由法军负责赔偿。

(三) 法軍保證今后絕不再率偷襲海防守地。

(四) 击沉击伤法国軍艦，在中国軍隊監視下，准予打撈拖走，限七日早八時前打撈完竣。

(五) 中国軍隊方面无条件地即日放回法軍被俘人員，双方伤亡均由各自負責。

說明：1. 此協定不涉及兩國友誼和兩國政府外交上其他方面。

2. 此協定由簽字后生效。

中国軍隊代表，中国陸軍一百三十師師長，王理寰（簽字）

法国軍隊代表，駐越南法国艦隊司令，阿巴努（簽字）

当时阿巴努看完草稿时，对第三条不同意，坚决不肯签字。并且說：“不能写‘再’字，‘再’字是法軍恥辱。”我說：“这是事实。法軍由西貢來此偷襲海防，根本就不是光荣的。你知道中国不是六十年前的中国，法国也不是六十年前的法国。昔时中国馮子材和刘永福把你們法国打败，法国以欺騙的手段，騙清政府將越南割让法国統治。今天，再想作那个梦是作不成的。你如果決定不簽字，請你們被俘官兵一律到集中营去和日本投降兵住到一起。”阿巴努又要求考慮，以至延長到午后二時十三分方始簽字。簽字后，把阿巴努等送回海岸碼頭。在中国軍隊監視下，法軍收集殘兵敗將，打撈击沉兵艦，七日上午八時方始完竣，离开海岸向西貢駛去。

五 越南人民羣眾的欢呼

六日下午二時半法軍簽字后，到三時解除戒严令，恢复街上秩序。令參、副两处协同海防中华會館的消防队附工兵一部，去消灭海岸弹药庫大火。房蓋早已炸光，庫内仍是炸声隆隆，炸片乱飞。經数小时的奋斗，用了大量的水方才扑灭。检查建筑物的破坏和羣眾生命財產的损失，除碼頭沿海岸大街的樓房有枪炮弹痕损坏

外，其余居民及建筑物均无伤亡和损失。我军也只有第一連步兵两名受破皮伤。七日上午八时，中国駐海防接收委員代表馮廷弼、中华會館代表龔純乳、华侨妇女协会代表阮太等共三十多人，到師部慰問。河内方面，中国第一方面軍參謀长馮玉瑛派副官处长(姓名忘記)，五十三軍趙鎮藩副軍长派參謀处上校科长賈武林代表等到師部慰問。海防法国領事代表也到師部道歉，并要求解除法国街的禁令和照旧保护。上午十二时，越南海防市羣众两万多人在街上游行示威，并在滿街貼出标語高呼拥护中华(越南人称中国为中华)，打倒法国帝国主义、法国軍滾出越南去、中华万岁、越南万岁。

八日上午八时，我亲到河内第一方面軍司令部汇报，同时在河内中文报纸发表书面报告(内容专指責法軍无理的偷襲)。三月十日卢汉亲到海防慰問軍隊和华侨，到碼頭觀察被法炮击焚的弹药庫。

三月十五日，五十三軍得到方面軍轉来蒋介石的命令，海防一带一三〇師防务由預二師接替，五十三軍率一一六師和一三〇師到广州集結待命。一三〇師由三月十七日离开海防，徒步行軍，經同登、凭祥、南宁、貴县等地，四月初旬始到达广州集結。

(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补充和訂正

关于金圓券的发行和崩溃

我閱看《文史資料选輯》第八輯所載黃元彬《金圓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文內有几点与事实不符，列举如下：

第一〇一頁：原文“此外，西北，西南方面分別由冀朝鼎、徐堪前往負督導的責任。”徐堪往西南是确实的，因为那边有黄金外汇。冀朝鼎往西北則不确。据我知系俞鴻鈞已臥冀暗通中共，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任务的。

第一〇四頁：原文“王云五并没有单独撤換”也不确。王云五在官僚羣中是孤立的（孔祥熙系怪他打毀法币，其他各派也不要他，上海銀行家都看他不起），所以到了相当阶段，王受迫辞职，接任財长的是完全不同类的徐堪。那时我辞职不到院，张厉生代理院事，孙科繼任院长时財长仍为徐堪。

翁文灝

关于英斂之日記扉頁上題詩的作者

《文史資料选輯》第九輯《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一文中，說到：“英斂之这个人是很自負的。他在壬寅日記的扉頁上題着这样一首詩”（原詩从略）云云。原文作者虽未直言那首詩就是英斂

之作的，但玩其語意，似已誤為那詩的作者就是英斂之了。按，那首詩是梁貞超的“自序”二首之一。除那一首外，其另一首是：“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態呻吟苦恨誰？萬事禍為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立身豈患無余地，報國惟忧或後時。末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瘁控羣兒”。（據上海進步書局印行的《現代十大家詩鈔》第四冊《梁任公詩鈔》）

孫 思 白

关于币原之死的更正

《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上陳銘樞所寫的《寧粵合作亲历記》文中，提到九一八時日本外相币原后為日本軍人毒死，與事實不符。币原名币原喜重郎，是日本“三菱”財閥家族的女婿。民政黨若槻禮次郎任首相時，币原任外相，有亲美傾向。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币原提出对华三原則（与后来广田弘毅所提三原則不同），引起日本少壯軍人不滿，民政党内閣跟着垮台。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繼任首相，币原已不問政治。一九三二年犬養毅被法西斯暴徒杀死前后，币原也被打了一頓。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七年币原曾繼东久瀨之后組織投降看守內閣，任首相三個月。一九五一年病死。

周 一 志